王造時著

荒謬集

自由言論社發行

自由言論叢書之一

荒謬集

自由言論社發行

三荒謬集三

（自由言論叢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七日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一元——

著作者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政治學博士　王造時

發行者　自由言論社

王造時譯著

書名		出版者	狀態
中國問題的分析	（著）	商務印書館	（已出版）
軍縮問題	（著）	商務印書館	（印刷中）
中日問題與國際聯盟	（著）	新月書店	（已出版）
近代歐洲外交史	（譯）	商務印書館	（已出版）
現代歐洲外交史	（譯）	商務印書館	（已出版）
美國外交政策史	（譯）	商務印書館	（印刷中）
社會問題	（譯）	商務印書館	（已出版）
荒謬集	（著）	自由言論社	（已出版）
比較政府	（著）	商務印書館	（編著中）
政治學原理	（著）	世界書局	（編著中）
政黨論	（著）	世界書局	（編著中）
中國問題的解決	（著）	自由言論社	（著作中）

自序

九一八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個事變。因爲受了這種不可言喻的刺激，我才開始我的政論。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册子，後來是在報上發表文字，又其後是先後辦了主張與批評及自由言論兩種刊物。而結果是：刊物被禁了，書也教不成。一年多以來，只好守緘默。

守緘默，據我個人的經驗看來，也有好處：對於環境或許使你認識更淸楚些；你的思想或許因此更得到一個切實的基礎。

無論如何，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起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止，這期間我所發表的文字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一個階段，所以我要把他們收集起來作爲紀念。

爲什麼叫做『荒謬集』呢？因爲我在言論上所得到的罪名是『言論荒謬』。其實內

容是否『荒謬』，只有請讀者來判決。在我個人看來，則認爲這種言論或許過於『正經』，或許太不『荒謬』。不知讀者諸君以爲如何？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

荒謬集

——王造時政治論文集之一——

序文
兩大救亡政策
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
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
國民黨怎麼辦
這樣的國民
對國家的認識
復興新文化運動
怎樣打倒貪汚

目次

安內必先攘外
自由之戰爭
戰的政策
領袖的條件
對內的平等
近東病夫給遠東病夫的教訓
怎樣復興農村
五月十日的主張
學生的出路
汎論愛國的功罪
異哉所謂外交之轉變
實行統制經濟的先決問題

恢復民族的自信力
假使遠東大戰怎麼辦
爲閩變忠告當局
倒車開到讀經
附錄——我們的根本主張

救亡兩大政策

一

一個日本浪人中村，沒有中國政府的護照，私到東北內地旅行，忽然宣告失蹤，日本便咬定爲我國駐軍所害，不待交涉手續完結，乘我不備，動用暴力，強佔我東北，慘殺我同胞，破壞我交通，竊據我機關，掠奪我財貨，封閉我銀行。這就是這次日本武力佔據東北的由來。

然而根本原因，還別有所在。

(一)日本國土狹小，財源枯渴，人口激增，及工業革命的結果，爲謀過剩人口的出路，市場的獲得，原料的供給，及投資的機會起見，事實上不能不取我滿蒙。第一，數十年來，日本實行軍國主義，及鼓勵生育的結果，人口每年增加由四十萬至五十萬，再進至六十萬；又進至七十萬；更進至八十萬；據一九二六年日本統計局的調查，則竟達

九十四萬至百萬之多。反之，據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兩年計算，日本國內所產米穀，只能供給消費總額百分之五十七八，其餘不足之數，須由朝鮮，台灣，及我東三省供給。第二，日本對滿蒙輸出有綿絲，綿織物，麥粉，食料品，機械，器具等等東西，佔輸入中國貨品總額一大部分。以昭和五年對中國的輸入計算，總共爲三億九千九百萬圓，而輸入滿蒙的，却佔了一億二千二百萬圓，佔輸入中國日貨百分之三一。可見滿蒙是日本的一個大市場，日本絕對不能放鬆。第三，滿蒙是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其中以鐵，石灰，肥料，大豆等爲最重要，佔中國輸入日本全額一重要位置。以昭和五年中國對日本的輸入計算，總共爲二億七千八百萬圓，滿蒙方面却佔了一億六千三百萬圓，佔全額百分之五八。第四，查日本對外投資二十二億中，在中國投資有十八億，佔全額百分之八一而強，但是在滿投資便佔了十三億，居日本在中國投資總額百分之七二而強，居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百分之六十。由此可知滿洲是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個最大市場。因此日本朝野上下，莫不視我東北爲其唯一的經濟出路。且看田中對滿蒙的摺奏，便知

其用心之所在。他說：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鑛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為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

(二)日本除經濟侵略以外，還有政治與領土的野心。她不但想獨霸遠東，並且想稱雄世界。先吞滿蒙，次及本部，然後再逐鹿世界，這是田中預定的步驟。不信，請看：

『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眞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

據此，則知日本這次佔領東北，不僅是經濟的侵略，而且是政治的侵略。更據此，則知日本的目的，不僅在吞併滿蒙，而且在滅亡我全個中國。所謂明治大帝的遺策，第一期在征服台灣，第二期在征服朝鮮，皆已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尙未實現。』

因爲『尙未實現，』因爲早已『處心積慮，』所以只待時機的來到。

剛好西洋各國，大鬧經濟恐慌。英國工黨政府甚至犧牲自己的地位，而與保守自由兩黨合組國家緊急政府，以對付此嚴重的經濟難關。列強在此時會，都是忙着整理內部，沒有全力來監督日本的行動。

我國自己更是不幸。共產黨的暴動，政府派三十萬大軍而不能剿滅。接着又是空前大水災，範圍及於十七省，災民超過五千萬。我們正在葬死救生之不暇，誰知國民黨中又鬧派別，使中央『同志』與兩廣『同志』，不能不出於火併。

國際形勢如彼，我國內亂如此，這正是日本亡我的絕好機會。日本虎視已久，那肯輕易放過？

二

於是日本乘機驟然佔據了我東北，成爲一個『已成的事實。』但是我們要問，這種軍事佔領是永久的？還是有條件的？我們知道，現在帝國主義者吞併別國的方法，沒有以前那樣愚笨。他們只要我們在事實上答應亡國的條件，便毋須作永久的佔領。永久

佔領，不但容易引起中國國民的憤慨，別國的干涉，並且經濟上也不合算。所以這次日本的行動，事前不向我國提出要求條件，也不發出什麼哀的米敦書，却祕密訓令南滿日軍，先行強佔我國遼吉兩省，並搗毀東北一切政治，軍備，交通，金融，工商種種機關，使一切建設事業完全歸於破壞；一切抵抗能力，完全歸於消滅。這樣，一面日本可諉爲南滿駐軍衝突的局部事件，非戰爭行爲，使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簽字國不能出來積極干涉。同時不侵入別國勢力範圍，極力避免與別國在華利益發生衝突，使第三國也不便起來強硬干涉。然後根據田中所定下來的『錦囊妙計，』以二十一條爲基礎，另提苛刻的條件，迫中國爲『城下之盟。』

左手執着條件，右手拿着槍炮子彈，足下踏着滿洲土地，日人或先脅迫我地方當局承認，不但不願國際上第三者出來干涉，並且不願我中央當局出來過問。曹汝霖章宗祥之奉張學良電召，日使重光之祕密到平，都是地方交涉的佈置。

如果與地方當局交涉不成，才會與中央當局談判。

如果與中央當局交涉不能達到目的，或者要施用吞併高麗的方法，拉出前清的遺孽，失勢的軍閥，無聊的政客，作爲傀儡，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自決原則，封住國民黨的口，先組織滿蒙獨立國家，使其脫離中國關係，然後再去實行合併。現在熙洽袁金鎧等的活動，便是日本的滿蒙獨立政策的先聲。

日本一面宣言是『地方事件』，便是要避免問題的擴大，認佔領東北爲局部的衝突，以便與地方軍閥私相授受；一面聲明反對第三者出來干涉，使國際機關或第三國不能置喙，以便可以向孤立無援的中國，予取予求。

三

因爲日本侵略滿洲的野心不自今日始，所以日本侵略滿洲的準備，也不自今日始。他們在國際上早就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到如今，歐美人心目中的滿洲，並不完全是中國的領土，而是中日兩國競爭的場所。有許多西文地圖，甚至把滿洲繪成與中國不同的顏色。

去年美國記者團遊歷東亞，自出發之日起，卽被日人百方包圍，指導引誘，無微不至。該團受片面宣傳的結果，回國以後，果然發爲怪論，說中國政府無力統馭滿蒙，須借日俄兩國的力量，以謀建設。從此一端，可見日人用心的毒辣，計慮的周詳。

我們中國當局，平時一天到晚，只知勾心鬥角，陰謀百出，爭權爭利，相打相殺，甚至急不暇擇，勾結敵人，引狼入室，那有功夫去調查事實，做國際宣傳的工作。就是駐美，駐德，駐法三國的公使，到現在還是付諸闕如。外交上佈置如此，天天還要貼『革命外交』的標語，喊『革命外交』的口號，『其誰欺，欺天乎』？等到敵人壓境，才手忙足亂，醜態畢露，不是效『秦庭之哭』，乞憐於國際聯盟之門；便有『如喪家之犬』，哀鳴於非戰公約之前。無奈西人性格不同，懦夫素所不齒，看見我們不自助而求助於人，最多也不過說一聲『討厭的中國人眞可憐』而已。有誰願替中國人出死力打倒不平者？

這次英國的態度很明顯，對於日本的暴動，並無若何反感。不但國會裏面沒有什麼討論；就是一般輿論的對於日本，也沒有什麼非難。這固然由於國內經濟問題的嚴重，

及英美兩國衝突的尖銳化，英國不願開罪於日本，以孤自己的奧援，但是日本宣傳的力量，與外交的手腕，也夠使我們驚倒了。

美國雖對日本素來不大放心，並且是發起非戰公約的國家，但若希望她為中國的事情，與日本打一死仗，而我們自己却『抱無抵抗主義到底』，天下斷無此理。她已向雙方勸告和平解決，已做了她可以做到的一步。勸告不聽，請問美國又有什麼辦法？一九二八年，關於中東鐵路問題，蘇俄進兵北滿，與中國軍隊衝突，美國也發出一種勸告，蘇俄不但不聽，並且譏笑美國，美國後來也沒有進一步積極干涉。何況美國現在失業問題也很嚴重，與英國關係又非常緊張，此時對於日本，實在不能不稍為放鬆。

蘇俄兩年前也與現在日本一樣，以武力侵入中國，不過沒有日本這次利害罷了。那時蘇俄進攻北滿，日本沒有出兵干涉。這次日本佔領南滿，若不妨害俄國勢力範圍，俄國又何必與日本為難。況且蘇俄正在實行五年計劃，如非萬不得已，必不願意與人家起釁，以至『功虧一簣。』日本駐俄公使，既然早已與加拉罕在那裏接洽，他們或可以得

到相當的諒解：一沿南滿鐵路，一沿中東鐵路，以平分全滿秋色。

至於其他的國家，在遠東並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他們站在旁觀的地位或者對於我們表示相當的同情，但最多也不過長嘆一聲『中國又在受欺負』罷了。老實說，國際關係，完全是以國家的利害爲前提的；就是人家出來干涉，也是爲自身利害打算。國際上所謂『公理』，所謂『正義』，所謂『人道』，是強者的『口頭禪』，弱者的『乞憐語』，我們不可指靠，我們更不可拿來掩飾自己的怯弱。我們要認清，現在還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世界。我們須有力量反抗強權，才有公理。我們須有勇氣打倒橫暴，才有正義。我們須有決心抵抗野蠻，才有人道。若是我們平常不自振作，一天到晚同室操戈；一旦外侮發生，便束手無策，任人宰割，坐以待斃，只知向各國要求公理，呼籲正義，祈求人道，這是卑怯的心理！這是奴才的性質！只配做亡國奴！

四

自從這次事情發生以後，中央政府到現在除抗議三次以外，只表示兩種態度：(一)是對外乞憐於國際聯盟，非戰公約；(二)是對內要國民『忍痛含憤，暫時逆來順受。』先說抗議。抗議是外交上照例的文章，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我們抗議的內容如何，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見原文，難道措詞之間，有不可爲外人道者嗎？若是如此，我們更要請政府負責發表出來。否則，政府將我們賣了，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回事。三次抗議以後，日本有無答覆；如有答覆，答覆如何，這也不能不請政府明白告訴我們國民。

老實說，抗議不過是照例文章，不會發生什麼效力。日本要幹就不怕抗議，怕抗議就不幹了。若是政府當局，只知做抗議文章，沒有別的有效方法，那是缺乏常識的外交。

政府當局或者要說，我們除了抗議以外，已經訴諸國際聯盟。但是我們要知道，國際聯盟雖然是以『公理』『和平』爲標榜，但這些不過是欺騙弱者的糖果。不但牠本身

沒有什麽權力，而且牠全個組織也爲少數列強所把持。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若是兩個小國相爭，牠還可以派出一個調查團去調查眞象，然後壓迫他們接受調查團的報告。一九二五年，希臘與保加利亞的爭端，便是這樣解決的。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下午兩點鐘，一個站崗的希臘兵士，越過保加利亞的邊界，被一個保加利亞的兵士打死。於是兩國的兵士便互相衝突起來，各有死傷。到了二十二日，秩序已經恢復。但是希臘政府激於民氣，竟派了大批的軍隊，侵入保加利亞國境。保加利亞一面採取守勢，不與交鋒；一面訴諸國際聯盟，請求解決。國際聯盟行政院在英法代表指導之下，於是派了一個調查團去調查眞相。結果行政院根據調查團的報告，令希臘賠償三千萬里拉了事。在保加利亞方面固然樂意接受，在希臘方面爲列強所迫，也不敢不從。所以國際聯盟對於解決小國間的爭端是有效力的。

至於強國與弱國間的爭端，國際聯盟便毫無辦法。不但對這次日本侵略東北事件是如此，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我們且舉柯夫事件爲證。

一九二三年意人載林尼將軍 General Tellini 正在領着一個委員會，在那裏勘查阿爾巴尼亞與希臘兩國的邊界。希臘人認爲載林尼有意偏袒阿爾巴尼亞，不勝忿怒。於是竟有激烈分子數人，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把載林尼以下四個意大利人，及一個阿爾巴尼亞人（担任翻譯）殺於途中，逃匿無蹤。事出之後，意大利全國震怒。墨梭里尼政府旋於八月二十九日，向希臘提出七項要求，其中有下列三項希臘不能立即答應：（一）澈查此次犯罪原委，並須允許意大利駐希公使館的侍從武官參加；（二）犯罪者一律處以死刑；（三）五日之內，賠償五千萬里拉。意大利政府便於八月卅一日不顧一切，派出海軍，將柯夫島實行佔領。次日希臘訴諸國際聯盟。意大利代表聲明這與意大利國體有關，國聯不應干涉。國聯竟無可奈何。結果乃由法英日意四國公使會議出來解決。

從此可見國際聯盟對於強國與弱國間的爭端，是無法拘束強國的行動的。所以這次日本於九月十八日佔領東北，我們於九月十九日便請求國際聯盟立派調查團到滿洲去調

査眞相，日本代表一反對，國際聯盟便不敢有何決議。到九月二十二日，爲敷衍中國起見，國聯才發出要求兩國立卽撤兵的滑稽通告。明知滿洲是中國領土，日本是喧賓奪主，不單叫日本撤兵，而叫兩國撤兵，已經是不通的辦法；何況牠明知中國軍隊已一撤再撤，撤而不及，且被日人繳械槍殺，試問就是中國軍隊要撤，又撤到何處爲止？我們當局不察，以爲這是外交勝利，大肆宣傳，要我們一班國民『鎭靜』，『靜待國際聯盟的處置』，眞是『挫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

現在好了，國際聯盟的大會與行政院都已閉會了，我們的要求都被拒絕了，就是行政院再開會也沒有什麽用處了，我們倚賴國際聯盟的好夢可以醒了！

但是我們的政府還在指靠非戰公約。什麽是非戰公約？該約有下列兩條：

(一)各締約國，各以其代表之民族的名義，鄭重宣言，不訴諸戰爭，以解決國際糾紛，並在彼此關係間，廢止戰爭以作國家政策的工具。

(二)各締約國，承認各國一切糾紛或衝突，無論其性質若何，原因若何，均當用

和平方法解決之。

非戰公約，表面看來，未嘗不冠冕堂皇，然而實際不過是一紙不着實際的空文。第一，所謂須用『和平方法』解決糾紛，『和平方法』究竟是什麼，該約並無交代。是不是直接談判？斡旋？調停？裁判？和解委員會？強制仲裁？抑非強制仲裁？都沒有提到。那麼所謂『和平方法』不過是一句空話。第二，如果有人不用『和平方法』去解決國際糾紛，仍用戰爭作國家政策的工具，試問有什麼制裁？有什麼機關制裁？國內社會有警察用武力去制止糾紛，誰犯了罪便捉誰到衙門裏面去，所以能夠維持秩序。試問國際的警察在那裏？武力制裁的機關在那裏？就是有人故意破壞非戰公約，大家也只好望着。所以非戰公約的效力還遠不如國際聯盟。第三，所謂『廢止戰爭以作國家政策的工具，』並沒有廢止戰爭以作防禦的工具。換句話說，該約文字上所廢止的是『侵略的戰爭，』『不是『防禦的戰爭。』但是什麼叫做『侵略的戰爭，』什麼叫做『防禦的戰爭，』那是沒有標準的。就是開始歐戰的德國，也說她是爲自衞而戰。我想世界上決不會有自

已承認是侵略人家的國家的。這次日本侵佔東北，她也是說出於自衛，並且沒有對中國『宣戰』，所以沒有破壞非戰公約。一九二八年，俄國進攻中東鐵路，也是一樣的說法。試問非戰公約還有什麼價值？若有價值，恐怕大家以後都是用『戰而不宣』的辦法，及自衛的名義。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談話：『此次日本行動，尚無違背非戰公約之處，故簽字國家尚不能據此發言云云。』可見我們訴諸非戰公約，毫無用處。然而我們被學生毆傷的外交部長，在九月廿四日向新聞記者還說：『現在此事，既提出國聯，應視國聯及非戰公約各國進行如何。……故此案祇有靜聽國聯辦理。』國際聯盟結果如彼，非戰公約結果如此，這是『倚賴外交』應得的教訓！我們不應該怨天，不應該怨人，應該怪自己奴性太深！

因為政府只希望國際第三者出來干涉，不知自救；因為中央『深信公理尚未泯滅，強權必受裁判，』所以一則曰『必須堅定沉着，』再則曰『加倍刻苦』。所謂『沉着』，

所謂『刻苦』，卽是不願有民氣的表現。因爲我們的領袖『相信凡國際聯盟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的裁判』，所以一則曰『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再則曰『此時務須民衆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做軌外之妄動。』所謂『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卽完全倚賴外人的態度；所謂『勿做軌外之妄動，』卽是叫人民取不抵抗主義。『鎮靜』其名，『待斃』其實，我不知當局是何居心？

怕民衆運動監督外交嗎？那麽國事到了這種地步，國民實在不能不問；不問，卽是放棄國民應盡的天職。站在國民的立場，我們不管是『革命的』政府也好，『不革命的』政府也好，如果政府做的事不錯，我們自然應該贊助，政府做的事不對，我們自然應該批評。這就是監督的意思，這也就是做公民的責任。孫中山先生以前對於北京政府的外交，時常勉勵國民去監督，那麽我們現在起來監督南京政府，當然不是違背總理的遺教。

怕民衆運動有反政府的趨向嗎？若政府事事公開，不違反民意，全國民衆在此危急

存亡之秋，同心協力擁護之不暇，稍有天良，何敢與政府為難？試看現在全國各界，莫不主張一致對外。所不能一致對外者，倒不是我們一般國民，而是一班領袖同志。反對政府者，也不是我們一般國民，而是一班『眞實同志』。可知我們一般國民沒有什麼不一致，沒有什麼『統一』，更沒有什麼反對政府。更可知我們的愛國運動，是完全激於天良，此心無他。若政府一面要國民『鎭靜』，一面預備斷送國權，將來喪權辱國，羣情憤慨，相激相盪，其禍更不知伊於胡底！

怕『反動』份子利用機會嗎？則愛國為國民天職，人人有參加義務，只要其不出範圍，又何必因噎廢食。否則，過事壓迫，民情鬱結，『反動』份子，倒易利用，其危險當數百倍於公開自由的運動。現在政府當局只知防範愛國運動，不知防範賣國運動；只知怕『反動』份子利用愛國，不知怕『反動』分子利用賣國，這於自己的地位多麼危險啊！

時至今日，國家以人民的血汗，養兵數百萬，只能用於同室操戈，而不能用於對外作戰；只能用於壓迫人民，而不能用於反抗日本，天下痛心之事，孰有過於此者？據日

本政府宣言，此次日軍進佔滿洲，總共不過一萬四百人，而中國在滿軍隊，則有二十萬之衆。以二十倍之軍隊，竟至毫無抵抗，被槍殺，被繳械，懦弱醜態，暴露無餘。東省當局負有捍衛國土的責任，不待中央的訓令，竟下令取『無抵抗主義』。在昔帝王時代，官吏還知以身殉國，到了今日『黨國』時代，一國副座倒以『無抵抗』三字斷送滿洲。天下奇辱大恥，還有甚於此者嗎？

回想鴉片之戰，英法聯軍之戰，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之戰，我們雖戰戰俱敗，但是我們還有應戰的勇氣。丁汝昌到了北洋艦隊實在無可爲的時候，還知以身報國。到了今日，不料服膺三民主義的『武裝同志』，擁了數百萬大軍，只知勇於私鬥，而不知指戈向外。人心至此，還不讓民氣充分自由表示出來，那麼請問政府當局，又何所恃而不恐？

五

抗議沒有效力、訴諸國際聯盟沒有結果，訴諸非戰公約無人理會，國際上沒有第三

者出來援助我們。事到如今，不是我們對政府發牢騷的時候，更不是我們鬧黨見的時候。我們現在應該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來反抗狠心狗胆的日本。我痛定思痛，我毫無偏見，我敢負責大聲疾呼下列兩事於我全國同胞之前：

對外準備殊死戰爭，與日拚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

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

我爲什麼主張準備對日宣戰？有下列理由：

（一）我認爲這次對日，到了這種實偪處此的環境底下，只有兩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條件，是爲屈服，是爲賣國，是爲亡國；一是拒絕日本的條件，便非準備對日戰爭不可。除此以外，別無他路。國際聯盟不能積極干涉，非戰公約不能給我保護，如果不願任人宰割，只有與日拚命。事無兩全，義無兩可。日本『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我們『欲保存中國，必先奪回滿蒙。』怎樣奪回滿蒙？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非用武力不可。滿蒙已在日本掌握之中，不戰已失去滿蒙；就是戰也不過失去滿蒙。與其

毫無抵抗的斷送，不如痛痛快快的給她割去。何況戰爭的結果，不一定是我們失敗。我們為奪回滿洲不能不戰，我們為保存中國本部，更不能不戰。

（二）我認為內戰不如外戰，同室操戈不如一致禦侮。若是我們不乘此機會，化除黨見，同仇敵愾，與日拚命，三數月後，事過境遷，黨派爭權爭利，又將厮殺起來。證諸往事，歷歷可數。國家養兵原為衛國，現在國家已被人侵佔，此時不用，更待何時？

（三）我認為與日戰爭，可以促成國家統一。凡是四分五裂的國家，往往利用對外戰爭的機會，團結全國國民，消滅一切內亂，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勝固可以馬上實現統一，敗也可以種下統一的基礎。我們知道，普魯士的統一德意志，不能不歸功於三次對外戰爭：第一，為一八六四年對丹麥之戰；第二，為一八六六年對奧國之戰；第三，為一八七〇年對法國之戰。我們也知道，撒丁尼亞的統一意大利，也經過兩次對外戰爭：第一，是一八五六年加入英法對俄之戰；第二，是一八五九年聯法對奧之戰。就是土耳其的復興，也是一九二一年對希臘戰爭的結果。現在我們中國，名義上雖有一個中

央政府，而事實上兩廣已經獨立，其餘各省也等於割據。我們若能對日宣戰，則大家爲愛國心所激動，全國國民所逼迫，當可犧牲一切意見，拋棄個人地位，把軍隊統一起來，與日周旋。假使僥倖而勝，國家統一，當然不成問題。卽使完全失敗，全國國民更加會團結起來，以推翻日本的壓迫，再不會在亡國情形之下，自相殘殺。

（四）我認爲與日本作戰，我們固然勢在必敗，須受極大犧牲；但我們若能與日本拚命到底，則日本也須受極大損失。我們知道現在日本經濟已有危機，政局也不穩固，戰爭若遷延過久，社會必起革命。一九一四年的德國，較之今日的日本，富強何啻數倍，但困戰四年，民怨沸騰；結果革命暴發之日，便是德軍潰敗之時。

（五）我認爲與日本作殊死戰，才能引起國際干涉，外人同情。若像現在日本進一步，我們退二步，毫無抵抗，自然談不上戰爭。戰爭是要兩方面發生衝突的。現在沒有衝突，當然沒有戰爭，也當然沒有破壞世界和平。國際上第三者，就是想要出來干涉，也不便干涉，也無從干涉。況且西洋人素來是看不起奴隸成性，倚賴人家的懦夫。所謂

『公理』，所謂『正義』，在他們心目中，不是對這種人講的。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不起來反抗，外人決不會與我們表示同情。在日本方面，自然願意把『大事化小』，看做『地方問題』，以避免國際的干涉。在我們方面，應該把這事擴大，變成國際上的重大問題，使列強共同加入干涉。但如何能擴大範圍，便非與日本戰爭不可。只有與日本戰爭，才能危害各國商業，與世界和平；也只有危害各國商業與世界和平，才能使各國感到切身的利害，出來積極干涉。我們被壓迫到這種地步，還有什麼顧慮，還怕什麼損失。我要大聲疾呼，告訴大家：我們唯一的出路，現在只有與日本拚命！我們現在唯一的損失，只有日人加在我們身上的足鍊手銬！

（六）我認爲與日戰爭，即使完全失敗，在遠久看來，仍是成功。因爲這種反抗的精神，不但可以寒帝國主義者之胆，並且可以激起犧牲奮鬥的精神，急公好義的美德，而爲全個民族奠下復興的基礎。一千九百年義和團之亂，雖是一種盲目的排外運動，但自是以後，外人瓜分中國的觀念，不能不稍爲斂跡。並且中國社會到了這種黑暗地步，

沒有絕大的刺激，不會覺悟，沒有絕大的犧牲，不會驚醒。我們現在應利用對外戰爭的機會，來洗除自私自利的觀念，排去猜疑陰謀的心理，打破倚賴怯懦的性質，喚起民族的精神，團結全民的意志。我們今日對日戰爭，乃自衛之戰，死裏求生之戰。戰而後能蘇已死的人心！戰而後能振已頹的民氣！戰後而能恢復將滅未滅的民族精神！戰雖必敗，必喪師，必失地，必流血，必受極大的慘痛，然我民族精神，得賴以不死，我中華民國終不至於滅亡！

（七）我認為爭民族的人格起見，也非與日本死戰不可。一個個人，須有廉恥，才能齒於人類。一個民族，須有廉恥，才有顏立於世界。現在日本佔領我土地，殺戮我人民，搗毀我財產，以奴隸待我，以犬馬視我，我們如果沒有絲毫抵抗，只知苟且偷安，那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這種民族，亡絕滅絕，有何足惜。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比利時何嘗不知敵不過德國，然而因為要保守中立的地位，國家的尊嚴，國民的人格，不惜與德國肉血相搏，犧牲一切，在所不顧；雖被德國暫時征服，仍佔最後勝利。這種忠烈

的國民，將永爲人類敬佩；這種反抗的精神，將永爲公理的保障。今日本的實力，遠不如德國，而我們的實力，又超過於比利時。比利時爲一借路問題，尙且不惜拚命；現在我們爲全個東北問題，還不敢與日本開戰。這種懦弱民族，試問有何面目生存於今日的世界？

『士可殺，不可辱；』『國可破，不可屈。』我們爲爭民族的人格，人類的尊嚴，決不可拿『鎮靜』來掩飾『怯懦』；更不可拿『忍耐』來苟延殘喘。我們現在應該『殺身成仁』。我們現在應該『舍生取義』。我們愛和平，我們更愛正義，但是我們決不怕強權。這才是偉大民族的偉大精神！

（八）我認爲與日戰爭，可以保存國民黨的領袖地位。國民黨的勢力，自癸丑革命以後，因爲袁世凱的壓迫，一蹶不振。其所以能夠復興起來，把北洋軍閥打倒，取得政權，不能不說由於在五四，五卅兩種愛國運動裏面，國民黨能站在民衆前面，與帝國主義作英勇的奮鬥。若這次日本空前的侵略，國民黨大權在手，沒有堅決的表示，甚至於

反而壓迫救國運動，那麼『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國民黨終必被人打倒無疑。

這是我的主戰論。此而決定，我們才能談到『準備』的重要方針。

第一，我們要『停止一切內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我們現在要不許耗費一粒子彈，去對付同胞。我們要把我們的槍，砲，大刀的目標，一齊指向我們的敵人。如今南京與廣東的和議有告成的希望，便是國民黨團結起來的好現象。如今共產黨有停止暴動，一致對外的消息，更是全國國民團結起來的福音。我們現在應該拋開黨派的立場，大家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來奮鬥。這是我們痛哭流淚懺悔的機會，這是我們舉國一致合作的機會。國民黨當局諸公代理我四萬萬同胞處理國政，若以三四老同志的糾紛，而繼續內亂，而延長外侮，而斷送國家，試問於心何忍？我國民本統一，我當局不統一；我當局不統一，我國民必促其和平統一。惟有統一的國家與統一的政府，才能一致對外，一致禦侮。

第二，我們要全民軍事訓練。大學生固然要趕快受軍事教育，其他各階級也須受軍

事教育。全國民衆武裝起來，須使於最短時間以內，辦到工人一出工廠，商人一出店門，學生一出學校，使可直接跑去疆場效命。人人是兵，個個是兵，以四萬萬的民族，對六千萬的日人，那裏沒有辦法？

第三，我們要集中兵力財力。把所有個人的軍隊，變成國家的軍隊，不許分什麼奉軍，粵軍等等名目，都直接歸中央政府指揮。至於經濟，則消極方面，須根本剷除貪汚，積極方面，必須把全國經濟力量，全盤計算，定出一個戰時財政的計畫。

第四，我們要確定外交方針。積極方面，第一須以對日爲標準，去聯絡列強，打倒這個『第二德意志帝國』；第二，須與日本斷絕國交，以表示我們不甘屈服的堅決態度。消極方面，第一，我們要反對地方交涉，謹防張學良爲保存私人地位，犧牲一切利權；第二，我們要反對滿蒙的獨立運動，打破日人吞併的陰謀。

凡此種種大政方針，能否上下一致，萬衆一心，去努力實現，還要看第二個根本主張，能否辦到。卽是

『對內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

據九月廿五日報載立法監察兩院聯席會議，通過『徵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可見政府當局，也有覺悟。但是如何可以『徵集全國人才』，如何可以『組織賢能政府』，便不能不進一步取消一黨專政。有了一黨專政，黨外人才便難與國民黨合作，便無法集中全國人才，便無從實現賢能政府。兩院委員諸公，想明知之，特不敢言耳。我們謹以下列理由，貢獻於國民黨之前，知我罪我，在所不顧。

（一）取消一黨專政，可以伸張民氣。今日中國民氣銷沉已極，回顧五四，五卅，相去不知幾千萬倍。推其原因，一黨專政，不能不負責任。在一黨專政之下，問其名曰民國，究其實爲黨國。所謂黨國，卽是黨的國家，而非人民的國家。人民對於國事既無權過問，當然對於國家觀念也就日形淡薄。大家以爲國家爲黨所有，一切國事有黨負責，我們小民儘可得過且過。就是有少數急公好義的愛國志士，也因言論行動，不能自由；稍有動作，不是被認爲『反動』，便被指爲『反革命』，干涉拘捕，無微不至。在

這種空氣之下，當然只有官辦的民衆運動，沒有自動的民衆運動。黨部監視，名爲『指導；』政府鉗制，名爲『鎮靜。』國民攝於威壓，人心變成麻木，國事如此，民氣如此，尙可問乎？

（二）取消一黨專政，可以團結全國國民。在一黨專政之下，黨高於國，國屬於黨，黨員構成統治階級，國民構成被治奴隸。一班國民，平常既無參加國事的權利，今遇這種外交問題，若仍不開放黨禁，使其參加政治，而欲其與國民黨合作，萬衆一心，以聽政府的指揮，在理論上講不過去，事實上也不可能。於是一般國民，不是趨於消極，不管國事；卽是趨於『反動』，與政府爲難。兩者都非『黨國』之福。

（三）取消一黨專政，可以集中全國人才。今日國民黨人才不足，當局諸公己揚言不諱。以現今國民黨的力量，對付內政，還不能令人滿意；以之單獨對付這次日本侵略，當然只有失敗。英國勞工黨政府，因經濟問題的嚴重，還犧牲自己的地位，而與保守自由兩黨組織國家緊急政府。今日本佔領東北，較之英國經濟問題，其嚴重不知幾千

萬萬。時至今日，若還不開放黨禁，集中人才，那末『以黨亡國』之禍，恐怕『雖不中不遠矣。』

（四）取消一黨專政，可以減輕國民黨的責任。此次對日外交，責任何等重大。國家的前途，民族的生死，與夫東北的存亡，都在此一舉。若國民黨仍不讓國民共參國政，還要繼續包辦下去，如李烈鈞先生等所言『國體號稱共和，政治無殊專制，……刑戮在口，爵賞由心，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權剝奪以盡，報紙輿論束縛無遺。』那麼萬一外交失敗，則『以黨亡國』之罪，萬無逃於全國國民之口。

（五）取消一黨專政，對外才能理直氣壯。若國民黨在國內形成一特殊階級，把持政權，不肯放鬆，以自己為刀俎，以人民為魚肉，強權就是公理，武力就是法律，試問這種統治與日本的壓迫，除了國界以外，有多少分別？站在做人的立場，試問做國內的奴隸，與做國外的奴隸，又有多少分別？我們要向國際要求公理，我們自己要先講公理。我們要向國際呼籲正義，我們自己要先講正義。我們要向國際祈求人道，我們自己

要先講人道。現在當局諸公，只知委曲求全，謀南京與廣東兩方同志的合作，心目中好像絕對沒有看見我們一般國民的存在。黨內僅可以相爭相打，國民連言論也失掉自由。我爲公理，正義，人道起見，也不能不致鄭重的抗議。

顧維鈞先生在北平對記者說，『現在有何黨之可言』，是痛心的話，也是一針見血的話。須知就是在西洋黨治最嚴的國家，一遇國家緊急問題發生，莫不犧牲黨見，集中全國人才，一致對外。一八七〇年，普兵進逼巴黎，法國乃有國民會議的召集，網羅各黨，同舟共濟。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英法都馬上成立混合政府，集中各黨人才，以與德意志戰。今我國除非願意俯首聽日人的宰割則已；如欲同心同德，羣策羣力，準備與日本作殊死戰爭，則對內非取消一黨專政，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不可；換句話說，也就是李烈鈞先生等九月二十日通電所言，『全國同胞，咸參國事，庶能集天下智能，應茲鉅艱』。

時至今日，國民黨當政諸公，須知『取消訓政，取消黨治，已喧騰一般人之口，而

一般智識階級，與夫社會中堅分子，接近民衆者，對於政府目笑腹誹，已成爲公開之祕密。』『我國民黨同志『其知之否耶？』』（見十月九日申報鄭洪年致戴季陶電）。

附註　至於取消一黨專政以後如何組織國防政府，我想等國民黨對於這種呼聲，有接受的表示後，當作長文討論。不過現在政府馬上應該決定的：(一)開放言論自由，使一般國民能起來督察當局，不至於『逼上梁山』，去做反政府的革命運動。(二)解放民衆運動，使全國一盤散沙的人民，能在最短期內自由組織起來，做外交的後盾。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曾由新月書店用小册子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發行。）

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

——批評汪精衞于右任二氏的言論——

自從有一部份被邀的國難會員，提出結束黨治，實施民治的主張以後，於是訓政與憲政問題，漸引起社會上深切的注意。國民黨領袖，如汪精衞，胡漢民，孫科，于右任諸氏，都有意見發表。汪于兩氏是反對結束訓政的。孫氏是贊成結束訓政的。胡氏則態度很欠明瞭。我是研究政治並且是主張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人，對於這個重要問題，不能不貢獻一點愚見。

按汪于兩氏反對結束訓政的理由，分析出來有四：(一)認爲中國人民程度太低，非經過國民黨的訓政，不能運用民主政治，實行憲政；(二)認爲沒有國民黨，便沒有中華民國，而破壞訓政，便是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中華民國；(三)過去的憲

政，成績不好，所以現在不應實行憲政；(四)現在主張憲政的人，有些是從前的『官僚政客』，他們不配談憲政。

先就反對結束訓政的第一個理由來討論，認為中國人民程度太低，非經過國民黨的訓政，不能運用民主政治實行憲政。這個理由，至少須建築在下列幾個基礎上，才能自圓其說：(一)國民黨本身健全；(二)國民黨的黨員是全國的優秀分子；(三)國民黨過去訓政很有成績。若是國民黨本身四分五裂，沒有整個黨的組織，黨的意志，黨的方針，試問怎樣去『訓』？若是國民黨本身充滿了新舊官僚政客軍閥，不但不是全國的優秀，並是有許多是社會的敗類，試問又何以為『訓』？若是訓政五年，『訓』到喪權辱國，內亂不已，土匪到處如麻，貪官遍國都是，國家頻亡，民不聊生，試問再要這樣『訓』下去，如何得了？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不容諱言，也不能諱言的。國民黨能否訓政，應否繼續訓政，就看他是否具備上列三個條件。否則，國民黨就不配講訓政，就應該結束訓政。本來訓政的根本理論，是從『賢人政治』出發，應該由『賢』去訓『不肖』，

由少數人去統治多數人。但是那些少數人是『賢者』？那些多數人是『不肖』？這是過去擁護貴族政體，今日主張訓政制度者，所不能答覆的問題。貴族政體的理論失敗在此，訓政政體的理論失敗也在此。貴族政體是少數人操有政權，而大多數國民沒有參政機會的政治。所以今日國民黨的訓政，也可以說是貴族政體之一種方式。主張貴族政體的人，有些根據於血統，說應該由少數世襲的貴族，去統治多數的平民。但是貴族家裏的子弟，多是不懂世故的少爺公子。有些根據於財富，說應該由少數有資產的人，去統治多數無錢的人。但是富豪並不一定有政治能力。有些根據於智識，說應該由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去統治多數沒有智識的人。但是智識階級，有許多是書呆子。現在請問國民黨訓政式的貴族政體，是根據什麼來的？既不是根據於血統，又不是根據於財富，也不是根據於教育，乃是名則根據於黨籍，實則附庸於軍閥。若說凡是國民黨員，便是賢者，便是全國優秀，便是先知先覺，便應做統治階級。若說凡不是國民黨員，便是不肖，便是後知後覺，便應做被治奴隸。這種『貴族』標準，未免太不合理。何況事實告

訴我們，現在的國民黨員，有許多在人格，學問，才能各方面都不高明呢。

上面是說國民黨不能『訓』，不配『訓』的理由。就是假定國民黨能『訓』，配『訓』，政治的歷史告訴我們，既講訓政，決不能講民主政治。第一是理論上的不通。有了『訓』的統治階級，及『被訓』的被統治階級，汪氏還要說能『培養民權』，『人民的權力，在時間上，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在空間上，是一天一天的擴大』，這是騙人的話。民權的發展，是要自動的。若是『被訓』出來的，便不是民權了。翻開世界各國歷史，請問那國的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訓』出來的？請問那一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爭得來的？第二是事實上的不通。凡是拿到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願意放手。這是人類普遍的天性，各國的政治歷史都可證明。訓政學說希望訓政的統治階級，訓練一般人民去奪取他們獨佔的政權，由訓政到憲政，那也是欺人之談。過去國民黨的訓政是怎樣，將來國民黨的訓政大概也是怎樣。不說別個，汪于兩氏便是第一個拿到政權不放手的。所以講訓政，就不能講民主政治。

反對結束訓政的第二個理由是說，沒有國民黨，便沒有中華民國；而破壞訓政，便是破壞國民黨；破壞國民黨，便是破壞中華民國。這不但是不通的邏輯，並且有意侮辱我全國人民。現在且分開來說，先討論是否沒有國民黨便沒有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產生，是有許多原因促成的，如西洋文化的侵入，外患的壓迫，清廷的腐敗，工業革命的影響，這都是革命的根本原因。即就推翻滿清的統治而言，國民黨外，還有許多個人或團體都有功勞。現在汪于兩氏一筆抹煞，不是出於無知，便是故意誇大。何況革滿清的命，不僅是國民黨一個團體在那裏做，更不是現在的國民黨員在那裏做。倒袁之役，主要的力量不是國民黨。並且進一步來講，中華民國現在之瀕於危亡，現在的國民黨員應負很大的責任。事到如今，強倭入室，執政的國民黨領袖，如汪于兩氏，不向我全國國民告罪，還要在那裏說沒有國民黨便沒有中華民國，這眞豈有此理！

至於破壞訓政，是否就是破壞國民黨，若是放眼看看民主國的政黨政治，便不難解答了。政黨並不一定要訓政，取消訓政並非取消訓政的黨。國民黨以前沒有訓政，固然

是黨；卽使現在結束訓政，仍然是黨。我們之所以主張結束訓政，不過想取消國民黨壟斷政權的特殊地位而已。從一方面看來，不但不是破壞國民黨，並且是想保全國民黨的政治生命，免得被人家革命。

說到破壞國民黨就是破壞中華民國，那更是笑話！中華民國不是國民黨的寄生物；反之，國民黨倒是中華民國的寄生物。國民黨消滅，中華民國不一定消滅。中華民國消滅，國民黨必然消滅。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並且像國民黨近幾年來的幹法，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壓迫人民，黨高於國，有黨無國，卽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推翻國民黨的政權，也未始不是擁護中華民國之一辦法。

反對結束訓政的第三個理由，說過去的憲政，成績不好，所以實在不應實行憲政。其實過去何嘗眞正實行過憲政？汪氏自己也說袁世凱及北洋軍閥，官僚，政客們破壞了憲政。那麼『成績不好』，乃是沒有實行憲政的結果。如果實行憲政，又何至有袁世凱的稱帝，國會的被解散，軍閥的互相火併，以至於孫中山在廣東做非常總統。這些事實，

正是證明憲政的必要，與破壞及反對憲政者的罪惡。汪于兩氏既痛罵破壞憲政的官僚政客於前，又爲何自己做反對實行憲政的官僚政客於後？

反對結束訓政的第四個理由，說現在有些主張憲政的人，是從前的官僚政客，他們不配談憲政。中國現在應否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是一事，從前的官僚政客配談與否又是一事。如果中國應實行憲政，那麽無論那個談，都應實行的；不能『以人廢言』，更不能『因噎廢食』。對事對人，應該分開。何況從前的官僚政客，未必壞於現在的官僚政客呢？

上面所駁反對結束訓政的理由，都是汪于兩氏共同的意見，不過汪氏更說得明顯有條理罷了。此外汪于兩氏還有些話，有分別糾正的必要。

譬如汪精衛氏說：『…當時的臨時約法憲法，都是國民黨黨員製造出來制裁袁世凱和鞏固民國的基礎的，所以他們要打倒國民黨，便要破壞憲政』。這樣看來，國民黨及汪氏自己原來是主張憲政的，並且認爲破壞憲政的人是不對的。那末現在汪氏又爲什麽

要反對憲政，痛罵主張憲政的人？難道現在一般國民的程度，反不如民國初年的時候嗎？抑是因爲以前國民黨沒有拿到政權，所以『製造臨時約法憲法出來，制裁袁世凱』。現在因爲政權已經到手，所以痛罵主張憲政來制裁一黨專政和鞏固民國的人。

又譬如汪氏說：『……中國至今還沒憲政，但這是什麽原故呢，這是自從民國以來，憲政都被他們一次，二次，三次破壞盡了』。北京政府時代，憲政之不能實行，從前的官僚政客，固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但是最大的阻力還是袁世凱及其遺留的北洋軍閥。這是汪氏要認淸楚的。而自從國民黨執政權以來，完全不要憲政，改民國爲黨國；又是誰之過呢？從前的官僚政客，充其量不過是破壞憲政，現在的官僚政客，根本就不要憲政。汪氏何以『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

再譬如汪氏說：『由民國十七年或十八年訓政開始起，至今只有三年的時期。如果沒有內部的一切糾紛，當然可以做得比較好些。但是以中國之大，其範圍之遼闊，情形之複雜，若謂以一二年便可以將中國完全做好，這是誰也做不到的』。其實自國民黨專

政以來，至今已有六年。『以中國之大』，我們當然不應希望『將中國完全做好』，但是國民黨既以『革命黨』自居，以『訓政』爲名，至少總要比北京政府時代做得好一點，才有資格罵人，才有資格訓政。但是，請問外交內政，那處能夠比得上從前？只有貪污的程度，內亂的迅速，及賣國的手段，比從前利害罷了。汪氏沒有上台的時候，攻擊南京政府沒有成績，比任何人都兇。現在汪氏上台了，擁護南京政府，也比任何人都兇。何前後矛盾若是？其實，『國民黨做得不好』，『有事實可以證明的』，汪氏自己何嘗不明白？就是所謂『內部的一切糾紛』，都是你們國民黨文武同志自己鬧出來的，都是以訓政自居的『先知先覺』鬧出來的；汪氏自己的翻來覆去，特別要負嚴重責任。這又與我們小民何干？汪氏不但不承認國民黨及他自己有絲毫的過錯，並且好像還要把罪狀擱在我們一般國民的頭上，這又是豈有此理！

至於于右任氏的話，更有許多莫明其妙。玆簡單指出其錯誤之大者：（一）誠如孫哲生氏所言，『于先生最大錯誤，就是不能承認本黨（國民黨）以往的過失，以爲本黨還是

一個健全的革命黨，因此他便有『本黨之能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自是基於客觀事實之決定』。其實國民黨現在爲軍閥官僚政客所盤據，不但不能領導革命，並且事實上日趨於被革命之列。(二)『本黨所求之憲政，乃革命之憲政，憲法乃革命之憲法，而惟有革命之人民乃克受之行之耳』。讀遍政治學書籍，査盡各國字典，恐找不出『革命之憲政』一名詞。稍有政治常識者，卽知憲政與革命，不能相容。憲政之下，不容革命；革命之下，不顧憲政。至於『革命之人民』，更不要什麽憲法憲政，今我們之所以主張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正是不革命之人民，要求不革命之憲政耳。我們若是眞革起命來，何暇談什麽憲政憲法。到了那時，就是國民黨像滿清末年，匆匆預備立憲，我們也必如先總理所行，置之不理。至於『受之行之』，更是談不到。(三)『在此國難時期間，使國人監督政治，導國人參加政治，實爲天經地義之事』。若國人參政爲天經地義，則應結束訓政，實施民治。但于氏一面說人民參政是天經地義，一面又說國民黨訓政是天經地義。到底那個是天經地義？請于氏有以語我來！其實有一黨專政，便沒有民主政治；有

民主政治，便沒有一黨專政，兩者同時不能做天經地義。(四)『黨以民主集權之形式治黨治政，猶虞散漫不給，厥何取於泛民主之虛名，而受無組織之實禍乎』。就此點看來，于氏根本上就不相信民主政治，認爲民主組織散漫，有害無益。黨用之『猶虞不給』；國用之，將受『實禍』。由此推論，于氏的思想，不但要主張國民黨專政，並且要主張個人獨裁，以至於君主專制。(五)于氏認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乃是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之主張。其實共產黨根本就不管什麼訓政與憲政。他的手段，老實不客氣，是要革國民黨的命的。國家主義派雖然比較緩和，但是也不很熱心於此。因爲他們也在準備革命的武力。只有像我們這種手無寸鐵的教書匠，及態度溫和的人，才來向國民黨談什麼訓政與憲政。(六)于氏反對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什麼叫做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什麼是非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于氏並沒有交待一句。照國民黨現在的訓法，根據于氏的腦筋，恐怕我們連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也不可得。(七)于氏痛毀民元之約法與曹錕的憲法，但是一九三一年國民黨御用的國民會議所通過的國民約法，請于氏回顧一回顧

又何如乎？口口聲聲罵他人為『軍閥』，為『官僚』，為『此時代之遺骸』，『革命之塵滓』，于氏其反躬自視，並視今日的國民黨，又是什麼乎？舊官僚政客今日起來主張憲政，誠如于氏所言，未必有『席政權』之理；但其為『出墟墓』，返人魂，我不敢拒絕。所怕者，今日之『軍閥』，『官僚』，『此時代之遺骸』，『革命之塵滓』，還想假訓政，『席政權』，『入墟墓』耳。可不悲哉！

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本文曾在上海申報，新聞報，及時事新報發表過。）

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

前次我在各報發表對於訓政與憲政的意見一文，側重在批評訓政的理由，沒有詳細說到為什麼要實行憲政。該文既然引起不少的注意，我似乎有進一步來申述我的主張的必要。

什麼叫做憲政？簡單答覆：根據憲法而行的政治，便叫做憲政。那麼又什麼叫做憲法？憲法可說是國家的根本組織法。這種根本組織法，大概包括兩種重要成分：第一是國家最重要機關的結構，職權，及其彼此相互的關係；第二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惟其因為憲法是規定國家根本組織的法律，所以牠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並且惟其因為憲法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所以憲法比普通法律更加重要。憲法可以拘束普通法律；普通法律不能抵觸憲法。因此，憲法的制定，往往有特別的機關與手續，以表示其尊嚴。憲法的修改，往往有特別的機關與手續，以表示其慎重。

依照上面我們的解釋，須根據憲法而行的政治，才能叫做憲政，那麽實行憲政，必須先有憲法；有了憲法，還須實際施行。沒有憲法，固不成其爲憲政；只有憲法，而不實行，也不成其爲憲政。現在中國沒有憲法，自然談不上憲政；曹錕時代，有了憲法，而不能運用，也談不上憲政。憲政既是根據國家根本組織的法律而行的政治，所以牠第一個特點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憲法的成立，不管牠是人民直接或間接制定的也好，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方協定的也好，統治者單方所頒布的也好，大概都是經過人民一番奮鬥得來的。沒有經過奮鬥得來的憲法，人民對牠沒有相當認識，不知寶貴；結果恐怕只有具文，沒有實質；只見憲法，不見憲政。惟其因爲憲政大概是人民奮鬥得來的，所以實行憲政的國家，至少總有一部分人民參加政治。因此憲政的第二個特點，是人民參加的政治，不是統治者獨裁的政治。

明乎上面那些要義，我們可以開始討論爲什麽中國應實行憲政。

大凡一國政治的改變，不外兩個路徑：一是改良，一是革命。改良不用武力，革命非用武力不可。在實行憲政的國家，因爲政治的爭鬥有軌道可循，無論那黨那派，如想取得政權，實行主張，可以去競爭選舉。選舉的結果，誰佔優勢，誰便在朝，誰歸失敗，誰便在野。這種辦法，第一是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的機會；第二是政治鬥爭的方式不用槍桿子，而用選舉票；第三是最後的裁判者是人民，而不是出於競爭者自己的意志。全個政治組織，都根據於憲法；全國各種勢力，都歸納於軌道，循序改進，用不着革命。

反之在寡頭專制政體的國家，很容易發生革命。其原因有二：一是起於寡頭政體之內，一是起於寡頭政體之外。前者是因爲寡頭政體的內訌而發生；後者是因爲人民的反抗而釀成。前者的意義比較小，後者的意義比較大。

所謂寡頭政體，不管牠表面上採什麼形式，其要義不外是少數包辦全國的政權，使大多數人民沒有參政的機會。至於其所賴以維持寡頭政府的工具，分析起來，最後無一

不是靠赤裸裸的武力。站在寡頭政體上的辯士，無論用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替牠掩飾，然而這兩個根本原則是無法可以否認的。

寡頭政體既然建築在武力的上面，那麼這種武力究竟可靠不可靠呢？若是可靠，那麼寡頭政體還是一種安定的統治；否則，便要時常發生革命。據我們從歷史上看來，寡頭政體的武力是靠不住的，隨時有叛變的危險。原因是所謂軍隊，大家爲着飯碗而來，其所以服從某個長官，並不是出於公民服務國家的忠誠，乃是爲生活所迫，不得不幹。這種軍隊，沒有正當的愛國觀念爲其行動的標準，乃是個人的軍隊，派系的軍隊，不是國家的軍隊。誰能給牠飯吃，牠就可以跟着誰走；那派能給牠利益，牠就可以聽從那派的指揮。今天可以擁戴某甲，明天便可反過頭來擁戴某乙。今天可以贊成這種運動，明天便可以跳過去贊成那種運動。這樣的武力，乃是變亂的材料，各方所爭的工具。只要寡頭政體發生內訌，統治階級爭權奪利起來，其中有一個領袖或一個派系，能運動軍隊，那麼便可發生革命的事實。

而寡頭政體的內訌，又是我們常見的事實。因爲牠的權威，完全是以強權爲基礎，並不向較高的公共意志負責。誰有勢力，誰就可以發號施令，那麼誰又不願去發號施令呢？因此，寡頭政體之下，總有不斷的陰謀發生。少數的統治階級，一日到晚，總在那裏鈎心鬥角，爭權奪利。張三可以利用武力，去打倒李四，奪取政權；又安知王五不利用武力，去打倒張三，取而代之。顚來覆去，無非是一套老把戲。

以不可靠的武力，遇到了寡頭政體的內訌，結果於是往往發生革命。不過這種革命，乃是起於寡頭政體之內，只牽動少數的統治階級，及其所附屬的武力，所以影響比較還小。革來革去，還是革在少數統治階級的手內，與全民不發生密切的關係。

還有一種革命，是起於寡頭政體之外的。在寡頭政體之下，全國的政權既然被極少數的人所把持包辦，不讓一般人民去參預，結果社會上便要發生兩個階級：一方面是極少數所形成的統治階級；他方面是極多數所構成的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有種種的特殊權利，而非其餘的人所能享受；被統治階級有種種的義務，而無相當的權利。這種不平

等的關係，於是漸漸把全國的意志分做兩個壁壘，中間好像隔了一條深而且闊的鴻溝。大多數被統治的人們，起初只是憤恨不平，其後乃想運動打破這種局面。但是少數統治階級，享慣了特殊權力，過慣了勢耀生活，那裏願意降爲平民。所以他們一發見有反抗他們的運動，只知道用更嚴厲的壓迫手段對付，或是剝奪言論出版自由，或是禁止集會結社權利，或是監禁，或是槍斃。這都是寡頭政體所慣用的方法，因爲武力是牠本來的基礎，強權是牠本來的面目。

但是怨懣之氣若深入人民的心坎，那决非威嚇所能了事的。並且你越是壓迫，越要激起反抗。兩方面的感情，越鬧越壞，人民實在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只要時機一到，革命便要暴發起來。這種起自寡頭政體外的革命，比前面所說起自寡頭政體內的革命，意義與影響更加嚴重。因爲牽動了全民，因爲牠是一種長期壓迫的結果，從一方面看來，牠是革得澈底，能把政權從少數人手中，移到大多數國民手中，不至如寡頭政體內的革命，革來革去，還是革在統治階級裏面；但是從他一方面看來，牠是革得很痛

苦，不但少數的統治階級，因爲罪惡貫盈的緣故，要被革命勢力殺的殺，砍的砍，如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中的貴族一樣，就是全國的人民，也須經過一種澈底翻騰的紛亂。這是多麽一個不得已的悲劇！這又是多麽一個無可逃避的罪惡！

中國現在是寡頭政體，無可諱言。寡頭政體時起內訌，又是事實。全國人民不滿意於現狀，那更是不可否認的現象。老實說，到現在，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到了日暮途窮，非變不可的局面了。而變的方法，根據我們上面的看法，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使各黨各派有公開平等競爭的機會，使政治爭鬥的方式用口筆去代替槍砲，使一般國民來做各黨各派最後的仲裁者；還有一條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現狀，建立新政權，這就是革命。在今日強寇已經入室，人民無以聊生的時候，理性告訴我們，最好用和平的，改良的方法解決。在過去，我們已經殺來殺去，革來革去，有廿年，人是無數千萬的死了，血是像溝渠般的流了，田廬是毀了，財產是盡了，到如今，還是落得個田園荒蕪，國破家亡！何況東北淪亡，已經九月；淞滬碧血，還沒有乾；山海關已

經變色；義勇軍猶在抵鬥；日本且有於最近的將來，席捲平津，進吞我全國的陰謀。環顧國際形勢，目擊亡國慘禍，我們如有天良，實在不容許我們閉着眼睛，橫着心腸，來自己互相殘殺了；而且遍國瘡痍，十室九空，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若再要這樣鬧下去，那簡直有滅種的危險！

在此慘痛的情形底下，全國上下，應如何萬衆一心，共赴國難，樹立建國的大計，驅逐無理的暴日。政治上，若有別的方法改善，我是不贊成武力革命的。在日本蹂躪之下，我們再來演鬥蟋蟀的故事，我認爲這是野蠻！這是無恥！

因此，我對於現在所謂廢止內亂運動的動機，表示相當的同情，不過這種運動，沒有認淸內戰的原因與防止的方法。內戰不是無故發生的；若不使各種政治勢力有發洩的機會，若不把政治的運用，納之於軌道，那是緣木求魚的辦法。一方面統治階級仍是專制，仍是腐敗，仍是黑暗；同時一方面要一般受現狀壓迫的社會勢力，不要起來反抗，這是萬萬不可能的。緣木求魚，雖不得，無後災。這種盲目的廢止內戰運動，不但無

效，還有後災。第一是間接的贊助了腐敗的統治階級或個人，去穩固黑暗的現狀，使官家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第二是無形中否認了被現狀壓迫蹂躪的人民最後的革命權利。不去設法改良現狀，單叫人民不起來反抗，這種無條件的廢止內戰運動，我認爲是違反正義的，實在不敢苟同。我雖然不贊成馬上用武力革命，但是我認爲現狀非改變不可。我是主張先用和平方法改良的。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走通，我是反對革命的。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沒有理由可以反對革命的。

我所謂的和平方法，便是實行憲政。

中國國家土地這麼大，人口這麼多，利害這麼復雜，意見這麼紛岐，黨派是絕對無法避免的。國民黨內部如此亂七八糟，統治如此昏天黑地，若想要『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統一所有不同的意志，抹煞一切的爭端，這是永遠不成功的。惟一的文明辦法，就是承認各種意見與利益的存在，建立他們鬬爭的規則，讓他們用選舉票來代替槍桿子。他們要取得政權，要實行主張，要爭得權利，他們到選舉場去决鬥，他們到議會去

決鬥。一次失敗了，下次再來。用不着殺人，用不着放火，用不着蹂躪人民，用不着破壞秩序。他們都有公平的機會，他們聽國民最後的裁判。這是憲政，這是民主政治的憲政。

英國自從克林威爾專政結束以來，有兩百七十餘年了；美國自從南北戰爭以來，有六十餘年了；法國自從第三共和成立以後，也六十餘年了；日本自明治維新實行憲政以來，也五十餘年了，都沒有發生過內亂；並且將來發生內戰的機會，總比較沒有實行憲政的國家少。只有那些落後的國家或民族，因爲沒有憲政的軌道可循，或不能運用憲政，還時常在互相砍殺的內亂狀態裏面。

政治好比球戲，憲法好比規則，憲政好比有規則的球戲。若比賽足球，而沒有規則，或有規則而不遵守，那麼結果只有踢得頭破血流。政治勢力的爭鬥，若沒有根本大法，或有憲法而大家不行，結果也只有打得落花流水。

還有一層，憲政不但可以避免革命與內亂，並且我們要知道，還是立國的根本大

計。就是根據國民黨的理論，也是不能否認的。民國廿一年以來，政局之所以不安，內戰之所以迭起，大家不能不承認這是政治沒有上軌道的表現。但若要政治上軌道，那麼非先有軌道可上不可；換言之，非實行憲政不可。現在我們的軌道在那裏？『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此所以舉國彷徨，無路可走如今日者！

且憲政是法治的根本，法治又是民治的基礎。根本大法不立，普通法律無所根據。一切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團體與個人的關係，團體與團體的關係，以及團體與國家的關係，都沒有法律的根據與保障，任憑有力者的支配。誰有武力，誰就可以作威作福。結果，只有個人政治，軍閥政治。此所以辛亥革命以來，雖掛了民國的招牌，到如今，還是黑漆一團的局面。我們今後如果不行民主共和政體則已；否則，只有實行憲政，以法治去代替人治。

生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國家，不說我們沒有權參加政治，連我們說話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會也不自由，結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們的生命，隨時可以被人

家陷害；我們的財產，隨便可以被貪官充公；我們的住家，隨時可以被人家搜查；我們的名譽，隨時可以被人家毀誣。我們不能安全的耕種，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經商，甚至於不能安全的教書。一切的一切，都是紛亂，黑暗，不安。我們有的是無限的義務與剝削；我們無的是任何的權利與保障。這種社會，充滿了恐怖，猜疑，陰謀。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我們若要脫離鬼的世界，超度到人的世界，便須要求我們做人的根本權利。現在各國憲法，大概都有保障個人基本權利的規定，消極方面，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居住自由等等；積極方面，如受教育的權利，作工的權利等等。實行憲政，能給我們相當的保障。現在黨治，只有繼續我們非人的生活。

總而言之，我為什麼主張實行憲政，因為有下列理由：

(一)我認為國民黨的統治已到了非變不可的局面，而變的路徑，只有實行憲政與實行革命。在此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應該上下一致，共赴國難。因此我主張實行憲政，

避免革命，廢止內戰。（但是和平方法不能成功，我覺得沒有理由否認人民革命的權利。）

（二）憲政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計。

（三）實行憲政，是法治的基礎，民治的條件。

（四）爲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起見，也非實行憲政不可。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

（本文曾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過。）

國民黨怎麽辦？

一

日本侵佔三省，已經一年有餘，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麽辦？

依賴國聯的結果，日本佔北滿，轟錦州，炸熱河，搗天津，攻上海，國聯絲毫沒辦法，到如今，調查團反給我們一個喪權辱國的報告，實權給人，空名給我，日本還不答應，國聯還無下落。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麽辦？

山東韓劉之戰，至今又是一月餘，只看見中央代表來來往往，各方函電紛紛。然而兩方交鋒，照樣進行；掖縣砲戰，愈演愈烈。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麽辦？

四川二劉之戰，也已暴發，順慶一役，死傷千人。中央的電令無效，人民的呼籲無聞。磨牙以待，川亂未已。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麽辦？

福建十九路軍與民防軍的衝突，日趨明顯。前者的目的在整頓地方，後者的用意在

保存地盤。同屬中央政府，同是國家官吏，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貴州毛光翔反對主席王家烈，兩方都有武力，不久又要衝突。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政治上，最高機關爲中央政治會議。常務會員蔣介石氏在漢口，汪精衞氏在上海，胡漢民氏在香港，各有懷抱，不能合作，中樞久懸，負責無人。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黨務上，黨內有派，毋庸諱言，黨的意志不統一，黨的組織不健全，互相傾軋，甚於寇讎。以如此的黨，『負國家之重，』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全國破產，已入絕境，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政府的財政，至於公賣鴉片；官吏的貪污，甚於猛虎吃人。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義勇軍轉戰東北，於今一年；前有強敵，後無援兵；黑山白水，暴骨流血。現在日本將取積極政策，必盡殲滅而後已。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滿洲羣醜宣言，將於最近期內，先圖熱河，後入關內，佔據華北，恢復清室；並謂北方已有接洽，成功當不在遠。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遠東風雲，日趨緊急，各國軍備正在加緊擴張，日本更在準備厮殺。『山雨欲來風滿樓』，世界已至第二次大戰的『前夕』。將做戰場的中國，當此空前的局面，其存其亡，繫於此舉。請問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因爲我們快要做亡國奴，不能不問一聲，『國民黨，怎麼辦？』因爲國民黨訓政，對於國事，單獨負責，所以不能不再問一聲，『國民黨，怎麼辦？』因爲送東北，不抵抗的，是國民黨同志；因爲爭城爭地，不惜內戰的，是國民黨同志；因爲不能合作，陷全國於無政府的是國民黨同志；所以我更不能不問一聲，『國民黨，怎麼辦？』

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國之將亡也，其言也哀；態度公平的國民黨黨員，或許可以原諒我這一聲問『怎麼辦』罷？

二

怎麼辦？

去年『九一八』事變後，我即提出對日武力抵抗，取消一黨專政兩大救亡政策，大聲疾呼於全國同胞之前。到如今，經過一年的教訓，老實說，還只有這兩條出路。

一年的教訓，證明我們同日本是絕無外交可言。你看他『對我淞滬爲空前的蹂躪。』你看他『對我東北襲用亡韓之故智。』你看他到處橫行霸道。你看他一切毫無顧忌。請問對他還有什麼道理可講？

一年的教訓，又證明國際聯盟是絕不可靠。日本屢次破壞撤兵的決議。日本建立傀儡組織，國聯沒有辦法；日本公然予以承認，國聯也沒有辦法。倒是對於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的日本侵略事實，國聯偏要鄭重其事，像煞有介事的遣派調查團，以拖延時日。調查結果：

『其關於最重要之責任問題，竟至絕無正面的解答，反以由暴日侵略而引起之中國經濟絕交運動，責難我方。其混淆眞象，顛倒因果，隱爲日寇卸責，已昭然若見。九十兩

章，對於解決中日爭端之建議，一則曰，滿洲須成立特別憲兵下之無軍備區；再則曰，滿洲須設立範圍廣泛之自治政府；……此外如顧問會議之設立，日本權利之積極擴大與保障，在在均使我國處於危亡地位。此種違背正義與公理之解決方案，不啻使我國於日寇侵略之外，再受國際共管之束縛。』（見十月十日申報滬中委馮玉祥李烈鈞等通電）』信賴國聯如此下場，請問有什麼希望？

一年的教訓，再證明國際上各種和平條約是絕對無用。國聯盟約既如上述，非戰公約與九國條約也是等於廢紙。難道日本的行動還不夠構成戰爭麼？難道日本的侵略還不夠破壞中國的主權麼？請問，非戰公約所非者何事？九國條約所爲者又爲何事？

一年的教訓，更證明依靠外國是絕對沒有出息。各國都爲自己利害打算，那肯爲中國犧牲。蘇俄不但不抗議日本侵入北滿，並且還與『滿洲國』勾結。英國自始至終沒有一句公道話。法國向來偏袒日本。至於美國，雖常對日本表示一點異議，也毫無與日本決裂的意嚮。那麼我們希望外國出來幫忙，請問，又有什麼結果？

因此，就對外而言，一年的教訓，只有武力才是唯一的解決。國民黨甯願賣國則已；否則只有同日本武力解決。日本佔據東北，國聯不能爲力，怎麼辦？武力解決！日本唆使「滿洲僞國，」出兵進關，怎麼辦？武力解決！過去國民黨「實行不抵抗主義，舉全華民族之前途而付諸國聯，」所以一誤再誤。

現在有一年多的教訓了，國民黨似有覺悟，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九一八紀念告國人書，也知「國未有不能自存，而賴人以存者；」不過認爲「於國際環境正屆劇變之時，沉着以待國聯之決議與行動；……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甯爲玉之碎，不爲瓦之全。」（見九月十八日申報）

事到如今，請問，「有理可講」乎？「無理可講」乎？如「無理可講」，「則角力」之時至矣！卽以「沉着以待」的調查團報告，其不講理，早有定評。然則，國民黨如果「敢矢天日」，便應「角力」，「甯爲玉之碎，不爲瓦之全」，才是「竭忠盡能，努力事實」，才有「矢與國共存亡之至誠！」

國民黨不這麼辦，請問，怎麼辦？

三

『武裝同志』互相內戰，『長衫同志』互相排擠，這是中國不統一的原因，怎麼辦？

六年的訓政，告訴我們，國民黨本身是絕對不能統一的。武有武的地盤，文有文的系統。黨內有派，自昔已然，於今尤烈。這是事實，無可諱言。過去數年的內戰，固然是同志打同志；現在各處已發將發的內戰，又何嘗不是同志打同志。共黨的猖獗，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天災的奇重，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日本佔據瀋陽，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日本統一東北，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日本屠焚淞滬，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日本現在要『滿洲國』吞併熱河，進兵平津，還不能使他們『精神團結』。那麼，還有什麼可以使他們『精神團結』？事實勝於雄辯，事實證明國民黨本身是絕對不能統一的。

六年的訓政，又告訴我們，中國在不統一的國民黨專政之下，是絕對不能統一的。

國民黨的黨爭，若像在民主國裏面純是內部的糾紛，不與我們國民相干，那麽他們統一也好，決裂也好，改組也好，西山也好，向左也好，向右也好，抱頭痛哭也好，手鎗決鬥也好，張三領袖也好，李四稱頭也好，只要他們的行爲只影響於黨，不牽連到國，我們國民可以不必過問，也沒有權過問。但是這不足以語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中國，是國民黨的天下，黨事就是國事，國事也就是黨事。因此沒有統一的黨，自然沒有統一的國。六年以來，國民黨層出不窮的內訌，文武同志，忽左，忽右，忽聯共，忽反共，忽西山，忽改組，忽同志，忽叛逆，忽通緝，忽歡迎，忽打仗，忽講和，鬧來鬧去，他們仍不失爲『黨國要人』，只可憐我中國鬧得河山破碎，只可憐我國民鬧得家破人亡。其實，我中國何嘗不統一，只因武裝同志要割據。我國民何嘗不統一，只因長衫同志要搗亂。嗚呼，國民黨不統一，不但是國民黨本身之不幸，也是中國之不幸，更是人民之不幸。我們始終希望國民黨之統一，無奈國民黨終不能統一何！

國民黨既不能統一，國民黨不統一的專政既使中國也不能統一，然則，怎麽辦？

惟有『結束訓政，實行憲政。』

結束訓政，讓國民有言論自由，讓國民有出版自由，讓國民有政治結社自由。有政治結社自由，國民才能組織起來；有組織，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制止軍閥混戰。有言論出版理由，社會才能產生輿論；有輿論，才有是非；有是非，才能監督政客搗亂。老實說；國民黨的招牌壓不住了；惟有信仰人民的力量，養成人民的力量，發揮人民的力量，才有希望鎮壓一班好亂成性，狠心狗肺的軍閥政客。除此以外，別無生路。

實行憲政，各黨各派可以公開競爭，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選舉票代替機關鎗，政治勢力有地方發洩，有正路可走，黨外各派不必去革命，黨內各派不必去搗亂。有本事有主張的，儘管堂堂正正去組織，去號召，不必在黨內排斥離間，興風作浪。一切的一切，最後讓我們國民來裁判。

如是，民主勢力擴張，就是軍閥勢力消滅。一般軍人，在那裏爲國服務的空氣下，在人民有組織的監督下，在政治上有憲政的軌道下，不但不敢割據，不敢內戰，並且會

變成衛國保民的勢力。同是軍人，在民主國家裏面，軍人爲什麼不干政，不割據，不內戰，在中國便成爲閥？這由於民主的勢力使然，這由於憲政的軌道使然；並不是因爲中國軍人，特別少了兩個眼睛，一顆心。

內政上有了出路，然後政府與人民能夠合作，全國軍人，能夠指槍向外，長期抵抗才有意義。關於此點，國民黨似乎也有覺悟，所以九一八告國人書，開頭沉重的說道：

『本黨際艱危之時，負國家之重，欲不爲亡國之罪人，欲不隳總理之遺緒，欲持公理與國力，以守此疆土，保此主權，舍

適應民意，集中民力，

刻骨痛心，以與強暴周旋外，義無他顧。』

換句話說，就是國民黨願意服從民意，與全國同胞合作，一致對外；除此，別無生路。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這是何等的公忠爲國！凡我國民，聽了這話，對於國民黨的怨恨，應該一筆勾銷，共同攜手，以救危亡。『國未有政府與人民不相親相愛，相助相

守，而可濟大難者。』（見告國人書）我國民其聽諸！我國民其聽諸！

國民黨不但願與人民合作，並且願意容忍其他政團的存在，相與為國，『求國家的生存。』故曰：

『國人今日政治見解之不同，政治集團之龐雜，無可諱言，是猶指臂之有長短也，嗜好之異鹹酸，遇飢渴，則無不後言味，以先求生者。今之國勢，如大海孤舟，狂風迭襲，舟人於此協力共濟之不暇，更何忍以全局之安危，徇彼此之意氣。故本黨今日願忍一切，以求國家之生存。』（見告國人書）

準此，則國民黨已承認黨外的政治意見；準此，國民黨又已承認黨外的政治集團；不但承認之，並且願與各派『協力共濟』；不但願與黨外各派合作，並且願破除意氣，忍受一切。國民黨的為國求全者若此，那麼黨外各派，復有何求，我們國民更有何求？

所慮者，就是恐怕國民黨發宣言的時候，是『聲與淚俱併，言與心俱盡』（見告國人書）；事過之後，又是對外不抵抗，對內要壓迫。

爲證明『本黨今後之責任，在竭忠盡能，努力事實，不待於多言』（見告國人書），請國民黨政府立卽實行下列各項：

（一）確保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的黨部決議，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規外，均廢止之。

（二）承認各政黨得並立自由活動，移黨費去做援助義勇軍的軍費。

（三）集中全國人才，組織國防政府，武力收復失地。

（四）籌備憲政，限八個月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民治，民享，民有的憲法。那麼不但『本黨願與我全國同胞，一致邁進，勿自矜，勿自餒，於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見告國人書）我全國同胞，也願與我賢明的國民黨，一致邁進，勿自矜，勿自餒，於九死之中，求必生之道。

嗚呼！『遼吉黑三省淪陷，於今一年，全國同胞椎心裂眥，誓共存亡！』（見告國人書）我當權的國民黨，怎麼辦？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這樣的國民！

有這樣的國民，便有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國家。

我們不要單罵日本，讓我們來罵自己。我們不要單罵政府，讓我們來罵國民。我們也不要單罵軍閥，官僚，政客，讓我們來罵工業家，商人，大學教授，學生，及一般民衆。

『暴日』，『矮寇』，『醜類』，我們都咒過了。但是，日本雖『暴』，爲什麽不向美國去『暴』，俄國去『暴』，英國去『暴』，法國去『暴』，而獨向中國來『暴』？日本人雖『矮』，爲什麽短脚鬼不『寇』西北利亞，不『寇』加尼福尼亞，不『寇』澳大利亞，而獨『寇』東三省？太和民族雖『醜』，總不像我們神黃華胄這樣的受人家欺負，壓迫，屈辱；總不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的乞哀，求憐，丟醜。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算了，我們不必罵日本罷。

現在的政府，該罵不該罵？該罵。但是我們國民，該罵不該罵？也該罵。

組織政府的還是人，不是天上下凡的神仙，也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他們是本地風光，兩個眼睛，一個鼻子的個人。他們是當時此地社會之一員。他們脫不了這個社會的影響，離不了這個社會的罪惡。他們要特別壞，總不會因爲人民特別好。如果人民特別好，爲什麼不起來糾正，監督，改造？爲什麼要讓少數人把持，操縱，幹壞事？人民沒有能力，沒有勇氣，沒有公德，來糾正，監督，改造壞政府，那麼便可證明一般人民比政府人員並不見得好到什麼地方去。

政府人員不是瞎了眼睛，不看情形的。他們愈是要維持地位，愈是要注意人民的意見。如果人民有能力，有勇氣，有公德，政府決不敢胆大妄爲。若是人民都是奴才，或奴才的奴才，他們當然是不客氣了。

我們攻擊政府喪權辱國，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我們的商人爲什麼要販賣日貨？我們的北平教育界爲什麼要把北平改爲『文化城』？我們的資本家，爲什麼對外不敢作

強硬的主張？胆怯的國民，才有胆怯的政府；胆怯的政府，才是長期不抵抗。

我們反對軍閥的跋扈與混戰。軍閥的跋扈與混戰，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接濟軍餉的是誰？是不是我們的資本家？運籌帷幄的是誰？是不是我們的讀書人？替他們奔走的是誰？是不是我們的士大夫？替他們辦交涉的是誰？是不是我們的留學生？替他們做電報的是誰？是不是我們的智識階級？一般人民不敢起來制裁，甘做奴才，連聲勢赫赫的廢除內戰同盟，也不敢說一句公道話，提出較爲有力的辦法。那麼，這樣的國民，只配做軍閥的羔羊。

我們痛罵政府的貪污。政府污貪，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請問我們的社會生活是不是充滿了貪污的空氣？做經理的，要揩股東的油；做夥伙的，要揩老板的油；做廚子的，要揩主人的油；賣電車票的，要揩公司的油。中國社會那處不揩油？那處不貪污？你不貪污，人家說你是傻子。你大揩其油，人家說你有本事。貪污的社會，產生廉潔的政府，是例外。揩油的人民，產生括地皮的政府，是當然。

我們反對政府的專制。政府的專制，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我們的社會，又何嘗有互相尊敬的美德？誰有權勢，誰佔便宜；誰無權勢，誰該倒霉。大蟲吃小蟲，小蟲吃毛蟲。層層相壓，唯力是視。社會無正義，無平等，又何怪政府作威作福。

我們攻擊政府引用私人。政府引用私人，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引用私人的機關，不只是政府。學校請教員，不是因爲他有學問，而是因爲他與學校當局有親戚朋友的關係。教員在校中所得薪水的多少，與任期的長短，要看他與當局的感情。淸高的教育機關如此，其他有何話說。你不信，你去看，公司的職員，商店的夥計，以至於輪船上的茶房，何處不能發現親戚同鄉朋友的關係。

我們攻擊政府欺騙人民。政府欺騙人民，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中國根本是一種互相欺騙的社會。表面上說得好聽，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囘事。對着你，花言巧語。背着你，百般謀害。找不着，赤心好漢；看見的，無非滑頭。譬如商鋪賣東西，沒有定價，騙得你一個錢就算一個。有時就是掛着眞不二價的招牌，其實還是做童叟有欺的買賣。

言行不一，既不是『知難行易』，也不是『知易行難』。上下互相欺騙，『而國危矣』。

我們攻擊軍閥內亂，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民衆團體，有幾個不內亂？一個團體，分成幾派，互相爭利。客氣點，互相漫罵；不客氣點，互相糾打。我們中國人不能維持三人以上的團體，怎樣能希望軍閥合作？

我們罵官僚政客的無恥。官僚政客無恥，是事實，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一般人民，有多少知恥的？拿智識階級來說，有多少在那裏主持正義，守正不阿？有多少不趨炎附勢，見利忘義？所謂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的走狗，政客的附庸，有多少不是智識階級中人？

人民好，政府不敢不好；政府壞，因爲人民壞。好人民，不容壞政府；壞政府，因爲好人民太少。今日我們所受的痛苦，一方面不能不責備并且監督政府使其改善；他方面尤要努力改良我們的萬惡社會。我們要自怨自艾，我們要澈底覺悟。我不是替政府辯護，我更不是替軍閥官僚政客卸責。我是希望我們國民，不要放過了自己。

這樣的人民，才有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國家。
要有別樣的政府，別樣的國家，須有別樣的人民。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

對國家的認識

——我的自供——

一

我在新月月刊發表過幾篇文字，有人便說我是新月派。

去年九一八後，我主張取消一黨專政，對日反抗到底，許多人便認我是國家主義派的重要人物。

今年春天，我一面反對上海停戰協定，一面反對國難會議限制討論範圍，於是上海公安局所得到的祕密報告，所謂共產黨領袖的名單中，據說竟有王造時其人。

五月十六日，英文人民論壇又說我是中國法西斯運動的領袖。

九月十八日忽然接到青衫除奸團九月十五日發的一封信，要我開除青年黨內的『漢

奸』，並限於三日以內，在中新兩報聲明；否則，以炸彈相贈。這又顯然誤把我當做青年黨的負責人員。

最近，朋友告訴我，江蘇省政府，通令各縣，說奉到中央密令，說我同別兩位先生又在組織什麼社會勞動黨，簡稱『宣勞』，將以生活日報爲吸收黨員的工具，須得嚴查。

以外恐怕還有不少的謠傳與誤會。在這些謠傳與誤會當中，自然以國家主義派的頭銜爲最普遍，對於這點，我想做點口供。

二

我是一個主張要國家的人，所以我對於中國的存在，自然要擁護。我不否認我是愛國者，但是我愛中國，我提倡國家觀念，請原諒我，因爲我有我的理由。

現在還不是大同的世界，全世界都以國家爲單位，民族的生存，還得要國家的保障。那個民族沒有健全的國家組織，那個民族便須受人家的壓迫，以終至於淘汰。近代

一部歷史，從橫的方面去看，固然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從縱的方面去看，也是一部國家爭鬥史。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如果中國人要在這個世界討生活，便不能不擁護國家的存在。

若是中國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或者用不着我們深切的愛護；在那時，若是我們再去提倡國家觀念，或者要鑄成很大的錯誤，走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但是今日之中國，不足以語此。一面誤於傳統的天下觀念，一面誤於血統的家族主義，全個社會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只有家族意識，沒有民族意識。鄭孝胥趙欣伯等之所以甘做日本的傀儡，其故坐在前者；引用親戚同鄉，而不顧國家社會的利益，其故坐在後者。中國之病，病在於不成國家，不是病在於國家的組織過於發達。中國人之病，病在於不知愛國，不是病在於過於愛國。中國的問題，是在救亡，不是在侵略。所以在今日中國，而言愛國，而言救國，並不是落伍，更不是高調，乃是我們應有的責任。

就是要走到國際主義之路，也非先有健全的國家組織不可；沒有國，如何能談到國

際。根據人類發展的歷史，將來世界的組織，大概第一步先須有健全的國家，然後才能實行世界聯邦制度；世界聯邦制度完全成熟之後，世界觀念才能慢慢的代替國家觀念。猶之美國聯邦，當初是以十三個獨立的邦爲單位，到現在各邦人民才溶化爲一。若是我們現在便要打破國界，高談大同，不但爲人家所恥笑，並且是緣木求魚的辦法。

將來世界的統一，決不是空洞的大同主義所能成功的，同時也決不是帝國主義所能成功的。以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要以武力爲後盾，去消滅各種各樣的國家，去統治各種各色的民族，不但是理論上講不過，就是事實上也行不通。大不列顛還須給自治領地以獨立國家的地位，誰能說秦始皇式的辦法能吞併全個世界？大同主義，說起來似乎好聽，實際上等於鏡花水月，空無所有。未來的世界，根據各聯邦國家的歷史，我深信，只有建築在聯邦的制度上面；而世界聯邦又必須以國家爲基礎。

不過，我愛國，我擁護國家的存在，並不以國家本身爲目的，乃是認牠爲手段，爲人民謀幸福的手段。國家不是神聖，猶之人類各種團體不能看做神聖一樣。如果將來世

界各國都取消，到那時，當然我也贊成把中國取消。如果各國要保存，那麼我要問中國爲什麼不要保存？人家以國家的力量來謀我，我只有以國家的力量去反抗。人家以機關槍打過來，我只有用機關槍打過去。

國家的目的，不僅在防禦外來的壓迫，尤重在增進國民一般的福利。在個人主義極盛的時候，國家的功用很簡單，不過防止外侮，維持國內的和平與秩序而已。十八世紀末期一般政治思想家小視國家與政府的功用，主張放任政策的見解，已不適於現代社會的生活。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的結果，經濟原因的重要，勞資兩方的對峙，與一般社會關係的密切，在在需要國家權力的干涉。國家的職務，已由消極的警察作用，進而担任各種重要企業，規定各種社會生活；換句話說，已由個人主義的國家觀，進而至於社會主義的國家觀。國家已不復是個人主義者所謂『必要的惡』Necessary Evil，已成爲『積極的善』(Positive Good)。

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我們不能否認國家大概爲少數貴族階級所操縱。但一七八九

年的法國大革命，已確立了政治平等的原則。所謂國家，不是君主貴族的國家，乃是全國國民的國家。在資本主義發達之下，我們也不能否認國家大概爲少數資本階級所操縱。但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已確立了經濟平等的原則。所謂國家，不是資本階級榨取勞工階級的工具，乃是全國國民共存共榮的團體。國家的性質，可隨時代而進化；國家的制度，尙無消滅的可能。

蘇俄在理論上或者要高唱工人無祖國，蘇俄在事實上，却成爲國家組織最發達，國家功用最廣闊，國家觀念最深厚的國家。蘇俄的五年計劃，不是有很複雜的國家組織，那能實行？蘇俄的人民沒有愛護蘇俄的觀念，那能如此犧牲？我們儘管反對資本主義，我們不必反對國家的存在。

怕了中國變爲帝國主義的人們，不惜反對國家觀念的提倡。其實中國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麽做帝國主義的資格。老實說罷，五十年之內，中國的問題是救國，是建國；不是帝國不帝國。今日之事，乃是人家侵略我，壓迫我的問題；不是侵略人，壓

迫人的問題。若怕了將來侵略人家，而反對自強，而願受壓迫，這是因噎廢食，這是喪心病狂。況且帝國主義的重要原因，不在人民的國家觀念，而在經濟的組織與文化的性質等等。我們要預防中國帝國主義的發生，自然有別的途徑，不必從毀滅自己下手。

我提倡國家觀念，因為牠有積極的價值。牠可以團結全國人民的意志，抵抗外國的侵略，保持自己的統一。牠尤其是被壓迫國家求解放的利器，被壓迫民族求解放的工具。弱小的國家，由牠而強大。分裂的國家，由牠而統一。亡了的國家，由牠而復興。無組織的民族，由牠而建國。我們看歷史，意大利德意志之所以統一，法國所以屢次危而復安，波蘭之所以復國，日本之所以強大，土耳其之所以崛起，誰說不是國家觀念所推動？十九路軍的苦戰東南，義勇軍的流血東北，誰說不是國家觀念所激發？

國家觀念的偉大，尚不止此。牠實在無形中可以澄清及增進我們的生活。公共事業，有牠在裏面推動，可以積極的發展；政府機關，有牠在上面監督，可以養成廉潔的

政治。反而言之，一個國家若無國家觀念爲之基礎，精神必至渙散，道路壞了，沒人理；古蹟倒了，沒人修；偉大的城市，讓牠毀滅；長久的歷史，讓牠忘去；做官吏的，只知搜括地皮；做人民的，只知自私自利。總而言之，國家的羣體生活，必自趨於腐敗墮落而不自知。你不見希臘時的雅典與司巴達嗎？他們的公共生活極高尙極興盛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的愛國心最發達的時候。你不見今日的中國嗎？人民沒有國家觀念，所以國事至此，軍閥不惜混戰，貪官不惜搜括，奸商不惜販賣日貨，東北羣醜不惜傀儡登台。

老實說，我不否認我是一個愛國者，我是一個擁護中國的存在者，我有上面的理由。但我不認國家本身是目的，我堅決的反對國家被一個人或少數人所操縱。我不管操縱的是皇帝也好，貴族也好，軍閥也好，資本階級也好，地主階級也好，外國人也好。誰要包辦國家，以個人或少數的利益，犧牲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我就反對誰。我要國家，我愛國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國家，我愛的是經濟平等的國家，我現在的力量雖

小，但是我要爲我的理想奮鬥。抱如是的國家觀，『人呼我爲牛，則應之爲牛；呼我爲馬，則應之爲馬』。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五日。

復興新文化運動

一

現在眞是一個『反動』時期，一個『反革命』時期。

一九一八年以後，一九二三年前，新文化運動盛行的時候，只看見許多人在那裏打『孔家店』；現在『孔家店』不但是沒有被打倒的危險，並且『黨國要人』要大興土木，廣修孔廟，拜倒於『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之前了。

以前張君勱先生說了幾句關於人生觀的話，便有丁文江先生一大羣人去打『玄學鬼』。今年由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等所發起的時輪金剛法會，在北平舉行，（國府津貼——注意）在丁文江胡適之先生等脚下，大演法寶，鬧得轟轟烈烈，『文化城』中，倒沒有人去喇嘛廟裏『打鬼』。

曹章陸因爲山東問題，在五四被學生打得頭破血流，魂不附體，能免之後，至今翻

不過身來。（只有曹汝霖同段執政到過時輪金剛法會）現在偌大的東三省送掉，誤國賣國的人，仍然是高官厚爵，一點也沒有危險。有人問學生到那裏去了，有人回答說戀愛去了，有人回答說看電影去了，還有人回答說領津貼去了。

以前誰也不敢反對『德謨克拉西』，得罪『賽恩斯』，連段總理或執政，都得迴避。現在訓政把『德謨克拉西』先生訓走了，獨裁把他裁去了。就是『賽恩斯』先生不是被『黨化教育』所『化』掉了，便是被尊禹學會，或什麼『法會』所嚇死了。

白話文學呢？慢慢的消沉死去。文言文學，經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先生的提倡，『死』了又在復活。再過幾年，恐怕『活的文學』死了，『死的文學』倒活了。你不看國民黨的宣言的演變嗎？由白話而淺近的文言，由淺近的文言，而成爲可搖頭擺尾朗誦的古文了。

戴院長的念佛，講經，修廟；吳玉帥的扶乩，衞道，救國，以及前幾個月靜安寺的浴佛大會，最近北平的時輪金剛法會，都是今日黨國的香火盛事。

時代變了，狗也變了，人安得而不變？

新文化運動的保護者蔡元培先生已經是黨國元老了；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適之先生已經是國際名流了；就是新潮社的幾位搖旗吶喊的學生，他們已經是『黨國次要』了。吳稚暉先生以前那樣捧『賽恩斯』先生，打『玄學鬼』的精神，現用在讀遺囑，朗誦三民主義上去了。胡漢民先生現在妙高台上咬住黨治還不肯放，再也不會去辦建設雜誌了。戴季陶先生除了上面所說念佛，講經，修廟，發起法會，及尊禹學會等等以外，還有考試院的事情，那裏還記得以前的星期評論？至於葉楚傖先生在民國日報，及邵力子先生在覺悟欄內說的話，在做祕書長或主席的時候，誰能記得那麼許多？

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影子沒有了。又是一朝江山！又是一朝君臣！又是一個時代！

誰是『反動』？誰是『反革命』？讓時代先生去判決罷！

二

一九一七年發生的新文化運動，的確有牠的價值。

我們以前的政治活動，只是少數士大夫階級玩的把戲。就是戊戌政變，及辛亥革命，也沒有大批的『阿斗』參加。新文化運動，的確是一大解放，使舊社會的思想與制度，都失却了尊嚴。五四運動，就是表現人民對於權威不客氣的反抗。學生小子，乳臭未乾，竟敢燒部長的房子，在部長頭上動土；商人見義忘利，居然罷市；工人雖然又窮又愚，也知道罷工；鬧得全國天翻地覆，政府終於能免曹、章、陸，挽留蔡元培，這不能不說是『三千年來一大變局』。這種變局，指示了民衆組織的可能，表現了民衆參政的能力。後來共產黨國民黨之所以能夠組成大黨，做各種民衆運動，匯成一九二六年起的國民革命大潮流，把北洋軍閥打得跑的跑，降的降，我們不能不說新文化運動有很大的貢獻。所以難怪胡適之先生在國民黨北伐的時候，也要認為自己有功了！

辛亥革命雖然把『眞命天子』趕走，但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成功。軍閥的專橫，人民的痛苦，一天一天來得利害。兼之一九一四年歐戰暴發，接着就是一九一五年日本向我提出廿一條；又接着是袁世凱的洪憲運動；再接着是張勳復辟，解散國會，南北分裂，

各處混戰。我們原來希望民國成立，五族共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誰知『眞命天子』去，『假命天子』來，中原逐鹿，天下紛紛，人民的痛苦與不安，較之前淸，還要利害。於是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信念，完全失掉了。剛在這個時候，新文化運動闢開新的途徑，告訴我們到社會上去，到民間去，從根本問題着手，從思想革命着手，這的確替新式政治運動，展開了一條廣闊的道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摧毀舊思想，推翻舊制度，誰說不是在那裏搖動舊政治？

新文化運動並不是文藝復興，乃是對於傳統的思想與制度重新估價的一種運動。沒有價値的，便施以攻擊。因爲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制度，大體都不適於現代生活，所以這種運動，差不多完全用力在攻擊舊勢力方面，攻擊孔教，攻擊禮教，攻擊文言文學，攻擊家庭制度，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喪葬制度，攻擊以前的教育制度，攻擊男女不平等的關係。所有舊的倫理，道德，制度，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眞是四面楚歌，都漸被搖動起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又是新文化運動不可磨滅的功績。

新文化運動同時促成了文學革命。文學革命主要的目標是打倒文言，建立白話。文言是載『道』的；『道』是我們的傳統思想。所以革文言的命，也間接就是革傳統思想的命。革的結果，白話給了我們一種比較容易傳達思想的工具，解放了許多受文言壓迫的人們。智識的傳播，思想的交換，更來得廣，更來得快，我們看五四以後所出的雜誌，有如雨後春筍，便知白話功用的浩大了。

經過新文化運動，民族精力的解放，眞是有如春雷發動，萬物齊萌。什麼思想的系統都有，什麼改良的運動都有，五花八門，構成今古奇觀，在中國歷史上放一異彩。除了春秋戰國時代，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文化高潮？只見無數的學會，無數的團體，無數的雜誌，眞是好一個活潑的氣象！

三

黨國以後，訓政以來，什麼都完了。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只剩得標語，口號，紀念週，靜默三分鐘。政治黑暗，外患危險，人民痛苦，歷史的巨輪，似乎又迴到一九一八

年左右了。有人說：『恐怕還不止此罷』。

舊思想正在運動復辟，舊制度正在捲土重來，舊人物正在借尸還魂，到處都在露出狐尾巴的原形。中國似乎又在『開倒車』，回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的那條路上去了。民族的前程，已發生阻礙；不將反動的思想與制度，給以澈底『肅清』，恐怕『齊天大聖』眞要顯神，中國又要倒退若干年代。

因此，我覺得現在有恢復新文化運動的必要，喊出後期新文化運動的口號。

後期新文化運動，第一須將不合理的思想，制度，勢力，風俗，習慣等等，澈底的加以掃除；換言之，應該繼續前期新文化運動的破壞工作。以前有許多地方，簡直沒有攻擊到，或攻擊而沒有致要害。因此『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現在若不拆盡舊房子，新房子無從建起。

前期的新文化運動，只注重消極方面的破壞，沒有注重積極方面的建設。從事前期新文化運動的人，雖然對於舊的東西很勇敢的進攻；對於新文化本身，却很少具體的貢

獻。其在思想上的意義，與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意義倒很相同。辛亥革命運動只知道推翻滿清，沒有充分準備推翻以後的辦法，所以滿清一倒，民主政治並不能實現，中國的政治更趨於紛亂。前期新文化運動也是一樣，雖摔碎了不少傳統的思想與制度，但是對於新文化却缺乏有系統的建設。結果，社會失却舊日所賴以維繫的東西；解放的民族精力無處歸宿，而發生很大的紛亂，不能收拾。所以我覺得後期的新文化運動，除了繼續破壞舊東西而外，還須提出有系統的主張，作公開熱烈的討論，以期得到新社會生活的方式。

前期的新文化運動，範圍還不夠大，有許多問題根本上就沒有討論；有許多問題，討論了而沒有到底。我們主張後期的新文化運動，應該包括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把一切舊的東西，都傾箱倒篋找出來，一一加以檢討，重新估定他們的價值。如文字，文學，娛樂，美術，宗教，教育，人口，家庭，婚姻，犯罪，迷信，飲食，衣服，男女，種種切切，無一不應該給以澈底翻騰的討論。在我們心目中，無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

制度，及勢力。我們的唯一目的，在創造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新文化。

不過，我們須記得，文化運動本來就是收效很慢的，需時很長的，須經過很大的努力，才有相當的效果。若操之過急，那是不會成熟的。前期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沒有很大的成功，不數年便歸於沒落，便是因為運動經過的時間太少，用的力量不多，我們認為後期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有一個較長的時間，去充分檢查各種思想與制度，以期得到成熟的結果。『欲速則不達』，我們倒不希望一年半載有什麼驚人的成績。

中國是一個破落戶，躲不了雨，避不了風，何不讓我們把一切糞土之牆，及不可彫的朽木，都拆毀下來；同時打好模樣，如工程師一樣，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建造一所新的大廈。

全個民族似乎沒有路可走了，情形似乎在那裏『反動』，在那裏『反革命』。往前面跑為民族運命拉縴的人們，你們覺得有復興新文化運動的必要嗎？若是我們大家都覺得，何不讓我們大聲疾呼：

『前期新文化運動尚未成功；

後期新文化運動仍須努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怎樣打倒貪汚？

一

我在英國聽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說：『政府就是有組織的強盜機關。』這句話雖然有點過分，不能概括一切的政府；但是貪汚的政府，搾取人民血汗而不能爲人民謀幸福的政府，憑我們的良心說，我們不能否認。

私人做強盜，不過幾個人偷偷摸摸，懷着手鎗，攔路行刦，或闖入人家，捲取些金銀財物而已；被軍警捉住之後，不是永遠監禁，便是槍斃砍頭。若官吏要做強盜，那就不同了。他們有軍警做工具，有法律做護符，上有頭目，下有嘍囉；全個政府變成強盜機關。他們的掠奪，是有組織的；他們的榨取，是有系統的；他們的勢力，是籠罩全國的。你要反抗，他們有的是子彈給你吃；有的是監獄給你坐。他們要割你就割你；要宰你就宰你；抽筋就抽筋；剝皮就剝皮；所搶的數目，又何止數十百千萬！

在中國歷史上，恐怕任何一個時代找不出這麼多的貪官汚吏；在世界各國政府裏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們這樣貪汚的政治。大官可以大發財，小官可以小發財，自上至下，澈頭澈底，差不多都進行升官發財！（當然也有例外）

貪官汚吏簡直是一羣屠夫，一天到晚，在那裏謀財害命；今天要割我們小百姓的肉，明天要吸我們小百姓的血，後天甚至於要送我們小百姓的命。他們把我們小百姓當做告朔的餼羊，何曾認識我們是他們的主人。這種情形，若不改變，什麼主義都談不上，什麼主張都行不通。我們國民不起來打倒貪汚，恐怕沒有安生的機會。政府自己不設法肅淸貪汚，恐怕政治生命眞要『壽終正寢』。

二

不過，貪汚有貪汚的原因；須找出貪汚的原因，然後才可以提出打倒貪汚的辦法。

現在一般官吏貪汚的原因，第一就是因爲任期沒有保障。大家都存着『五日京兆』之心，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長官一換，底下的人都跟着要跑。好不容易找到飯碗，得

到以後，又無日不在動搖。這個窮年頭，若不乘做官的機會，大括一次，充滿荷包，一旦飯碗打破，豈非將來要坐以待餓？臭虫餓了許久，忽然爬上了活人的肉體，那有不大吸一頓血的道理。現在做官的人，大半都是些餓了好久的臭虫，自然要大吸一頓民脂民膏，以爲下台以後打算。『十年不做官，做官吃一生』。所以官吏的任期，如果沒有保障，貪汚的風氣，便難剷除。

不過官吏也有兩種：一是政務官，一是事務官。政務官是黨派的領袖，最高行政的當局。他們的進退，要看所隸黨派勢力的消長。在民主國家裏面，這種勢力的消長，完全根據民意的趨向；選舉投票便是表現民意趨向的方式。選舉結果，那黨勝利，那黨的領袖便去組織負責的政府。政務官的性質是政治的；他們的職能是決定政策，並督察其執行的；他們的任期是沒有一定，須看政治勢力的推移的。至於事務官，則爲實際執行法律與政策的人。在現代各文明國家裏面，他們的地位是與政務官完全不同的。他們不參加黨派的活動，無論對於那黨那派所組織的政府，都同樣的忠心服務。他們的出身，

乃由於考試，不是由於權要的引用。他們的任期，都有保障，不是隨意可以去職。

我所謂任期的保障，乃是指事務官而言的。政務官居極少數，在英國，還不滿百數；永久的文官，總數却在三十萬以上。關於政務官的貪污，我們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暫置不論。關於事務官的任期，我們主張須採取終身制；既經任命以後，除了死亡或辭職之外，只有犯了過失，才能免職；只有到了法定年歲，才能退職。如果這點辦到，做文官的人，便不必奔走於權勢之門，逢迎上司，以保地位；也不必大括百姓之皮，預備下台以後的生活費用；大可以奉公守法，一心一意，爲國家服務。

現在的官吏，不但任期沒有保障，並且薪俸實在太少。一個部長，每月只有七八百元，次長只有五六百元，司長只有四五百元，科長只有二三百元，科員等職只有數十元至百餘元。以外還要欠薪，幾個月不發。以外還要減薪，每月只有幾成。以外還要抽薪，按月抽所得稅多少，去辦黨部，送黨員出洋留學。以外還要應酬：上司的父母逝世發訃聞來，要送禮；上司的兒女成婚，發喜帖來，要送禮；上司自己做壽，當然要送

禮；上司自己討太太（或姨太太），當然更要送禮。這樣一來，區區薪水，若不貪污，那裏夠用？

所以要打倒貪污，必須提高官吏的薪俸。其實，只要他們不貪污，就是給他們幾倍於現在的薪水，也是值得的。譬如現在部長們每月得八百元的薪金，如果他們不鬻官賣爵，借款回扣，賄賂公行，我們給他們兩千元一月，也不爲多。至於事務官，如果任期有了保障，同時他們不能作政治活動，沒有特別發財的機會，並且又不能隨時離職他就，那麼就是多給他們點薪俸，使青年有爲的人才，能夠樂意爲國家服務，也是應該的。

並且薪俸須逐年增加，或每幾年增加若干，到一最高額而止。年老退職之後，還應該有養老金的辦法，使一般官吏，生活安定，有恃無恐，一心一意，爲國家做事，沒有衣食之憂。這樣一來，貪污最大的動機自然打消，貪污的風氣自然可以大減。

關於事務官的待遇，還有一點須說到。在現在各文明國內，文官陞遷的標準，不外

兩個：一是服務的年限；一是服務的成績。有以服務至一定年限，或五年十年調升一級者；有以良好成績的表現，即加升拔者。大概凡責任較重，須運用識見決斷的職位，其陞遷以成績爲標準。凡按步就班，性近機械的職位，其陞遷以年限爲標準。在現在我們的政府裏面，宦海的浮沉，既不是根據於成績，也不是根據於年限，完全要看他與權要有沒有親戚朋友同鄉種種的私人關係。有關係的人，可以忽然做大官，享厚祿；沒有關係的人，不但是沒有陞遷的機會，並且連吃不飽的飯碗都要打破。於是做官的人，不在成績上做工夫，而在逢迎上司上做工夫。愈是貪污，愈是有錢來買權要的歡心；愈是廉潔，愈是沒有維持及增進自己地位的希望。因此，我們若要打倒貪污官吏，升調也應該根據服務的成績及服務的年限。

三

假定官吏的任期有保障，陞遷有標準，薪俸很豐富，而對於官吏的錄用沒有公平的辦法，豈不是把政府變爲現在一般來歷不明的糊塗官的養老院嗎？

現在政府用人，毫無標準，完全要看與要人的關係。不學無術，善於逢迎的人，倒可大做其官。懷抱奇才，人格高潔的人，不是視官途爲齷齪，不願進去，便是屈居人下，不蒙升拔。如是做官的，多不是好人；多數的好人，不願做官。國家在這班人手裏，還有救藥嗎？

因此，關於官吏的任用，必須找出一個客觀的辦法。少數政務官，因爲是代表黨派，決定政策的，所以應該由人民選舉。至於最大多數的事務官，其任用，非經過公平的考試不可。

現在我們雖然有一個考試院，但是並沒有什麼成績。在過去，好像也舉行過考試，但是考試及格的人，並沒有錄用。如果我們眞要拔取眞才，『天下爲公』，肅清貪污，現在這種敷衍死人的考試辦法，實在有澈底改變的必要，至少有三個根本原則必須做到。

(一)考試應歸獨立的，超黨派的機關主理，不受政治影響，不受各方干涉。

英國的文官制度是辦得最好的。在英國，主管考試的機關爲考試委員會。該會係獨立性質，與各部並行，不相統屬。委員三人，爲終身職，都是樞密院資格，由內閣總理呈請英皇特任，聲望隆重，公正廉潔。委員會與政黨沒有關係，不受政治勢力的牽制，完全好像是一個法庭的公平機關。委員的責任，爲舉行考試，錄取文官，及發給及格證書。委員可聘當代學者及各校教授爲典試，助理其事，分任命題，監督，閱卷，給分等事。沒有委員會的證書，各部不能正式任用。

(二)考試須絕對公開競爭。

凡學力充裕，年齡身體合格者，不論黨派，閥閱，貧富，貴賤，男女，應該都可以報名與試，以眞才實學相角逐。考取的，不是非分；失敗的，並不寃枉；一秉至公，鐵面無私。政府可以得到有用的人才，全國學生及其他有爲的青年，有相當的一條出路。有權勢的，不能引用私人；想在政府做事的，不必喪盡人格，各處鑽營。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賢者在職，才有辦法。

(三)各部院，各機關，用人非用得有考試及格的證書者不可。

若像現在的考試一樣，考試及格並不一定錄用，各機關用人更不必經過考試，那末請問考試有何用處？徒然是欺騙國民，枉費與試者的精力，時間，金錢。於政府，多一個閒散機關；於人民，多一種用費的負担。因此，我們沒有誠意採用考試制度則已；否則，須嚴格規定，一切文官，非考試出身，不能任用。如是，考試才有意義；引用私人的惡習，才能打破。

四

現在，貪污並沒有什麼懲罰，不貪污也沒有什麼獎勵。全國制度，好像在那裏獎勵貪污。你不貪污，你是傻子，應該窮困。雖然一切官吏就職的時候，要向總理行三鞠躬禮，要朗誦總理遺囑，要靜默三分鐘，要舉起右手宣誓：『……余決不僱用無用人員，不營私舞弊，及授受賄賂，如違背誓言，願受本黨最嚴厲的處罰，』但是右手放下來之後，兩手便要開始大括特括，數十百千萬不等。在外國銀行立存摺，在租界上買地

皮，造洋房，或寄往外國買股票。這都是應有盡有的事情。大有大的作法，小有小的打算。

到了本人的靠山一倒，又翻過身來，倒向反對派系的方面，又可做官，又可發財。就是最不得志，也可以在租界上做寓公，享清福，或是到外國去遊歷遊歷，美其名曰『考察』，『留學』，『養病』。從來沒有看見殺過幾個貪官，槍斃幾個汚吏，甚至於因爲貪汚而下令通緝，也是少見。街頭刑場所砍的腦袋，都是衣服襤褸，沒有飯吃，而不能不搶的強盜，或是什麼危害黨國的『反動派』。牢裏所關的，也大都是這班可憐的朋友。

這個年頭，這個情形，誰還願意做好人？大家樂得同流合汚，過過舒服生活，講什麼廉恥，講什麼正直。天下老鴉都是一般黑，白老鴉到那裏去找？

老實說，要改變這種空氣，非賞罰分明不可。廉潔勤能的官吏，應該有種種的獎勵，給予獎章，及向社會宣揚。至於罰的方面，我認爲非嚴刑峻法，不能移風易俗。我

們應該與蘇俄一樣，認爲貪污是最大的罪惡。依我主張，馬上實行下列三條法律：

第一，凡貪污在百元以上者，監禁十年。

第二，凡貪污在千元以上者，監禁終身。

第三，凡貪污在兩千元以上者，殺無赦。

如果現在政府馬上殺十個大貪官，黑暗的政治馬上會現出一線光明；殺五十個大貪官，風氣自然會大變；殺一百個大貪官，底下的小官，誰不怕死。這個辦法，比殺幾千幾萬共產黨，土匪，綁匪，強盜，及其他，對於黨國的鞏固，是有效得多。

五

社會的輿論，也有關係。

每個社會，都有善惡美醜的標準。人是社會的動物，對於社會所謂善的，美的，不敢不趨從，因爲趨從，可以得到社會的讚揚；對於社會所謂惡的，醜的，不敢不避免，因爲不避免，須受社會的責罵。法律是有形的，輿論是無形的；惟其爲無形的，故能防

患於未然，使人不知不覺，遷善改過。法律的後盾，是強力的制裁；輿論的後盾，是道德的感化。輿論雖然看不見，但其影響則不下於法律。

因此，良好的政治，須有健全的輿論。今日中國政治的貪污，一般社會也要負一部分責任。社會上對於貪污的行爲，並不怎麽指責，甚至視爲當然。在私人談話當中，我們時常談到某人如何括地皮，談的人固然津津有味，聽的人也覺得與戀愛故事一樣，大家都沒有表示絲毫憤慨，並不認爲這是罪大惡極的行爲。以這種社會的空氣，怎樣可以養成廉潔的政治。

若是我們能養成一種輿論，對於任何一種貪污行爲，羣起而攻，不是筆誅，就是口伐；對於貪官污吏，認爲是化外的強盜，不把他當人看，如舊道德中對於男子做賊，女子偷人的態度一樣，一般官吏自然會有所顧忌。因爲發現之後，不齒於鄉里，不齒於家族，不齒於朋友，不齒於普通社會，就是括到幾個寃枉錢，又有什麽意思？

『百善孝爲首，萬惡淫爲先』，這是過去最有力的輿論。在現在，公共生活黑暗，

卑鄙，齷齪到了極點的時候，我們應該造成這種輿論：

『百善廉爲首；

萬惡貪爲先。』

六

不過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方法，是實現民主政治，設立民意機關。因爲事務官的廉潔，主要的保障，要靠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否採行，又要看最高當局者的態度。若是最高當局者，本身沒有民意機關的監督，不向國民負責，那麼，就是他們不許下級官吏貪汚，誰又去禁止他們自已貪汚？

我們要知道，權力是最危險的東西，沒有監督，必至濫用。在各文明國內，事務官由於考試，政務官出於選舉，全個行政系統，都須受代表人民的國會的監督。在內閣制度之下，如英國，議會第一可以提出質問，第二可以提出不信任案，第三可以通過法律限制行政機關的行爲，第三可以否決行政方面所提出的議案，以表示反對。在上面的行

政長官，如果直接不能得到國會的信任，間接不能得到全國國民的信任，便須辭職，讓反對黨的領袖來組織政府。在美國總統制之下，行政長官雖然是向總統負責的，不是向國會負責的，但是如果行政長官就是高至於總統，有非法行爲，衆議院可以提出彈劾，參議院可以公開審判。

中國在今日黨治之下，沒有人民代議機關，一般官吏，可以作威作福，放僻邪恥，毫無忌憚。全國一年數萬萬的收入，用到那裏去了，我們不知道。借款公開要回扣；苛捐雜稅大部分要充貪官汚吏的私囊。人民沒有過問的權利，也沒有過問的機關，當然沒有過問的機會。所以鬧到現在，無法無天，黑暗到了極點！我們如果要打破這種局面，使官吏有所顧忌，不敢貪汚，非使政府向我們國民負責不可；換句話說，非有民意機關不可。有了民意機關，人民的意見才能集中起來，組織起來，表現出來。有了集中的與組織的民意，表現出來，才能監督一般官吏。否則，結果是：

「竊鈎者誅，

竊國者侯。」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

安內必先攘外

——爲政府進一忠告——

日本打到關內來了！山海關失了！九門口失了！熱河眼見又要失了！前線的士兵與敵人已經交鋒了！敵人的大軍已經壓境了！我們的土地被佔了！我們的人民被殺了！國聯已公然袒日了！英法已與日本祕密諒解了！我們的政府爲什麼不戰？爲什麼不決心戰？爲什麼不準備戰？

依我們局外人的觀察，政府當局的想法，大概認爲『攘外必先安內』；如果不先把共產黨剿滅，軍權統一，政權集中，全國聽命於南京，而貿然對日作戰，恐怕不但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並且一切的『反動』勢力，要乘機起來奪取政權。

政府根據這個政策，所以不派大軍北上去收復失地，而調動三十多萬軍隊，去圍剿

共黨。上海之戰，政府甯願坐視十九路軍的孤軍苦戰，而不願移在江西的軍隊來增援淞滬。

政府更根據這個政策，所以對於日本得步進尺的侵略，不惜忍辱負重。日本佔南滿，不反攻；佔北滿，不反攻；佔錦州，不反攻，佔開北不反攻；佔山海關九門口，也不反攻；就是將來佔熱河，也不會反攻。地方軍隊的稍事抵抗，乃完全出於地方軍事長官的良心，並不是出於政府有計劃的抵抗。

政府又根據這個政策，所以對於國聯，明知其不可倚賴而倚賴。因爲政府的力量完全用在對內，爲轉移國人的眼光起見，對外不能不推給國聯。國聯一次決議，無效，政府不失望；二次決議，無效，不失望；三次決議，無效，也不失望；調查團建議不公道，仍然不失望；最近英法公然袒日，國聯調解完全失敗，還不失望。

政府再根據這個政策，對於國內不滿意，或反政府的個人，團體，監視及壓制得非常利害，誠恐他們乘機陰謀顛覆政府。於是檢查新聞，查禁刊物，禁止集會結社，任意

拘捕殺戮。

這些這些，都是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當然結果。政府當局，其實何嘗不痛恨日本，何嘗不想抵抗日本，不過因爲認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宗旨，所以這一年多，只好放鬆了日本，加緊了對內的工作。

這種政策，自政府方面看來，當然有牠的理由：對日作戰，非全國一致不可；全國一致，非內部無問題不可；內部無問題，非攘除一切危險分子不可。這是一貫的邏輯。何況現在人心，你詐我虞，舊恨新仇，無不思逞；政府那裏能夠放心？既不放心，那裏肯去抗日？

二

我們雖然承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有牠一方面的理由；我們雖然原諒政府採用這種政策，也有牠一方面的苦衷；但是這種政策實行一年有餘，到底有沒有成效，是不是會得到剛剛相反的結果，時局到了這樣危急地步，大可以使我們回頭想想了。

試看國內的糾紛，對外空氣最緊張的時候，也就是糾紛最少的時候；對外空氣最軟弱的時候，也就是糾紛最多的時候。十九路軍與日本在上海拚命，全國莫不同讎敵愾，萬衆一心，願爲政府後盾，沒有那個軍閥敢掀起內戰。等到上海戰事一停，大家的目光，由向外而轉向內，於是山東韓劉之戰發生了，四川二劉之戰發生了，貴州王毛之爭也發生了。現在山海關稍爲抵抗，全國一震動，四川軍閥劉文輝田頌堯們不但願意息爭，並且通電請纓，這可見人心之所向了。

過去一年多，圍剿共黨也未見得有什麽成功。政府的軍隊在江西進剿了幾次，絲毫沒有成績，近來共黨且有反攻的趨勢。在湖北雖然有相當的勝利，但共黨勢力已竄入陝西四川，就全體看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可見這並不是靠單純的武力所能成功的。

至於普通一般人民，因爲看見政府喪權辱國，素來懷疑政府的漸變爲不滿意；素來不滿意的，漸走到反對的地位，甚至有許多人直奔向革命。黨外如此，黨內也有這個現象。

這個『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試驗的結果，只看見人心愈懷不滿，內部愈加不安，軍閥愈無忌憚，一切『反動』派愈有口實可以號召。政府到了這個時候，若還不重新考慮這個政策的厲害，而固執成見，蠻幹到底，那麼對內愈硬，對外愈軟，一切『反動』派，愈要『反動』起來，其勢非逼成大革命不可。

因此我現在要主張一個相反的政策，就是『安內必先攘外』。

三

我們先要認識幾點事實。

第一，我們要認識現在政府的實力，決沒有掃除異系的可能。共產黨的紅軍，擱在一邊不必說。西南各省及北方的各派，與中央也是貌合神離。若是完全靠威力去統一他們，恐怕只有增加內部的不安，或引起繼續不斷的內戰。

第二，我們要認識現在沒有那一種勢力的做法，能夠使全國人民滿意。根據過去的成績，與現在的情形，不但一般國民不知所從，就是各實力派也是看穿了西洋鏡，誰也

不佩服誰，服從誰。

第三，我們要認識在現在思想極端複雜的時候，只有一點，是全國各黨，各派，各個人，各階級都贊成擁護的，這就是對日作戰，實行抵抗。那個人能挺身而起，領導民衆，抵抗日本，便受全國的擁戴。那個黨派，能挺身而起，領導民衆，抵抗日本，便受全國的擁戴。若政府能挺身而起，領導民衆，抵抗日本，那麼更容易得到全國的擁戴。我們看十九路軍在上海之抗日戰爭，義勇軍在東北之抗日戰爭，人民是如何熱烈的愛護！各方面是如何熱烈的援助！

第四，我們要認識，在現在各方面地醜德齊的時候，一切對內的壓迫或相爭的行動，無論動機如何正大，決不能得到全國國民的贊成與擁護。韓復渠爲統一山東政權，而打劉珍年，一般人民固然不同情劉珍年，但也不贊成韓復渠。至於四川貴州軍閥的內訌，更不消說了。

根據上面四點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無

論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對日作戰，實行抵抗，才能眞正統一全國。

歷史上有許多民族，國家，或政治單位，內部無法統一，往往借對外戰爭促成統一。意大利是如此，德意志是如此，瑞士及美國也是如此。從來沒有『寧與外人，不給家奴』的辦法，可以安定內部的。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若是政府不改變政策，長此不抵抗下去，我敢斷言且有後災。

一般人民，一面看見政府對外長此不抵抗，必然日趨憤怒；一面看見政府對內要繼續壓迫，必然日趨『反動』。民衆一天一天離開政府，由不滿到反對，由反對到潛謀革命。政府看見人心已去，愈覺內部不安，愈要對內施行鉗制，對外自然更不得不表示退讓。於是政府與人民，惡感愈深，相激相盪，不至發生革命不止。

共產黨必利用這個時機，一方面攻擊政府的軟弱外交政策，以促進人民對於政府的反感；一方面必以打倒日帝國主義者號召。一部分民衆，因爲不滿意政府，必相率趨於

共產黨旗幟之下，以謀出路。這樣，共產黨的勢力，只有迅速的增加，絕對不會減少。

素來不滿意中央政府的實力派系，也必乘機起來，半出於公憤，半出於私仇，督促政府抗日；督促沒有効力，必另外組織新政權，來號召全國。西南七省大同盟，卽是這個趨向的先兆。請看西南政務會議一月十七日給國府的電報，便可明白：

『自榆陷後，日侵略益加急進，各省抗日救國之呼籲，遍於遐邇，而顏顧等亦電請鈞府澈底抗日，可知國內外人心，實具一致抗日精神。證以國際形勢，尤以非抗日不足以圖存。日前熱河垂亡，平津危急，應請鈞府迅速表示抗日之確切態度，對前方軍隊儘籌撥軍實餉糈，以解國人之憂疑，亚國際之視聽，庶全國振奮，共挽危亡。若猶執迷不悟。誤國殃民，則西南惟有聯合各省同志及全國民衆，共負此責，以期策全國抗日之艱難事業。一息尚存，斷不忍見國家領土喪失分寸也。』

這個電報多麽激烈，多麽露骨，等於說：如果中央政府不抗日，西南要另組抗日政權。假使鬧到這一個地步，恐怕日倒沒有抗到，而自己要互相先抗起來了！

不但共產黨及不滿中央政府的實力派系要乘機與政府爲難，其他黨派，也必競起活動。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毋庸諱言。

一般人民在這種緊張的空氣裏面，恐怕只有跟着眞正抗日的勢力走。誰能抗日，就擁護誰；誰不抗日，就反對誰。這樣一來，中央政府豈不是成了一九二〇年以後土耳其的君士坦丁政府嗎？其運命也就可知了！

所以爲政府打算，只有決心抗日；只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

否則，外固沒有『攘』，內更不能『安』。

或者有人說，若是政府在前面與日作戰，而其他黨派，不但不一致擁護，並且在後面牽制，甚至於陰謀革命，又怎麼辦呢？

我們要知道，現在舉國一致要求抗日，如果政府眞正抗日，當然可以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誰敢出來冒天下之大不諱，反叛抗日的政府？反叛抗日的政府，便是漢奸，便

是賣國賊，便是日本的工具，便是熙洽鄭孝胥之流，與全國人民爲敵。稍爲明白大勢的人，誰肯如此做法；就是如此做法，結果也是自取滅亡。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退一步說，就是反叛的勢力成功，抗日的政府失敗，那麽當局諸公也不失爲民族的英雄，可告無罪於我國民。千秋萬世所唾罵者，不是現在的當局，而是搗擾抗日戰線的國賊。

何去何從，望政府其速自擇。

一九三三年，一月，廿日。

自由之戰爭

——民權保障運動——

一

『中國民衆以革命的大犧牲所要求之民權，至今尙未實現，實爲最可痛心之事。抑制輿論與非法逮捕殺戮之記載，幾爲報章所習見。甚至青年男女有時加入政治集會之嫌疑，遂不免祕密軍法審判之處分。雖……最低限度之人權，亦被剝奪。』

這是孫夫人與黨國元老蔡元培先生等發起民權保障同盟的宣言。

以黨國最重要的人物，而明白承認在黨國之下，『中國民衆至今仍無最低限度民權之痕跡；反之雜誌與報紙，時被封禁；集會與結社，動遭當止。……禁令之嚴，文網之密，至使被封禁雜誌報章之編輯人，卽幸免入獄，亦不敢出而抗議。』可見『最低限度

之人權，亦被剝奪』了。

以黨國最重要的人物，不但明白承認，並且毅然『願喚起中國人民起而努力實現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一切眞正民權之利益，反對一切檢查與禁止；』決然『願喚起民衆，要求最低限度民權之普遍享受，與停止對努力中國進步與解放之著作家，美術家，與雜誌報章編輯人之壓迫，』這又可見民權在今日之中國是如何迫切需要了。

但是我們所謂民權，並不像十七八世紀的學者，如洛克們所說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人民最初締結契約成立政治社會時所保留下來的。這是不切事實的玄想，沒有證據的論斷。我們不相信國家的起源是起於契約，也不相信人類在歷史上某個時代有過絕對完美的自然社會，因爲我們在歷史上找不出這種證據，在現代各種原始社會裏面找不出這種事實。人權天賦是十七八世紀時代的反響，不能做二十世紀要求的根據。

我們所要求的民權，乃是過去歷史所教訓，現代文明所昭示，人民爲發展個人優

性，保障自己利益，促進社會幸福所不能不有的基本權利。我們人類之於民權，猶魚之於水。魚沒有水，不能生活；我們沒有民權，人格便要埋歿，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的生活，都失却穩固的保障與高尚的意義。結果智識，道德，及身體都不能發展，而社會生活也必然沒有進步，日趨於停滯，乾枯，卑鄙！因此，現代文明國家，沒有不承認這些基本權利。只有在野蠻老不長進的中國，還要我們來爭。

二

民權可分兩類：一是積極的民權，如參政的權利，作工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等等；一是消極的民權，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等。如今宋蔡等所發起的民權運動，目的不在爭積極的民權，而在爭消極的民權：乃是退一步的要求，基本的要求，最低限度的要求。故民權保障同盟的目的，限於下列三種：

『（一）爲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而奮鬥，本同盟願首先致力於大多數無名與不爲社會注意之獄囚；

（二）予國內政治犯與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並調查監獄狀況，刊布關於國內壓迫民權之事實，以喚起社會之公意；

（三）協助爲結社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諸民權努力之一切奮鬥。』

因爲這種運動沒有要求參政的權利，作工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所以我們對於積極的民權，在此姑存而不論。因爲這種運動特別要求的是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所以我們不能不加以申說。

人身自由，可以說是基本民權中的基本，若是連這種自由都沒有保障，那麼其他各種自由當然無法行使。隨意先把你拘捕，監察，槍斃，請問你怎樣去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所以一般國家的憲法，莫不有保障人身自由的條款。就是我國臨時約法也有『人民的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第六條）的規定。就是現在的訓政時期約法，也不能不有『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審問，處罰；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

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的明文（第八條）。

這種人身自由權，分析起來，實在包含有三個條件：

（一）任何人民，如果沒有犯法的行為，便不受任何刑罰；換一句話說，任何行為，在發生以前，如果未經法律明白認為犯罪行為，就不受國家機關的處分。這就是法國革命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第八款所宣示『無律文無刑罰』的原則。這就是『法律不溯既往』的根據。

（二）任何人民，如果有犯法的行為，必須由享有逮捕，拘禁權的機關，依法定的手續，去逮捕拘禁，不是隨便什麼個人或機關可以逮捕拘禁。在現代各國的法律，除現行犯外，大概只有法院能夠下令逮捕拘禁。

（三）任何人民，如果有犯法的行為，必須由享有審問處罰的機關，依法定的手續，去審問處罰，不是隨便什麼個人或機關，可以審問處罰。在現代各國的法律，大概只有法院能夠審問處罰。

在今日之中國，當局往往挾其暴力，任意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完全沒有法律根據，不但被捕被殺的人不知犯了什麼罪，就是捕人，拘人，殺人的當局，也不知被捕被拘被殺者犯了什麼罪。捕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的習慣。拘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的手段。殺了以後再說，這是中國當局者的威風。若是『幹』了以後，再宣佈『莫須有』的罪狀，還是對生者敷衍，對死者客氣的辦法。譬如劉煜生就是有犯罪的行為，顧祝同也不是逮捕拘禁的機關，當然更沒有槍斃的權利。然而顧竟非法逮捕了，非法拘禁了，非法槍斃了。在離首都不遠的地方，在文化比較最高的地方，而竟發生這種專制野蠻殘忍的現象，內地的黑暗更可想而知了，他省的黑暗也可想而知了。生命不安全，人身不自由，還談什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因此，我們認為民權保障運動第一要爭的是人身自由。

三

我們人類不但有生命，並且有思想，有意見。『人為萬物之靈者』以此，『人之所

異於禽獸者』也以此。如果我們沒有言論自由的機會，那麼我們的思想或意見，便沒有表示出來的機會，更談不到彼此互相交換，互相切磋。並且言論不自由，就要影響到思想不自由，甚至於完全不思想。不思想，無思想的動物，可配做人嗎？能配做一國的公民嗎？能配做中華『民國』的公民嗎？

文明是思想的產物。言論不自由，就會影響到學術不進步，社會不發展。新奇的學說，認為邪說異端，沒有自由發表傳播的機會。個人的權利，可以任意剝奪，沒有自由申訴的餘地。一切不合理妨害多數人民幸福的思想，制度，及勢力，沒有人敢自由揭露其罪惡，使其改革，可以繼續存在，一直到革命流血為止。因此，在言論不自由之下，除了用暴力打破現狀外，只有被黑暗勢力所籠罩。這是中外歷史所告訴我們的事實。

至於德謨克拉西的政治，更非言論自由不能運用。人民不能自由發表意見，請問如何構成民意？如何組成政黨？如何辦理選舉？如何決定政策？不給人民言論自由，而說給人民民主政治，這是騙人，這是沒有道德，這是無恥。

統治階級或者要說，若言論過於自由，必至引起社會不安，擾亂現有秩序。殊不知人類的根性是好逸惡勞，畏難苟安，非到萬不得已，不願破壞現狀。如果對於現狀的批評是無的放矢，那麼這種批評不但不能得到一般人民的同情，反要遭遇絕大的反感。現狀只有更加鞏固，不會因之動搖。如果對現狀的批評是切中時弊，那麼只有盡量容納，急謀改革。若徒知一味壓迫，倒行逆施，那麼無論你如何用萬鈞雷霆之力，革命終有暴發之時。即使我們記不起一七八九年法國的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總可給我們一個警告罷。

當代第一流政治學家拉斯基說得好：

『國家之准人民批評，即可以驗人民對於國家服從之程度，故批評者，人心向背之索引也。依往事觀之，政府興文字之獄，而能阻遏人民之指摘者，蓋無幾焉。其准人民之自由言論也，弊政既除，自少可以攻擊之機會；反是而加以禁阻也，愈令人民迫而為祕密行動。不觀伏爾丹 Voltaire 乎，彼居法之日，被選為學士會會員，絕不能為害於

法，及遁而至英，見聞大異，於是其譏評法國之語，尤加深切矣。以云列甯，亦復如是，使彼長居俄國，爲國會議員，何能爲革命領袖，乃旣被逐而居瑞士，而謀覆俄皇政之心，乃刻不去懷矣。可知言論自由也，與因言論而生之集會自由也，正所以消彌人心之反抗於無形，亦卽所以刷新庶政之要件。政府爲周諮博訪計，得力於反對者之批評，必較贊助者之頌揚爲多。阻塞人民之批評，卽自種滅亡之根而已。』〔一〕

但所謂言論自由，乃個人發表對於公共問題的意見，不受當局檢查。若是攻擊個人，罵人家男盜女娼，當然要受法律的制裁。這是毀壞他人名譽，這是妨害他人自由，不在言論自由意義之內。在今日之中國，事實剛剛相反。你可以造謠罵人家祖宗三代，你可以散布荒謬絕倫的迷信，你可以刊行極褻瀆的淫書及春宮畫，但是你若一談到政治問題，對現狀表示不滿，那麼『反動』的罪名，馬上就要來到；逮捕，拘禁，甚至於槍斃，隨時隨刻都有可能。這種情形，如不改變，只有逼上梁山，產生馬拉 Marat，譚唐 Danton，羅伯士比爾 Robespierre，列甯 Lenin，杜洛斯基 Trotsky；統治階級或

許要預備做一七八九年後的法國貴族，或一九一七年後，流落上海討飯的白俄。這又是何等慘痛的結局！

言論自由，廣義說來，可包括著作自由，出版自由；狹義說來，只指以口語表示的自由。若我們只有狹義的言論自由，而不能用文字圖畫表示，或利用機器印刷出來，那麼言論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工具，不能普遍的長久的交換與傳布。因此，我們爭言論自由，不能不爭著作自由，更不能不爭出版自由。

爭言論出版自由的方法，我們第一應該要求取消檢查制度，一方面反對對於出版業的干涉，一方面反對對於出版物的干涉。

我們第二應該要求取消特許制度，反對一般報紙刊物，須得政府機關的特許，才能開辦。

我們第三應該要求取消押金制度，如廣東現行的辦法，反對開辦報紙刊物，要繳什麼押金。

我們第四應該要求言論著作及出版自由，只受刑事法典所設的限制；反對於普通民刑法而外，設立其他的出版法。

我們第五應該要求處分違法的出版物，無論是查禁，是封閉，是逮捕編輯人，是拘禁發行者，是罰款，是槍斃，須有司法機關的命令，才能實行；須經法庭的審判，才能處罰；其他個人或機關，無論是那部，那會，那個主席，那個委員，都不能干涉。

四

如果我們眞有人身自由，那麼我們就可以自由行動，自由集合。如果我們眞有言論自由，那麼我們就可以自由向多人用演講或辯論的形式，爲智識與思想的表示。換句話說，集會自由乃包括在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裏面。因此英國的法律，對於集會自由，沒有特別承認的明文，同時也沒有設立什麼特別的限制。歐洲大陸各國，爲保障民權起見，却把集會自由看做一種特殊自由。

爲什麼我們要求集會自由？理由與要求言論自由沒有什麼分別。只有集會，才易交

換意見；只有集會，才易討論學術；只有集會，才易組織團體。否則，就是我們有什麼要求，有什麼貢獻，也難發生影響。

我們不但應該要求集會自由，並且應該要求結社自由。『會』只是暫時的集合，『社』便爲永久的團體。散漫孤立的個人沒有力量，只有大家組織起來才有力量。

非政治的集會結社，在現在的中國，是自由的。但是政治的集會結社，在現在的中國，是不自由的。因爲前者對於當局是沒有妨害；後者對於當局是要監督批評，甚至於希望將來奪取政權。所以現在一切的政治集會結社，都要黨部派人指導監督，就是抗日的集會團體，也不能例外。

如果集會結社，眞是可以禁止，未始不是『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的辦法。無奈人是好羣的動物，政治的動物；你不准他們公開活動，他們必然暗中進行，此所以『黨外無黨』之下，有許多黨的存在。『黨內無派』之下，有許多派的存在。公開集會的結社容易對付，危險性小；祕密的集會結社難於預防，危險性大。古今中外的革命，流血，暴

動，都是祕密的集會結社幹的。你壓迫他愈凶，他反抗你愈力，此所以中國的共產黨比歐美鬧得利害；俄國的革命比德國鬧得利害。

況且今日我們要求集會結社自由，除普通理由外，還有特別嚴重的意義。政府不是在那裏籌備立憲嗎？若是人民到現在還不能得到集會結社的自由，請問所謂憲政如何實行，是不是完全由國民黨制定憲法，別人不能參加意見？是不是完全由國民黨包辦選舉，別黨不能競爭？果如是，則是自選，自舉，自包，自辦，與袁項城的洪憲運動有何分別？所謂國民參政會，國民大會也者，又有什麼意義？所謂由訓政到憲政者，又是如何到法？這就對內而言，我們不能不要求解放。

至於對外，日帝國主義者的白刃，方懸於我們的頸上，推其野心，勢非蠶食我國全部不止。如果我們想救危亡，抵抗這種致命的打擊，我們認為單靠我們的政府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深信今日中國不絕如縷的運命，完全在我全國民衆的掌內；只有我們大家起來，才有希望。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自由聯合，不能自由發表意見，甚至於不能為抗日而

集會，我們怎樣能夠爲國家存亡而奮鬥，爲民族生死而努力？結果，中國只有淪爲非洲，供人宰割；我們只有時日曷喪，同歸於盡。

五

自由之戰爭，因爲時勢的迫切，由民權保障同盟揭開序幕了！我們爲個人的權利，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存亡起見，對於該同盟，對於我當局，不能不進最後之忠告：

我們要忠告同盟諸君：你們的目的是高尚的，你們的運動是正大的。全國民衆，有如倒懸，莫不在那裏希望替他們解放。你們應當抱無畏的精神，堅持的毅力，邁步前進，不屈不撓。你們的運動，須有廣大的民衆做基礎，分子應該加多，組織應該推廣，不應該限於黨派的關係，更不應該限於名流的集團。須知民權是大衆的要求，民權運動須與大衆發生關係；否則，廢除內戰運動的失敗，也就是你們的殷鑒。尼文孫說：『自由如情愛，非時刻注意克服，則不能爲我有；若一度勝利，卽以爲可安享其成，則自由常在喪失中，猶情愛然。——自由之戰爭，永無終止，自由之戰場，永不安甯』。如果

你們是自由的戰士，你們的運動，應該永無終止，永不安息。

　其次我們要忠告當局：你們過去曾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爲剝奪人民各種自由，可以安定社會；放任各種自由，可以引起各種煽動與暴舉。殊不知結果往往與此相反。『白克Burke有言，民衆之暴舉，不能盡歸咎於煽動與密謀，誠以人民痛苦，不予解除，徒責人之煽惑，有何用乎。人民至弱也，政府至強也，非人民慘遭蹂躪，求生不得，雖旁人巧言吹簧，使之密謀不軌，而彼之不樂奮起自若也。鼓動家告人曰，某某權利，爲人民可應要求，使人民心中初無此感觸，初不以喪失此權爲大苦，則誨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焉耳。惟其所要求者，本於人民眞正之衝動，則始之創議者，雖一時挫折，或竟以寡助之故而失敗，其終焉必有翕然景從之一日。麥可蘭氏Macaulay亦有言曰，國家大變之起也，若隱約之聲中語吾儕曰，不改革將無以自存，正謂是也』。〔二〕

（用張士林譯文）

註〔一〕H. J.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P. 121.

〔二〕H. W. Nevinson, Essays on Freedom, P. 15.

[三]H. J.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P. 101.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

戰的政策

戰，是我們素來所主張的。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日本已於二月二十一日開始總攻熱河，華北及沿海一帶局勢日趨緊張。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國聯調解已經失敗，日本決不顧忌國聯，我們再沒有什麼倚賴，再沒有什麼臉面倚賴，只有直接衝突。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政府過去，和戰不決。近來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居然親往北平熱河，籌畫軍餉，慰勞將士，並公開宣言『強盜臨門，惟一生路是武力自衛，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拚死，才是唯一的生路』。準此，政府已下决心拚命。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華北軍事領袖張學良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棄瀋陽，棄錦州，棄了全個東三省。現在

也到了忍無可忍，毅然與二十七將領通電：『舍奮鬥無以求生，舍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準此，張學良及華北將士也下了决心拚命。戰是不可避免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熱河主席湯玉麟通電：『現在大戰既已開始，玉麟謬膺疆奇，守士有責，誓與國士共存亡。』準此，湯氏也下了决心拚死。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日本進攻已逼我們不能不戰，國際形勢已逼我們不能不戰，國內局面更不容許我們不能不戰。戰是已經開始了！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

戰便要有戰的政策，戰而無政策，無準備，必失敗，必誤國，必無意義必無結果。

我們主張第一個戰的政策是與日本斷絕國交，撤回公使，公然的戰。日本強盜不顧信義，不顧公理，搶我士地，殺我同胞，一切和平方法都已絕望，我們與日本有何國交可言。廿萬軍隊已經在熱河肉搏，難道我們還要與強盜觥籌交歡？外交界如伍朝樞，如

陳友仁，都主張撤回公使；就是我駐日內瓦代表顏顧郭等也有電報作同樣的請求。可見這不但對內有利無害，並且對外也非這樣做去不可。我們現在應請馬上把日本駐華的公使送出去，把我們駐日的公使召回來。如是才可表示我們的決心，鼓勵我們的民氣，統一我們的意見。「我們與日本戰，所恃者，不是新式的武器，不是新式的技術，不是新式的訓練，不是充分的軍餉，不是充分的接濟，乃是我們全個民族的肉，的血，的氣。我們與日本戰，所恃者，不是組織完備的政府，而是前仆後起的民衆。只有斷絕國交，公然的戰，才能激發人民的情緒，統一全國的力量，使大家有必死之心，背水借一，與敵周旋。否則，一面言戰，一面想和，首鼠兩端，舉棋不定，外不能得友邦的同情，內不能得人民的信仰，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二個戰的政策是擴大戰的範圍，由局部的戰，成爲全部的戰。日本利在縮小範圍，免啓國際干涉；我們利在擴大範圍，引起國際干涉。日本利在步步侵略，以便鞏固她既得的勢力；我們利在全局混戰，鬧得大家鷄犬不甯，同歸於盡。我們是被輕

視者，被壓迫者，被蹂躪者，一無所有的無產國家，破爛不堪的文物制度，我們有何顧慮？我們有何可惜？我們應該舉國與她戰，隨時隨地與她戰，不應該讓一隅與她戰。即使日本打南京，打武漢，打上海，打海州，打青島，打福州，打廣州，把我們沿海沿江口岸，打得粉碎，亦所不惜。只有這種大戰，才可以拖日本下水，拖列強下水，揭起世界大戰的序幕，團結全國的精神，死中逃生，打開血路。否則，讓敵人隨便擺佈，今天割一城，明天佔一地，以漢奸爲先鋒，以蠶食爲手段，遠交近攻，挑撥離間，使我一隅抵抗，他處旁觀，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三個戰的政策是不但要抵抗的戰，並且要反攻的戰。只有抵抗，沒有反攻，那麼只有失敗，沒有勝利；只有被動，沒有自動；只有失，沒有得；只有退，沒有進。這是束手待斃的戰法！長此下去，軍心要渙散，民氣要委靡。上海之戰，我們失敗在此。我們現在既然決定要戰，我們便該應居於主動的地位，當攻的要攻，當守的要守，不能隨便讓日本擺佈。否則，日本可以集中兵力，今取熱河，明攻平津，有如探囊

取物，絲毫不受牽制。結果，我們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四個戰的政策是與共產黨妥協，移江西的政府軍隊與紅軍往前線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前者朱毛宣言，只要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不派軍隊進剿，共黨可以一致抗日。軍事委員長蔣介石，也有勸朱毛歸順的文告。不過我們以為如果要與共黨妥協，政府不應該把他們當做土匪看待，也不應該把他們當做被征服者看待。共黨在過去的舉動，雖有種種錯誤，但他們究竟是自家人，究竟可以代表一部分的政治勢力，究竟是政治黑暗的一種反應。政府應該網開一面，讓他們有一條路可走。在共黨方面，也應該澈底覺悟：陷於殖民地的中國，只有整個的民族鬥爭，才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可能。如果長此用階級鬥爭的手段，破壞對外的戰線，抵消對外的力量，結果只有大家死於日帝國主義蹂躪之下，共產主義更無實現的機會。事到於今，我們深信非舉國一致不能抵日。我們認為國共兩黨鷸蚌相爭，無論誰勝誰敗，都是漁人（日本）得利。因此我們主張政府與共黨妥協。妥協的條件是：共黨（一）須交出紅軍，讓政府收編，調往前線；（二）

須放棄階級鬥爭政策，以期全國內部一致。政府（一）須相當容納共產主義的政策，如平均財富，生產公有等；（二）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共黨及其他黨派有和平公開參政的機會。否則，共未剿清，熱河已失，外寇深入，豆萁相煎，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五個戰的政策是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積極方面，召集國民大會，給人民以參政的權利。消極方面，給人民以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使人民與政府打成一片；使各黨各派和衷共濟，消滅一切的仇視，隔膜，誤會，共肩起抗日救國的責任。我們深信只有民主政治，能使政府與人民一致；也只有政府與人民一致，才能同讎抵日。我們更深信只有保障民權，能使人民組織起來；也只有人民組織起來，才能長期抵抗。否則，政府沒有人民的擁護，社會有如一盤散沙，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六個戰的政策，是改良現行政府組織，樹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我們不但要求民主的政府，並且要求有效率，有能力，行動敏捷的政府。現在政府組織，重床

壘架，不能運用。如五院中操實權的行政院，須向中政常會負責；中政常會須向中政會負責；中政會須向中執常會負責；中執常會須向中執會負責；中執會須向全國代表大會負責。這種組織，在平時已經運用不靈，在戰時當然更不適合。何況這些會，這些院，這些部的要人太多，又多避居處，不負責任。結果是互相推諉，茫無頭緒。英國在歐戰的時候，因爲原來的內閣有二十三人（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以前），人數太多，不能當機立斷，行動敏捷，起初只有五人，後來增至七人。如果我們要樹立強有力的政府，來應付這空前的國難，便應該將决定政策的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並使這少數人向代表人民的機關負責。一面顧到民意，一面顧到效率，才能與日本作殊死戰爭。否則，中央行政機關，發言盈庭，會而不議，議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快，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第七個戰的政策是全國總動員，把全國工業，商業，交通，及其他生產機關，都集中於戰時政府底下；並使全國男，女，老，幼，都擔任直接間接與戰爭有關係

的工作。全個國家，變成一個戰鬥的集團，每個人都有他或她的任務：打仗的打仗，製械的製械，看護的看護，生產的生產，沒有一個人空閒，沒有一點浪費，須這樣組織起來，才能與敵人作有力的周旋，致敵人的死命。若像現在一樣，熱河大戰，其餘各地人民還是歌舞昇平，泰然無事；其餘各地軍隊，還是袖手旁觀，甚至相互操戈。這是無組織的現象，滅亡的先兆，結果必失敗，必誤國。

我們主張最後一個戰的政策是屢敗屢戰，堅持到底的戰。以日本的軍力，的準備，的國勢，無論如何，我們起初是必敗的。知己知彼，我們毋庸諱言。如果我們一戰而敗，再戰而餒，三戰而乞和，那是沒有意義，犧牲沒有代價，日本不會吃虧，列強不會牽入。與其這樣不澈底的戰，不如馬上痛痛快快的和。我們如果要戰，便要有破釜沉舟的決心，雖屢戰屢敗，但屢敗屢戰。日本雖強，沒有方法可以鎮壓我全個國家。長久抗戰的結果，日本必民窮財盡，發生社會革命；列強必牽入漩渦，激起世界大戰。到那時，必到那時，我們才可在血光中，找到我們民族的新生命。

戰是不可避免的了！今日之事，實逼處此，只有戰！戰而無政策，無準備，必失敗，必誤國，必無意義，必無結果。戰必須有政策，有準備，才有意義，才有結果，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十五日。

領袖的條件

一

現在政治界上活動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想做領袖，而又沒有做領袖的資格，誰也不服從誰，誰也不佩服誰，結果大家都不能做偉大的領袖，分成無數無數的黨派。我們把『眞命天子』打倒，但是草頭英雄太多，所以鬧到現在，還沒有出路。社會上於是發生一種心理，對於各種運動的領袖，不問好壞，一概不信任，甚至於加以冷笑譏諷。

我們能可以不要領袖嗎？如果可以不要，我們何必要惟他人之馬首是瞻。但是馬羣有馬羣的領袖，雞羣有鷄羣的領袖，一切好羣的動物都有領袖。人是動物，好羣的動物，當然也免不了要領袖。我們服從領袖，一半出於人類的本性，一半出於合羣生活的必要。

在君主政體之下，最高的政治領袖，沒有問題，因爲世襲的制度，給了我們一個不

費事的解決——當然同時是一個不合理的解決。在民主政體之下，不能用世襲的制度去解決政治領袖問題，所以領袖問題更加重要。好的領袖，可以領我們到樂園；壞的領袖，也可以領我們到地獄。我們把滿清的『眞命天子』推倒，中間經過廿二年的時間，到現在還在迷途之中，找不到出路；缺乏偉大的領袖，未始不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二

專門研究領袖問題的書還是很少。領袖個人的條件是些什麽？他們如何能做到領袖？現在的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還不能作切實的解答。

柯萊 Charles H. Cooley〔註一〕說：領袖必須有顯著的個性及廣大的同情；做起事來，必須有決斷，有自信力，能夠把握得住他所處的局面；並且對於前途，有信仰，有希望，勇敢的，熱心的向前進。

還有一個社會學家羅時 E. A. Ross說：〔註二〕堅強的意志，自信力，想像力，勇氣，及堅持到底的精神，是做領袖不可少的元素。

至於由政治學家出身而來研究領袖問題的，首推密却爾 Robert Michels。他舉出六個領袖的要素：〔註三〕第一，堅強的意志；第二，超常的智識；第三，不拔的信念；第四，純潔的動機（使人家相信）；第五，自給的能力；第六相當的名望。在民主國家裏面，領袖多靠一支筆一張口出身。所謂一支筆，就是辦報，寫文章；所謂一張口，就是演說。因爲這些是代表民衆的意見及利益的工具。

在他的近代民主政體裏面，蒲徠士 Bryce〔註四〕認爲創造力及確切了解影響人民心理的勢力與人民的需要，是兩種做領袖不可少的條件。以外，筆能寫得出，口能說得出，也是很重要。政治領袖不一定要提出什麼新奇的理想，但是要能擇取適合環境需要的好主張，領導人民向前走去。

最後我還要再舉一個人的研究，來作參考。麥利恩C. E. Merriam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系主任，曾經做過芝加哥市長的候選人，並且幾乎當選。他近年來在芝大創造了一個新學派（名科學派），研究政治學，專從研究政治領袖着手，雖然還沒有很大的成功，但

爲一般人所重視。據他的意見〔註五〕，領袖第一大概要有結實的體格，如美國的華盛頓，甲喀遜，林肯，羅斯福都是體力強健，能夠吃苦的人；第二大概要有豐富的智識及中等以上的才能；第三大概要人家可以相信得過，他是誠實的，誠懇的，純潔的；第四大概他要有精力，判斷力，堅持力，勇敢的精神，靈敏的腦筋，創造的能力；第五，大概他須代表民衆的利益（不管那一部分）。他對於社會經濟的勢力及其趨向，要感覺異常的靈敏；對於民衆共同行爲的可能路線，要見得快，做得快；要有組織及聯合的能力；要有表示民衆的感情與利益的能力（多是用筆及口）；要有勇氣，能做人不敢做的事，說人不敢說的話，要有使人欽佩的人格。

若是我們歸納幾個學者的意見，領袖的要素，大概如下：

（一）體質方面——強健。

（二）意志方面——堅強。

（三）精神方面——勇敢，堅持。

(四)動機方面——忠誠，純潔，同情心。

(五)智識方面——中等以上。

(六)能力方面——決斷力，創造力，組織力，精力靈敏，腦力，及表示能力（筆與口）。

(七)宗旨方面——(一)須代表民衆的利益；(二)須了解社會經濟的勢力；(三)須感覺民衆的痛苦與需要。

三

上面所說，乃是偏於政治領袖一方面，其實其他各界領袖的條件，大概相差也不很多。在今日中國社會生活轉變之中，無論那方面都需要良好的領袖出來領導，打開一條生路。我們的教育方針，理應該在量的方面，採取普及教育的方法；在質的方面，養成良好的領袖人才，使他們能夠担當重任，不致貽誤國家社會大事。後者的職務是大學的職務。但是今日中國的大學，只能造成奴才，不能造成人才；只能爲有錢的哥兒姐兒們

造成做裝飾品的資格，不能造成建設新中國的工程師。

新中國的工程師(領袖)，須附帶說一句；除了須具領袖普通的元素外，還須特別有爲公犧牲的精神。在這個自私自利到了萬分的社會，非有極端爲公的精神，不能感動人心，改變風氣；非有絕大犧牲的精神，不能排除困難，達到目的。

註：C. H. Cooley, Human E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ch.9.

E. A. Ross, Social Control, chs. 17, 18, 21.

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J.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ch. 76.

C. E. Merriam, American Party System, pp. 38—49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對內的平等

一

『先從求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後可以打破對外的不平等，』這是李烈鈞先生三月二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講提出的警語。

爲什麼要『先從求自己的平等做起，』當然因爲現在中國有不平等的事實。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拿全國人民的血汗來辦黨，最大多數的人民却沒有自由結社的機會。

最少一部分人包辦了全國的政權；最大多數的人民却沒有過問國事的權利。

最少一部分人佔據了國家公共的機關和位置；最大多數的人民連監督的機會也沒有。

最少一部分人操縱了全國的報紙雜誌郵電及其他傳達意見的工具；最大多數的人

民，如有對現狀表示不滿意，便是反動。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黨化教育，強迫最大多數的人民信仰自己所不一定信仰的主義；最大多數的人民，沒有思想自由，當然不能自由思想。

最少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法律，是命令；最多數的人民的意見是邪說，是異端。

最少一部分人造成的法令，自己可以違反破壞；最大多數的人民，對於自己所沒有直接或間接同意的法令，便非服從不可。

最少一部分人大權在手，可以不抵抗斷送四省領土；最大多數的人民連抗日救國的機會，也剝除殆盡。

最少一部分人只有權利，沒有義務；最大多數的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最少一部分人行動絕對自由；最大多數的人民行動絕對不自由。

這是中國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實，李先生所謂『先從求自己的平等做起，』其意大概就是在此罷。

但是還有一方面不平等的事實，我們不應放過。

最大多數的人民，生活沒有一點保障；最少數的人却有整千整萬的現款存在外國及中國銀行裏面。

最大多數窮苦的人民，担負全國的賦稅；最少數有錢的人，倒可以不納稅，或納得很少，或納了又把稅的負担推到窮苦的大衆肩上去。

有許多人吃樹皮，草根，觀音粉；同時有一部分人吃六十元一碗的魚翅，抽十五元一枝的雪茄烟。

有許多人衣不能夠蔽體，就是沒有凍死，也要比野獸還可憐；同時有一部分人衣必錦繡綺羅，一套時裝要值千金萬金。

有許多人窮得穴居野處，或是住的地方擁擠得無立足之地；同時有一部分人，到處空着許多美麗的花園，及三宮六院的別墅。

有許多人像牛馬一般的拉黃包車；同時一部分人坐汽車兜風。

有許多人一天做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沒有休息；同時有一部分人成天成夜的去嫖，賭，逍遙，抽大烟。

有許多人終身沒有一個太太；同時一部分人的太太不計其數。

作工的人沒有飯吃；有好飯吃的不作工。

有錢的不工作；作工的沒有錢。

統治階級有報酬，沒有貢獻；被壓迫的人們有貢獻，沒有報酬。

軍閥官僚及其附庸吸吮平民的血汗，而大肆揮霍。勞苦同胞的血被吸殆盡，面色已經慘白，四肢已經枯槁，不但是沒有賬看，而所得到的是手梏與足鍊。

這又是中國經濟不平等的事實。說起來大家大概不會否認罷。

政治上不平等促成經濟上不平等；經濟上不平等又促成政治上不平等。政治的特權階級，可以利用其權威與地位以榨取人民，變成腰纏萬貫的富翁，又可利用其經濟的勢力，去鞏固維持統治階級的特權。於是我輩小民，只有向壓死，氣死，凍死，餓死的坟

墳裏走！荒野裏的白骨，溝壑中的遺骸，及監獄內的囚犯，刑場上的冤鬼，這都是不平等狀況下的被犧牲者！

二

請問在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底下，我們眞能全國一致嗎？眞能精神團結嗎？我不能嘴着良心，良心告訴我，只有虛僞的宣言，欺人的談話，可以這樣嚷着。不但聽者不能相信，就是說的人心裏又何嘗相信？人民只有怨恨，憤怒，切齒；甚至反對當局，比反對日本人還利害。熱河的失守，不是我們很好的教訓嗎？湯玉麟壓迫榨取的結果，一般民衆早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理，所以日本一進攻，熱河的民衆不但不爲湯氏的後盾，並且乘機要與湯氏爲難。湯氏之所以棄甲曳兵而逃，這是最大的原因。這雖然是家醜不應外揚，但是外揚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你難道可以說熱河的民衆都是漢奸嗎？除非喪心病狂的人，可以這樣相信。請問設心處地，熱河的民衆有擁護湯氏鴉片政府的義務嗎？有援助萬惡當局，使他繼續壓迫自己的道理嗎？日本人統治的罪惡，還沒有嘗

到；湯氏統治的罪惡，已經嘗夠了。熱河人民爲什麼要與湯氏一致抗日？與湯氏又有什麼精神可以團結？這點難道還不能使我全國的當局覺悟嗎？

如果我們國民無條件的一致抗日，再假定政府有誠意抗日，長此下去，即使我們能收復東三省及熱河，於我們小百姓又有什麼好處？東三省還不是跳舞將軍張學良第二的天下嗎？東三省的政治，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的不能過問嗎？老百姓出血汗所生產的大豆等物，還不是一樣的被榨取嗎？熱河還不是鴉片將軍湯玉麟第二的天下嗎？熱河的政治，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的不能過問嗎？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的被強迫種鴉片，以供獨夫的剝削嗎？中央政府還不是仍原歸一黨包辦嗎？全國的財富，還不是一樣被貪官汚吏土豪劣紳所佔取嗎？與我們小民何干？與我們小民何涉？並且恐怕統治階級穩定之後，對於我等小民，更要賤視，更要壓迫，更要榨取。我們這樣一致抗日，豈不是『自作孽不可惑』嗎？

我們並不是反對一致抗日，其實我們無時無刻不是主張全國精神團結，一致抗日。

不過我們不像黑心瞎眼的人，口裏嚷出一致抗日的口號，而心裏明知這種局面不改變沒有方法一致，而偏要維持擁護這種不平等的關係。我們眞正要一致抗日的人，不能不努力打破一致抗日的障礙。障礙一日不除，那麼所謂全國一致，精神團結，是虛僞的，騙人的。不但不能一致，並且要引起內部的革命。日俄戰爭正酣的時候，俄國人民長久被壓迫的結果，不是不管三七廿一發動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嗎？歐戰正酣的時候，俄國人民長久被壓迫的結果，不是不管三七廿一，發動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嗎？政府一天到晚壓迫人民之不暇，人民力謀暴動之不暇，怎樣去精神團結？怎樣去一致抗日？

我們很明白：今日之中國，並不是全國人民的中國，乃是最少數一部分人的中國。我們受日本人的統治，固然是奴隸；我們受國內一部分人的宰割，又何嘗不是奴隸？除了一個國界以外，同是做奴隸，有什麼分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說政府是不抗日，就是政府抗日，老實說，全國人民也不會怎樣熱烈的擁護，始終不變的擁護。

我不是說瞎話，我所說的是中外古今歷史所昭示的眞理。我不是攻擊任何方面，的

確我看見了這種局面的危險不能不老實指出。

因此，如果我們要舉國一致，精神團結，對付我們的敵人須『打破對外的不平等，』必須『先從求自己的平等做起。』怎樣做法？有誠意，很簡單。

政治上，我堅決的相信，須立卽實行民主政治：

(一)釋放一切政治犯；

(二)恢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各種自由；

(三)立卽用普遍的，公平的選舉方法，召集國民大會，接受政權，制定憲法。

經濟上，我又堅決的相信須立卽實行社會主義：

(一)貪官汚吏(包括軍閥)所得寃枉的財產充公；

(二)從此以後，發現貪官汚吏，處以極刑；

(三)平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

(四)用極重的累進法，徵收遺產稅，土地稅，所得稅；

（五）國營大規模事業，保障失業者的生活。

讓作工的人吃飯，吃飯的作工，不作工的餓死，或滾出國外去！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近東病夫給遠東病夫的教訓

一

土耳其是近東的老大病夫。中國是遠東的老大病夫。

在十五六世紀的時候，土耳其是一個強大帝國，領土跨歐，亞，非三洲的地方，當時歐洲各國那個不怕她。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也是一個強大帝國，土地之大，人口之多，聲威之遠，比土耳其有過無不及。

土耳其自十八世紀以後，漸受俄奧英法普（後爲德）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與壓迫。中國自十九世紀以後，也漸受英俄法德日美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與壓迫。

在從前，土耳其與中國都是東方式的帝國，君主專制，朝臣弄權，政治腐敗，人民被治好像奴才，沒有參政的權利，當然更不會發生愛國的觀念，全國一盤散沙，只有待帝國主義的蠶食與瓜分。

帝國主義國家如何處分此近東告朔之餼羊？蠶食乎？又如何蠶食乎？瓜分乎？又如何瓜分乎？利害縱橫錯雜，彼此鈎心鬬角，於是構成國際政治中所謂近東問題。帝國主義國家又如何處分此遠東告朔之餼羊？蠶食乎？又如何蠶食乎？瓜分乎？又如何瓜分乎？利害縱橫錯雜，彼此鈎心鬬角，於是構成國際政治中所謂遠東問題。

列強挾其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優越勢力，以侵略土耳其與中國，結果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以剝削此近東的病夫與遠東的病夫。如協定關稅，如治外法權，如其他種種在政治經濟上的特權，莫不應有盡有。

土耳其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領土日蹙，尤以十九世紀中所喪失的爲最多，總計有希臘，羅馬利亞，塞爾維亞；與門地內關羅的獨立，布加利亞與東羅美尼亞的自治；高加索一帶與黑海北岸之見併於俄，阿基爾與突尼斯之見奪於法，埃及與地中海大小各島之見攘於英。在同一個世紀中，我們中國所失的領土，舉其大者，有香港，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伊犂以西，琉球，安南，緬甸，高麗，台灣；以及膠州，旅順，大

連，九龍，廣州灣，威海衞等地的租借。

土耳其因外患日深，內政腐敗，人民不能不起而挽救，於是發生一九〇八年的革命。中國也因爲外患日深，內政腐敗，人民不能不起而挽救，於是發生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及一九二六年的國民黨革命。

一九〇八年少年土耳其黨的革命失敗了。中國的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以及最近的國民黨革命也都失敗了。

土耳其因爲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參加歐戰失敗的結果，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不可勝計；並且希臘還要乘火打刧，進兵攻取土耳其所剩下來的腹地。中國自九一八以後，所受日本的宰制，如東三省，如熱河，都已一一奪去；日本現在還在進兵攻取我們的腹地——華北。

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政府爲帝國主義所挾持，採取不抵抗主義。現在我們中國的南京政府也爲帝國主義所挾持，採取不抵抗主義。

比較至此，近東的老大病夫與遠東的老大病夫，簡直是維妙維肖，難兄難弟；但是往後的情形便不同了。

二

土耳其在一九一九年危急存亡的時候，出了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在今日中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的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在那裏？

基馬爾將軍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居然成功，那麼我們如果要抗日救國，有許多根本原則，可以作我們的參考。因爲今日中國所處的情形，與昔日土耳其所處的情形，有許多地方是完全相同的。

（一）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一認定君士坦丁堡政府爲賣國政府，不足與圖存，非另外樹立革命救國的新政權不可。

君士坦丁堡政府老朽昏庸，儒弱無能，甘心爲帝國主義的傀儡，對於希臘的進攻司密拉及小亞細亞腹地，採取一貫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讓；對於列強的予取予求，則奉命

惟謹，不敢有絲毫異議；獨對於人民，發揮其威力，多方壓迫。基馬爾將軍看透這是澈上澈下的賣國政府，與之圖抵抗希臘的侵略及列強的野心，無異與虎謀皮。所以不等君士坦丁堡政府正式簽押賣國的塞佛爾條約，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樹立革命救國的新政權。

（二）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二認定君士坦丁堡在帝國主義勢力監視之下，無活動的餘地，要樹立革命政權，非到內地去不可。

自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土耳其簽了瑪德洛停戰協定以後，韃靼列爾與博斯佛拉海峽完全開放，協約各國軍艦可以自由出入，砲台戰艦須一齊交出，交通機關都被佔據，英法軍隊且直接開進君士坦丁堡。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要舉兵反抗，非到內地去活動不可。因此，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基馬爾貶爲小亞細亞東部爾查倫州的一個小鎮守使，在已有決心的基馬爾看來，正是求之不得，欣然東去，不願再與賣國政府鬼混，更不願受帝國主義者的監視。

（三）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三，認定革命救國運動，不是爲合之衆及一盤散沙的國民所能做到，非有政黨的組織不可。

土耳其已成的政黨，原有少年土耳其黨，但自參加歐戰以來，該黨已成強弩之末，沒有堅固的組織，偉大的領袖，鮮明的主張，積極的行動，不足以担負此革命救國的重大使命。因此，基馬爾到埃爾查倫之後，卽着手組織土耳其國家黨，於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召集第一次大會，正式成立，並議決：『我們的根本原則，在奧托曼帝國的保全，如帝國其他各地不能共同行動時，則我小亞細亞東部諸州，當担任捍衛之責。』至九月十三日舉行國家黨第二次大會，基馬爾便正式當選爲領袖，並堅決的議決：『不論何種情形，我土耳其的獨立自由，決不能聽受他人的限制，所以凡我土耳其人民所居各省，不論何地，我們都不承認其離帝國而分立。』有了這樣堅決的政黨，才能發動革命的運動。

（四）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四，認定革命救國運動，不是空言

所能做到，非有民衆的武力不可。

因此，基馬爾到了小亞細亞，除組織政黨外，即進行組織軍隊。除利用當地沒有解除武裝的一部分軍隊外，他招集了舊卒散兵，重新編制，勤加訓練，以成爲革命武力的土耳其國民軍。

（五）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五，認定革命救國運動，須有極簡單明瞭的目標，然後能集中全國的力量，達到最後的目的。

一九二〇年君士坦丁堡政府召集新議會，土耳其國家黨也參加選舉運動，並由當選的議員提出了一種國民公約，經全場一致的通過，作爲全國民意的總表現，及革命運動的大方針。

（六）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六，認定革命的新政權，非實行民主政治，建立在民意之上，不能全國一致，精神團結，以與帝國主義對抗。

國民公約一致通過之後，各帝國主義國家極爲震驚；尤以英國爲最甚，竟派兵入君

士坦丁堡橫行干涉。君士坦丁堡政府不但不嚴重抗議，並且奉命逮捕國家黨議員。基馬爾等實偪處此，惟有正式否認君士坦丁堡賣國政府，在安哥拉召集國民大會，集合全國人民的代表，廢止傳統的君主政體，組織民主政府。土耳其全國人民自經此番解放之後，莫不歡欣鼓舞，如醉如狂，爲祖國效死。前此一盤散沙，漠不相關的態度，一掃乾淨。

（七）基馬爾將軍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們，第七，認定要保全土耳其的獨立自由，恢復已失的領土，制止帝國主義的進攻，非搖尾乞憐的外交政策所能做到，必須對外作戰，以鐵與血去與敵人周旋。

一九一九年五月，希臘佔據司密拉，復以英法意三國爲後盾，進犯恩納托立亞。基馬爾於土耳其戰敗之後，收集殘兵散卒，有衣履不全者，有械彈已失者，憔悴疲敝的情形，不可言狀。但人心憤激，民氣可用，振臂一呼，四方響應，於是土耳其與希臘的殊死戰爭，便告開始了。第一年（一九一九年）希軍大勝，勢如破竹，但土軍毫不消極，

悲觀，失望。第二年（一九二一年），希軍便沒有開頭那樣得手；到了第三年（一九二二年），土軍極力反攻，希軍卒至不支，全師潰敗，棄甲曳兵而逃。於是基馬爾及其所領導的愛國志士的革命運動，便告成功。

從此之後，各帝國主義國家，再不敢小視起死囘生的土耳其，除老實承認安哥拉政府外，復召集洛桑會議以解決土耳其與協約國間的問題。近東病夫一旦忽然與世界強國並駕齊驅，折衝議席，不但是土耳其本身的光榮，並且是我東方國家的光榮。

土耳其代表乘戰勝的餘威，根據全國民意結晶的國民公約，堅持不讓，終把塞佛爾條約宣告死刑，另定洛桑條約，將已失的領土恢復，將不平等條約取消，而成爲一現代強國。

照土耳其復興的歷史看來，誰說中國沒有救藥？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三日。

附本文譯名中英對照表：

希臘	Greece
羅馬利亞	Roumania
塞爾維亞	Servia
門的內閣羅	Montenegro
布加利亞	Bulgaria
阿及爾	Algiers
突尼斯	Tunis
埃及	Egypt

怎樣復興農村？

農村破產已成爲全國普遍的現象，復興農村當然是人民一個最迫切的要求。以會議爲能事的政府，於是又有復興農村委員會的召集。

這個會議最使我們莫明其妙的，便是所聘請的委員，如果加以分析，大體不外是上海的資本家與北平一部分智識階級的代表人。你說牠是一個專家會議嗎？可是，我們沒有看見一個眞正的農村經濟專家。你說牠是代表農民意見的機關嗎？可是，這些委員大體都是大都市的紳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朋友。爲什麼政府不找些眞正農村出來的代表或專家？天知道，地知道以外，只有當局知道。

其實，農村決不是開兩天會所能復興的，猶之日本決不是叫兩聲『長期抵抗』所能抵抗的。農村破產的根本原因，稍爲明瞭社會情形的人，誰不知道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政治的腐敗？就是汪精衞院長自己，在他的開會辭中，也不能不勉強承認

說：

『自通商以來，生貨出口，熟貨進口，誠爲一大漏卮；然至今日，則生貨也要從外國輸入。中國向來的主要產物，如米，麥，棉花等，到現在每年大量的由外國運來；有了這種競爭和壓迫，中國的農村，便更日趨衰落。在政治方面，又有許多破壞農村的原因，共產黨的擾亂和日本侵略不消說，而各地方也不免有不肖的官吏在那裏剝削，有不良的軍隊在那裏騷擾，試問農民如何支持得住。於是農村崩潰，乃愈不可收拾』。

旣然農村崩潰的根本原因，在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政治的黑暗，那麼請問根本原因不除，復興究竟從何說起？

譬如稍爲詳細一點說罷。

貪官汚吏不肅清，農民仍然受他們的剝削，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苛捐雜稅不廢除，農民血汗之所得，仍然要被軍閥官僚及其工具榨取殆盡，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預征錢糧不禁止；像四川已預征至民國六十年，農民往往一年要納兩次錢糧。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勒種雅片，要人民不種五穀種毒物；公賣鴉片，使人民沒有飯吃，只抽大煙。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不停止，戰區以內的農民，田園被踐踏，屋宇被燒燬，食物牲畜被掠奪，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戰區以外的農民，要直接間接担負無量的內戰經費。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中央當局濫發公債，地方當局濫發軍用票或省庫劵或銀行劵，吸收人民的現金，不但不用之於有益社會的生產事業，反而用之於殘民以逞的內戰，或充少數民賊的私囊，存入外國銀行，做帝國主義侵略同胞的材料。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土毫劣紳勾結官吏，橫行鄉曲，重利盤剝，吞併農田，農民辛苦一年，到了秋穫，除了清償積欠沒有存糧，到了後來，有田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不得不把田賣掉，自己

沒有田的佃戶，只有賣子鬻女或流為游民乞丐。這種壓迫不除去，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農民被壓迫而流為土匪共黨，政府不想方法澄清政治，使人民有安居樂業的機會，而專事勦殺，以致愈殺愈多，愈鬧愈兇。請問，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軍閥官僚土毫劣紳利用其權勢與括來的民膏民脂，去收買地皮，自為田主，以至有田的不種田，種田的無田種。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既不能取消不平等條約，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又不能抵抗外來的進攻，保障領土的安全；連保護關稅也不能實行，抵制日貨也要取締，以至外國商品，由沿海侵入內地，由都市侵入農村，如狂風暴雨，沛然莫之能禦。農民以低價的原料，去換高貴的洋貨，一出一進，兩重剝削；手工副業如養蠶，採茶，紡紗，織布等項，更被破壞無餘。生活日益昂，生計日益窮，請問，這樣，農村有復興的希望嗎？

奇怪，這次復興農村委員會開了兩天會，委員中沒有一個提到這些根本原因（至少

我們在報上沒有看見），並且所通過的各條綱要，也沒有一條保障這些根本原因的剷除。請問在現在的政治情形底下，通過什麼技術的供給，農民銀行的設立，農村自治的實行種種綱領，有何用處？是不是等於『畫餅充飢』，向國民做一個『手勢』Jesture？結果，恐怕徒添設了許多新的機關，增加了農民的負担；農民倒沒有救濟，而救濟了少數無事可做的同志。

老實說，農民所希望的很小很小。他們在目下並不希望政府給他們技術的供給，資本的接濟，以及什麼衞生教育等等。他們只希望，軍閥官僚不要剝削，榨取，內亂，給他們一個安居樂業的機會，如是而已。如果這點能夠做到，農民『仰沾雨露之恩』，將『啣環結草以報。』就是政府不去復興，農村自會復興；政府不去救濟，農民自會救濟。到那時，政府如果要再進一步為農民積極謀幸福，農民才會相信政府不是在那裏玩騙人的把戲。

本來政府有兩種職能：最基本，最原始，最初步的職能，是對內維持秩序，保障安

寧；對外抵抗侵略，保衛國土。必須這種職能履行以後，才能談到積極爲人民經營各種公共事業。若是全國紛亂，沒有寧日，外國進攻，不能抵抗，生命財產以及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絲毫保障，還有什麼能力去做旁的工作？

事有先後，物有本末，今政府不治其本而齊其末，不是出於無識，便是有意敷衍。老實說，我們根據過去政府召集許多會議的經驗，對於這次復興農村委員會並不存什麼希望。我們知道的，只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至六日，在南京鐵道部，根據各報記載，有過這麼一回事而已。

但是，汪院長好像很鄭重其事。他說，『希望我們所提議的和我們所決定的辦法，能一件一件的實行。從前爲許多事情，常常開會議，結果是往往只有許多議案不能見諸實行，本會必須要免掉那些毛病』。

『要免掉那些毛病』，其責任倒不在國民，而在政府。如果政府不是完全做『手勢』的話，請從統治階級本身做起：

『即日肅清貪官汚吏；廢除苛捐雜稅；及禁止預征錢糧，勒種鴉片，公賣鴉片，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剝削榨取；不要再從事內亂，使農民有安居樂業的機會』。

行有餘力，再說其他。

一九三三，五月，九日。

五月十日的主張

（這是五月十日在青年會的國恥紀念演講，經徐雉君筆記，申報只發表了一部份，事後有人來信要求將該稿在本刊（自由言論）完全登出，故發表於此。但現在大勢所趨，已非文中所提辦法所能挽救。）

我想現在人人心裏有一個急迫的問題，需要解答：就是，到底日本將來是否要繼續進攻？還是得了東三省及熱河，就算完事？你們記得，在『九一八』瀋陽失陷的時候，有一班苟且偸安眼光近視的人，以爲問題不至於擴大。後來北滿及錦州失了，這班苟且偸安眼光近視的人，又以爲日本得了東三省就算完事，不至於再擴大。後來山海關又失了，這班苟且偸安眼光近視的人，又以爲日本得了山海關，可以保障『滿洲僞國』的安全，就算完事，決不至於再擴大。但是後來熱河又失了，這班苟且偸安眼光近視的人，又以爲日本得了熱河，完成『滿洲僞國』的自然地勢之後，斷不至於再擴大，更不至於

擴大到長城以內。但是後來察哈爾大半已經失了，灤東也已經失了，這班苟且偸安眼光近視的人，又在那裏作夢，以爲日本萬不至於渡過灤河，進攻平津。看罷，看你們這班利令智昏的人們，誤盡天下蒼生，將來如何了事！

我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就不敢做夢，更不願把頭埋在沙裏，當作沒有看見危險，如鴕鳥一樣。我認定日本必繼續不斷的進攻，理由有三：(一)地勢的連接。日本得了東三省及熱河，必向西南進展，如美國以前向西發展的運動一樣，非橫貫全洲至太平洋岸不止，日本將來也非席捲我全國不可。這是田中的政策，也是自然的趨勢，在日本人看來，遲早總要實行的。(二)保障已得土地的安全，日本必以攻爲守。得了東北必侵略華北，以華北爲緩衝地帶；得了華北，又必侵略長江流域，以長江流域爲緩衝地帶；得了長江流域，又必侵略華南；等到亡了我全國以後，日本才會心滿意足，高枕無憂。(三)世界大戰雖不會馬上發生，但將來總難倖免。日本知道她自己是遠東的罪魁，更不能不積極準備；本國既然是地小物貧，便不能不把中國來做她窮兵黷武的根據地。

日本這種繼續不斷的侵略政策，會不會成功呢？須看三方面的情形：(一)要看國際方面會不會積極干涉日本的行動。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英美各國忙於整理內部；自德國希特勒上台以後，歐洲空氣異常緊張；並且各國人民離歐戰不久，大家不願再馬上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至於蘇俄，一來因爲國基未固，二來因爲五年計畫沒有完成，不但不能「扶助弱小民族」，近來反而與我們的仇人妥協，蔑視我國主權，出賣中東鐵路。故在目前這樣的國際形勢看來，國際方面是不會積極干涉日本的行動的，日本大可以繼續進攻，可以繼續進攻而無恐。(二)要看日本內部會不會發生內訌或革命。如果發生內訌或革命，便可牽制日本的侵略行爲，在苟且偸安奴隸成性的中國人看來，未嘗不是一件日夜所祈禱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對華政策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之下，日本一般國民歡欣鼓舞慶祝之不暇，那裏會有什麼革命發生。只有遇到中國有力的抵抗，軍事上不得手，戰事範圍日益擴大，人民負担日益加重，人民才會由不滿與失望轉向到革命之一途，如歐戰中的德國一樣。假使當日的法國是現在的中國，一味不抵

抗，那麼德帝國不但不會發生革命，並且基礎會更加鞏固。(三)要看中國抵抗不抵抗。我們大家知道，政府不抵抗是一個公開的祕密；就是有抵抗，也是局部抵抗，出於地方軍事長官的愛國熱誠，並不是中央預定的政策。但是，中國愈不抵抗，日本愈要進攻；日本愈是進攻，中國愈不抵抗；於是一年半載，馬馬虎虎便斷送了半邊天下。反之，如果自始拚命抵抗，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這樣順利的，也不至於如此急進的。日本繼續急進的侵略政策，正是因爲我們中國繼續急退的不抵抗政策所促成的。

但是政府到現在還不承認不抵抗是牠的政策。譬如前不多久，行政院長汪精衛先生爲着和戰問題，特別發了一個很長的電報加以解釋，並且做了三股文章的註腳，說『因爲不能戰所以抵抗（一股），因爲不能和所以交涉（二股），是以抵抗與交涉並行（三股）』。但是我們要問，所謂戰是不是軍力的衝突？如果用軍力去抵抗，是不是戰？難道上海十九路軍的抵抗，不是戰嗎？宋哲元軍在喜峯口的抵抗，不是戰嗎？徐庭瑤軍在古北口的抵抗，不是戰嗎？如果汪先生所謂抵抗，不是武力的抵抗，乃是不敢應戰的抵

抗，那麼這與張學良先生的不抵抗主義有何分別？至於『因爲不能和所以交涉』，我們更不懂爲什麼明知不能和，而要與日本交涉？交涉是不是希望和？政府這種『兩面政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結果，不但政府三心兩意，拿不住方針，沒有計劃；就是我們小百姓，也不知所從。汪先生是很會做八股文章的，可惜這次只做了三股；現在我替他再加上三股，『因爲不願戰所以不抵抗（一股），因爲要和所以交涉（二股），是以不抵抗與交涉並行（三股）』。這後三股或者比前三股近於事實，我想大家都承認罷。

說到此地，或有人要問我的辦法又是怎樣。『九一八』事變一經發生，我卽做了一本小册子，名爲救亡兩大政策，（一）主張對日作自衛的戰爭，也就是眞正的抵抗；（二）主張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組織國防政府。經過二十個月的功夫，到現在我的思想一點也沒有改變，並且經事實的證明，我對於這兩個主張，更深信不疑。

爲什麼我主張戰，主張作自衛的戰，理由大概諸位都聽見或看見過了，用不着再去詳細解說。我今天只能提綱挈領的列舉出來。（一）惟有作自衛的戰爭，才能促成內部

的統一，全國一致。(二)惟有作自衞的戰爭，才能擴大局面，引起國際的干涉，制止日本的暴行。(三)惟有作自衞的戰爭，才能給敵人以重創，促成日本內部的革命。(四)惟有作自衞的戰爭，才能保存民族與國家的人格，免豆剖瓜分的大禍，爲將來復興的基礎。(五)除了作自衞的戰爭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只有賣國。請問主和的人怎樣和法？是不是願意簽字斷送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如不願意斷送，日本會不會與我們和？如願意斷送，是不是賣國？再請問主張交涉的人，事到如今，除了承認斷送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等地以外，有沒有交涉的餘地？如果承認斷送，是不是賣國？賣國是不是要給他方以口實，引起內亂？請問主張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人，能否擔保斷送國土之後，不發生內戰？內戰是否能夠生聚教訓？不能生聚教訓，只知內戰，是否比對日作自衞的戰爭要壞到無數倍？最後請問主張拖的人，日本不讓我們拖，我們如何拖得過去？我們因爲拖而不抗，以至二十個月中，失了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及長城以內各地。我們是不是還要這樣拖下去？拖到平津？拖到山東河南？拖到長江？拖到華南？拖完了全個中國完

事？如果主張和，主張交涉，主張拖而不抵抗的人，不能答覆這些問題，那麼顯然我們的出路，只有戰，只有作自衛的戰——也就是眞正的抵抗。

如果眞要抵抗，眞要作自衛的戰爭，那麼當然第一要全國一致，精神團結。請問在一黨專政之下，可以做得到嗎？國旣黨的國家，而非全國人民的國家，人民對於國事旣無權過問，甚至於還要受壓迫，請問如何團結？如何一致？又如果眞要抵抗，眞要作自衛的戰爭，第二當然要人民起來，養成深厚的民衆力量。請問在一黨專政之下，民權沒有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都不自由，人民如何可以起來？如何可以表現民氣？如何可以把已死的人心鼓動？把一盤散沙的人民組織？再如果眞要抵抗，眞要作自衛的戰爭，第三當然要集中全國人才，同心協力，共赴國難。請問在一黨專政之下，政權由一黨包辦，黨外的人，不但不能參加，並且不願意參加，全國人才又如何能夠集中？不但不能集中，並且因為壓迫與反壓迫的關係，彼此鈎心鬥角，所有心血都用在對內，結果只有大家同歸於盡。最後，如果眞要抵抗，眞要作自衛的戰爭，現在這種散漫不負責任的政

府制度，也非改變不可；換句話說，非組織抗日的國防政府不可。這種抗日政權的組織，第一須建築在全民的基礎上面，應該急速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公平的選舉制度，召集國民大會，接受政權，產生政府，制定憲法；第二這種抗日政府的組織，應該放棄五院制度，而採取簡單，明瞭，集中，有力，負責的原則；如英國歐戰時的戰時內閣一樣。

上面這些主張，我從『九一八』以來不斷的向政府及全國國民大聲疾呼，但是到現在一點也沒有實現。近來我看見政府與共產黨在江西相持不下，同時看見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勸共黨一致來歸的文章，及共黨首領毛澤東朱德願意一致抗日的宣言，使我覺得有提出一個新的主張的必要。

這個新的主張，就是國共須爲有條件的妥協。爲什麼要妥協？（一）我認爲如果眞正抗日，非得停止內亂不可。現在我們的大砲飛機，不用去打日本，而用去打共產黨；我們卅多萬的好軍隊，不在前線抗日，而在江西剿共。長此下去，鷸蚌相爭，漁人得

利，只有讓日本來一塊一塊割去。這樣，三民主義可以實現嗎？共產主義可以實現嗎？還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可以實現？(二)我認爲共黨不是普通的土匪，乃是有組織，有主張的政黨，並且是政治腐敗與專制的反應，不是剿殺所能了事。『九一八』以前勦了許久，沒有勦滅；『九一八』以後，也圍勦了幾次，也沒有成功。大砲飛機及三十多萬軍隊，不但不能消滅共黨的勢力，並且共黨的勢力日益在那裏蔓延。這種事實，就是沒有抗日的前提，也應該可以使我們覺悟，改變策略。何況有抗日的前題擺在我們的目前呢！

若是妥協，請問又有什麼條件？我認爲在共產黨方面：(一)應該停止階級鬥爭，階級革命的政策。須知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打倒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及其工具的問題，全國民衆，無論那個階級，都是同受壓迫搾取，應該聯合戰線，不應該分裂革命的勢力。(二)應該交出紅軍，改成爲國家的軍隊，民衆的武力。在國民政府方面，也應履行下列兩個條件：(一)實行民主政治，讓共產黨及其他各黨派公開的和平的作參政活動，大家捐棄過去一切仇恨，共赴國難，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二)令全國各軍人交出據爲私

有的軍隊，與紅軍一律改爲國軍，開赴前方抗日。

總而言之，我的主張是：(一)對日眞正抵抗，眞正作自衞的戰爭。(二)取消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消極方面保障人民各種基本權利，積極方面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公平的選舉制度，召集國民大會，接收政權，制定憲法。(三)組織抗日的國防政府，停止黨爭，一致全體總動員。(四)與共產黨有條件的妥協，共黨方面，放棄階級鬥爭政策，交出紅軍；國黨方面，應該公開政權於全國人民，並令各軍人交出軍權，一律改成國軍抗日。

如果政府還不覺悟，人民還不醒，長此糊塗下去，我敢預言：日本必繼續進攻，全國必繼續瓦解，內部必發生極大紛亂，帝國主義必乘機瓜分宰割，我們四萬萬同胞大家快預備做奴才。

一九三三，五月，二十一日。

學生的出路

一

雖然教育制度，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早就改變了——由私塾變成學校，由四書五經變成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但是舊教育制度的遺毒，還沒有根本消滅。我們從前的教育，目的完全爲做官：子弟讀書的志願在此，父兄鄉長的希望在此，政府科舉取士的辦法也在此。凡是讀書的都是預備做官的；做不了官，才去教書。所以從前讀書人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是考中科舉之後做官；第二是考不中，或考中了而沒有官做，便去教書。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若要讀書人去種田，經商，或做工，他認爲這是下賤的事業，等於女人失節，寧願餓死不願幹。

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對於這種讀書爲做官的心理，還沒有打破，尤以在內地爲甚。由小學以至於大學，都是如此。他們以爲小學畢業，便是以前的秀才；中學畢業，

便是以前的舉人；大學畢業，便是以前的進士；若是到外國留過學，便是以前的進士翰林之類；得了博士，便自以爲是洋狀元了。社會之所公認，鄉長之所期望，父兄之所指靠，自己之所志願，都是做官。所以許多留學生回國，好像華僑在美國一樣，只有兩條出路，不是洗衣，便是開飯店；留學生回來，不是做官，便是當教員。做官是本來的目的，若是因爲沒有親戚朋友的援引，而做官不成，那麽只有像以前的讀書人去教私塾一樣，去大學教書。當教員是不得已的退步辦法，猶之以前的讀書人當私塾老師一樣的退步辦法。若是官運亨通，於是馬上脫離教書生活，去做官發財，以實現原來的志願。學校不過是一個旅館，官場才是歸宿之處！

但是留學生回來的數目，一天一天加多，做官的機會究竟有限，僧多米少，供多於求，於是不得不明爭暗奪，奔走於權勢之門，勞苦於風塵之路，老死而不知休止。一班軍閥爲佈植自己的勢力起見，運籌帷帳者不能不有人，辦理外交者不能不有人，起草電文者不能不有人，借款買械者不能不有人，中外宣傳者不能不有人，搖旗吶喊者不能不

有人，敷衍門面者不能不有人，現在看見留學生樂爲工具，自然高興收納，予以做官的名義，給以發財的機會，如養犬馬一般，以供驅策。所以現在每個軍閥之下，都有大批的智識階級分子。民國初年的時候是留日學生行時，現在是留歐美學生行時。

其次，國內大學畢業的，因爲沒有出洋鍍金，資格抵不過留學生，但是做官的志願是一樣的迫切。有些因爲背景雄厚，可以做大官，發大財；如果做不到大官，退而做小政客，小官僚，也是心甘情願。若是做官不到，他們的退步，也是教書，縱不能當大學教授，也應當中學教員。並且因爲每年大學畢業人數很多的關係，在中央政府或關係全國政治的軍閥底下，不能找到位置，於是退而到內地各省去運動做官。其在本省內的地位，猶之留學生在全國的地位一樣。留學生留過歐美日本，大學生留過上海南京北平。

又其次便是中學畢業生，若不能升學預備做大官，那麼只好去做本省的小官，或本縣的大官；再不然，退而當小學教員。其所以在省政府內不能當大官，乃因資格不如大學畢業生；其所以可以橫行本縣，乃是因爲本縣的留學生或大學畢業生都不願在縣裏做

事。若是在縣裏做官不到，又找不到教書位置，那麽唯一辦法，就是做一個爛紳士，穿着長衫，奔走衙門，榨取平民。

在讀書階級的最底層，當然是小學畢業生，若不能升學預備做高官，便在本縣各鄉村做紳士，或當國民學校教員。

由上看來，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在表面上雖然與以前的教育制度完全不同，但是在精神上還沒有完全改變。讀書的目的是爲做官，做官不到便去教書。歸納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下列一個系統：

(一)留學生做官活動的主要範圍在全國；做官不到，便去大學教書。

(二)大學畢業生做官活動的主要範圍在本省；做官不到，便去中學教書。

(三)中學畢業生做官活動的主要範圍在本縣；做官不到，便去小學教書。

(四)小學畢業生做官活動的主要範圍在本鄉村；做官不到，便去國民學校教書。

但是學校一天一天加多，學生的人數也一天一天加多，由小學以至於留學生，每年

出來在社會上找事的不知多少，大家都想做官發財，而官位又沒有那麼許多，於是大家不能不去鑽營奔走，傾軋陰謀，幹許多寡廉鮮恥的事情出來。在現在軍閥政治之下，一切官吏都要從軍閥手中出來，自然不能不去奉承軍閥的鼻息，做他們的走狗。其己身的利益，於是與軍閥的利益，不可分離。自己所捧的軍閥一旦得勢，則彈冠相慶，升官發財。自己所捧的軍閥一旦失勢，則亡命逃走，或賣身他人。其行為與娼妓無異，只要有誰給他官做，他便捧誰。以前做官，進退之間，還有舊倫理為之範圍，講究氣節；現在一切道德觀念都打破了，於是翻雲覆雨，暮四朝三，無所不為。

二

我並不是說所有的學生都有這種讀書做官的心理，但是據我觀察，全國學生出來多數有這種心理。

我並不是絕對反對學生做官；其實為國家服務去做官，為做事去做官，為實現主張去做官，我不但不反對，而且絕對贊成。我所反對的，乃是普通一般為做官而做官的心

理。

我並不是看輕教書事業；其實教書在目前還是比較清高的事業，神聖的責任。我所反對的，乃是把教書當做求官不到的退步辦法。（現在也有一部分人，寧願教書，不願做官，這是要聲明的。）

我並不是把這種做官心理，完全歸罪於學生身上，其實青年總是心地最純潔的。這是一方面由於過去社會的遺傳，一方面由於現在社會的無出路。

但是我不能不希望畢業的學生打破這種心理，因爲惟有打破這種心理，才能保持自己純潔的人格，爲自己所抱的理想奮鬥，不至於做軍閥官僚的瓜牙，去壓迫民衆。

至於學生眞正的出路，在今日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政客互相勾結以壓迫我全個民族的時候，當然非常困難。現在全個民族都弄到沒有出路，個人既不能離開羣體生活，又那能獨自有正大的出路？這就大處而言，我們應該認識清楚，並且共同努力奮鬥去求解決的。

怎樣去求全個民族的出路，問題很大，姑置不論；我們就小處而言，零零碎碎的方法，對於個人或者不是完全沒有幫助。

在學生方面，應該抱定下列幾種方針：

(一)須用其所學。學實科的，應該跑到工業界去；學商業的，應該跑到商店，公司，銀行裏去；不要像蒼蠅一般，飛集在一塊臭肉上，爭嘗『官』味。

(二)須不計較位置與薪資。凡屬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業，不論大小，都應該努力去做。現在有些大學畢業生，寧願不做事，不願做小事；以為做了小事，有喪體面，這是不合理的虛榮心，應該除去的。

(三)須散布到鄉間去。城市生活繁華，物質享受，比較優美，一般智識階級都願擠在一處搶飯吃，以致城中人浮於事，找事困難，文化亦是畸形發展；鄉村缺乏人才，各種事業辦不起來，文化也自然落後。

(四)須繼續研究學問。學問原無止境，畢業不過告一段落，須繼續研究，才能增長

智識，應付環境。現在有許多學生，得了一張畢業文憑，便認爲志得意滿，只知奔競應酬，不去再事研究，漸受社會淘汰，變爲一無所能的廢物。

在學校方面，對於畢業學生應該繼續指導，不應把他們送出校門就算完事。好不容易造就一個人才，若不設法使各得其用，那麽教育對於國家社會又有什麽用處？我認爲各校應有職業指導與介紹機關的設立，對於未畢業學生選擇職業，應該加以指導，對於畢業生的職業，應該調查全國各方面情形，聯絡各種公私立機關，與在社會上服務的校友合作，盡力爲學生謀相當的機會，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有時候人要找相當的事固然很困難；但是有時候事要找相當的人，也不容易。如果各學校有這種機關的設立，我相信對於學生個人及全個社會都有貢獻。

本來介紹職業，保障人民生活，是近代國家一種重要的職務，但是這不足以語今日腐敗的中國。現在政府認爲人才過剩，教育部於是來限制文法科學生的數目。其實以中國之大，學生人數之少，如政治上軌道，人才只有不夠，那裏會有過剩？若政府照這樣

的情形做下去，只知包辦政權，貪汚搾取，植黨營私，不但文法科學生沒有出路，實科商科學生也無出路，全個民族又何嘗有出路。所以在我們人民方面，爲國家爲個人應該努力解决整個的政治問題；在政府方面，目前最低限度應該馬上實行文官制度，以公開公平的考試方法，去錄用畢業學生。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

汎論愛國的功罪

一

現代國家生活裏面，有一極顯著的情緒，深入人們的心坎，有絕大的魔力。按其表現，有時如風雨驟至，萬馬奔騰；有時如銜枚疾走，寂然無聲；有時如草木爭榮，春風滿面；有時如秋氣蕭瑟，愁雲不展。牠可以使人們慷慨激昂；牠可以使人們歡欣鼓舞；牠可以使人們憂戚悲傷；牠可以使人們痛哭流淚。牠究竟是什麼？牠就是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愛國心。

愛國心的意思，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忠愛國家，雖有犧牲，在所不惜。人們爲什麼要愛國？其動機實在是複雜萬狀，隨人不同，甚至於不可分析。好比愛女人：有人爲的是秋波如電；有人爲的是口如櫻桃；有人爲着面龐；有人爲着腰身；有人爲着言語；有

人爲着姿勢；各愛其所愛。其發生愛情的原因雖然不同，而其成爲愛情則一。人們的愛國，也是一樣複雜：有時因爲祖國的青山綠水；有時因爲祖國的家鄉情侶；有時因爲祖國的過去光榮；有時因爲祖國的無限將來。愛國的原因，雖然千變萬殊，而結果成爲愛國心則無二致。

『父母愛子，無所不至。』兒女的凍餓，有如自己的凍餓。兒女的榮辱，有如自己的榮辱。人民的愛國心，若是發達以後，也是如此一往情深。國家的事情，有如自己的事情；國家的成敗，有如自己的成敗。若是本國受了侮辱，則氣憤塡胸；若是本國佔了優勝，則趾高氣揚；若是本國四分五裂，弱小無能，則憂慮悲傷，不能自禁；若是本國富強偉大，太平無事，則歡欣鼓舞，情不能已。

現在美國不是世界最富強的國家嗎？你看美國人們是多麼揚眉吐氣啊！挺着胸，直着腰，昂首闊步，談笑自若，好像心目中只有美國是最值得可愛的東西。你若遇見美國人，問他是什麼國籍，他一定顯出驕傲快樂的樣子，高聲回答說『我是美國人。』

你若看見中國，印度，高麗在外國的留學生，情形便是兩樣了。有一次一個美國朋友問我：『你們中國學生爲什麽一天到晚，態度這樣嚴重，很少說話，並且臉上時帶愁容？高麗印度的學生也大都如此。這莫不是東方民族的特性？』我聽見了這話，心中只是一陣一陣的痛楚，我沉重的回答說：『我們並不是不會快樂，但是消息一陣一陣傳來，總不外是祖國的破碎，同胞的痛苦，叫我們從何快樂起來。』

這種愛國心是人所共感的。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牠的色彩更加濃厚。一班人民被牠鼓動起來之後，什麽都可犧牲，並且出於心甘情願。漢京斯教授(Hankins)說得好：『愛國心與民族觀念一樣，是不容易解釋的。牠是表示對本國的忠誠，包括服務國家，捍衛國家的義務。牠是普通一般人都能感到的一種感情；在國家危急的時候，牠馬上可以叫我犧牲。其動人之深，沒有別種情緒可以與牠比擬。牠若鼓動起來以後，其支配人的行爲，較其他任何社會力量更爲完備。牠可以把普通一班人們從日常工作裏面提高起來，使他們發生最高尙的犧牲精神；牠可以使懶惰的人，緊張起來，使剛愎的人，

服從命令；使吝嗇的人，慷慨解囊；使胆怯的人，有勇氣；使卑賤的人，有氣慨；使狡黠的人，也不能不愛國。遇到了這種愛國熱誠，各種宿仇積怨都忘記了；各種政黨及階級的爭鬥都淹歿了；各種信仰，地位及種族的界限都消滅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只有領袖們可以說話，當局的人，要我們如何犧牲，我們只有心甘情願的獻身在國家的祭壇上面。』（註一）

二

的確，愛國心是一種感情，並且是出乎人類本性的一種感情。但是這種感情，比較其他情緒高尚一等，因爲牠根本上是爲他利他的，不是自私自利的。一個人愛國並沒有想到於自己有什麽好處；若因爲自己有好處而愛國，便不是眞愛國了。你去問馬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爲什麽要歷盡危險困苦去愛意大利？你去問將亞克爲什麽以一個農家少女，要起來驅逐英軍，爲法國葬身火燄之中？你去問葛蘇士爲什麽要顚沛流連去運動匈牙利獨立？你去問納爾遜爲什麽要奮不顧身，爲英國死於杜拉花加之戰（Battle of

Trafagar）？你去問林肯爲什麼要任勞任怨去維持美國統一？你去問甘地爲什麼要投身囹圄，去反抗英國統治，以求印度獨立？我想這些古今男女志士，必定同聲回答你說：『我因爲我愛我的祖國故，不得不如此。』

所以愛國心是一種眞情的流露，比你愛你的情人還更是無條件的。你愛你的情人，有時還因爲她長得好看。你愛國便不管本國是強，是弱，是富，是貧，是大，是小，是新，是舊；也不管本國的制度，思想，文學，藝術，科學，風俗是什麼樣子；更不管本國在過去有否光榮的歷史，在將來有否偉大的前途。富強如現在的美國，固有人愛；亡國如現在的高麗印度也有人愛，恐怕愛得更利害！

我們可以大胆的說，愛國心實在有牠不可磨滅的價值。牠可以團結全國人民的意志，抵抗外國的侵略，保持自己的統一。牠尤其是被壓迫國家求解放的利器，被壓迫民族求獨立的工具。弱小的國家由牠而強大。分裂的國家由牠而統一。亡了的國家，由牠而復興。無組織的民族，由牠而建國。我們可以懷疑牠別的地方，但不能懷疑牠在這方

面的功績。我們看歷史，意大利德意志之所以統一，法國之所以屢次危而復安，波蘭之所以復國，日本之所以強大，土耳其之所以崛起，與愛國心實在有分不開的關係。就是現在中國之所以有覺醒的趨勢，也未始不是這點熱心在裏面鼓動。

若是愛國心的價值，只在保存國家，一致對外上面，那麽還不夠我們一般人所給牠那樣的偉大價值。牠的偉大性，實在還是在無形中濾清及增進我們的公共生活。公共事業，有牠在裏面推動，可以積極的發展。政府機關，有牠在上面監督，可以養成廉潔的政治。反而言之，一個國家若無愛國心爲之基礎，則精神必至渙散：道路壞了沒人理；古蹟倒了沒人修；偉大的城市，讓牠毀滅，長久的歷史，讓牠忘去；做官吏的只知搜括地皮；做人民的只知自私自利；總而言之，國家的羣體生活必日趨於腐敗墮落而不自知！你不見希臘時的雅典及司巴達嗎？他們的公共生活極高尚極興盛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的愛國心最發達的時候。他們的社會最腐敗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的愛國心最消沉的時候。

不但國家的公共生活有賴愛國心爲之洗除汚穢，引向奮發有爲的高尙領域；就是個人生活有牠以後，也可得到無窮的『煙士披里薰(Inspiration)』。人生本來是無目的，無意義的。若是不假定一個高尙的目的做目的，那麽生活只覺得沒有意義，結果只有消極頹唐萎靡而不能自振。換過來說，若是一個人以愛國爲努力的方向，那麽他走向生命長途的時候，處處都覺得有趣味，步步都覺得有影響。愛國無窮盡，努力的前途也無窮盡。牠好比是山間的泉水，山間的泉水，可以繼續不斷的流成一條小河，小河可以不舍晝夜的奔向廣闊的原野，灌溉無數的田疇。愛國心也可以繼續不斷充實人生的意義，使一班人民永遠努力去發揚光大羣體的生活。

三

無論什麼思想，無論何種感情，都是有流弊的。愛國心當然不能例外。有時候一班人們因爲愛自己的國家，而恨別人的國家；爭本國的利益，而犧牲別國的利益。正如墨子所謂：『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這當然是不合理的。我們可以

引墨子一段極妙的議論爲證：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義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虧。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者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此可謂義與不義之辯乎？』。（註二）

不過墨子上面那種『攻異國以利其國』的批評，乃是愛國心的畸形發展的毛病，不

是愛國心的本身。愛國的人，不一定要恨別國；擁護本國的利益，不一定要損害別國的利益。根本說來，愛國心不應含有仇恨人家的意思。所以拉馬庭(Lamartine)說得好：『假愛國心包含民族相對間所有的仇恨，所有的偏見，所有的厭惡。眞愛國心包含一切的眞理，一切的德性，一切人民所共有的權利。我們固然可以愛自己的國高於一切，但同時我們的同情心，不應限於種族，語言，或國界』。(註三)

固然有許多人時常利用愛國心去做壞事。好比專制魔王要箝制言論出版，禁止集會結社，沒有別的理由，只有用愛國的名義，去痲醉人心，要人民犧牲這些自由。又好比野心家要利用國際戰爭，去鞏固政權或奪取地盤，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號召，只有激起國民的愛國熱情，去爲他們馳騁疆場。又好比資本家要掠取國外市場，保護個人利益，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得到本國人民及政府的援助，只有鼓動本國人民的愛國觀念。政客利用牠去競爭選舉，軍閥利用牠去擴張軍備，奸商利用牠去貪圖私利。羅蘭夫人臨上斷頭台的時候說：『自由！自由！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我們在這裏也可以大聲

疾呼曰：『愛國心！愛國心！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惡假汝名以行！』此又何獨自由與愛國心爲然，其他各種高尙理想，制度，及情感也莫不如是。

四

大概一個國家愈是民主，愛國心愈是發達。原因是在民主國家裏面，主權是在人民全體。所謂國家乃是全國人民的國家，你有份，我也有份。既然大家有份，那麼國家的休戚榮辱，便是我們大家的休戚榮辱。我們對於國家，又那能不愛護？好比一座花園，若是我們所共有，我們對於牠的一草一木，總不勝其愛惜，不忍加以摧殘。若是非我們所有，花園門口懸了一塊牌子，禁止我們入內遊玩，而僅爲一人或少數人所霸佔，那麼我們對於那個花園的盛衰存亡，當然是不關心的。這是人類本性，這是人類合理的本性。

所以在君主專制或獨裁政體之下，愛國心比較不能發達。在君主的國家，主權操在一人之手，人民不得干預，所謂國家，不過是皇帝的家產，所謂政府不過是皇帝的私

具，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既然沒有參加國事的機會，那麼對於國家的事情，當然以爲是皇帝老子家裏面的事情，與我們一班小民無干。外國侵略也好，內政腐敗也好，文化墮落也好，我們總不關心。中國人的愛國心所以不發達，也是吃了數千年君主專制的大虧！

君主專制如此，其他獨裁政體也是一樣。君主專制把國事統歸一人包辦，與人民無干。獨裁政體把國事統歸一人或少數人把持，與一般人民又有何干？國事既然與人民毫不相干，那裏能生出愛情？

愛國心不但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並且與教育的發達也成正比例。教育愈是普遍，愛國心愈是發達。一個人的愛國心不是生下來就有的。雖然愛國心是根據於人類的天性，如好羣等等，但是其所以採取此種愛國的特別方式，還是後天所啓發的。教育就是啓發愛國心最利害的一種工具。學校裏面所授的國文，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等，不是使學生明瞭本國過去的光榮歷史，就是指示學生本國將來的無限希望；不是說明國

家與個人關係的密切，就是解釋本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如是一班兒童與青年，由認識國家的面目，進而發生愛國的觀念。此所以近代的國家把教育事業收歸國有，也就是有見於教育的重要。

有些人說，戰爭可以激發人民的愛國心；沒有戰爭的刺激，愛國心便會消沉。這話實在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我們固然可以承認，戰爭發生的時候，也就是空氣緊張到極度的時候，人民的愛國熱潮，可以飛騰至於沸點，使人民犧牲一切。但是戰爭延長之後，這種熱度便要逐漸減退；及到戰爭結束之後，尤其是在戰敗的國家，愛國心必一蹶不振。戰爭好比雅片煙。抽鴉片煙固然可以暫時提起精神，但是不能持久，而且對於身體的健康很有妨礙。德國不是時常以戰爭的心理，去激發德國人的愛國心嗎？結果，窮兵黷武，歐戰一敗，至今國事還不能十分安定。美國不是比較和平的國家嗎？但是美國人的愛國，不減於德國人。一九一七年，美國一加入歐戰，其人民為國犧牲的精神，較之歐洲各國，並不見得有絲毫遜色。

所以愛國心的養成，並不需要戰爭的刺激方法。其實眞正持久的愛國心，要在和平時候表現出來。表現於藝術，表現於文學，表現於科學，表現於衛生，表現於工商業，表現於農事生活，表現於爲公服務的精神，表現於公共事業的改進，表現於社會道德的提高，表現於國家政治的熱誠參加，表現於平等博愛的共存共榮，這才是眞愛國心，這才是眞愛國心的表現！

五

愛國心與別的東西一樣，有牠的價値，也有牠的流弊。但是無論你歡喜不歡喜，牠是永久繼續存在的。牠的方式可以改變，牠的精神不會消滅。海士教授 Professor T. H. Hayes 說得好：

『從人類有歷史以來，愛國心的方式雖不盡同，但是人類之富有此種情緒，則爲彰明顯著的事實。牠是極有力的一種感情。老實說，牠實在是一種忠誠，是人類好羣好社會生活的一種特性。一般的人，無論在過去及將來，免不了要將忠誠寄託於身外的事物

或個人。愛國心，如兩性間的愛一樣，固然可發生流弊；但是牠是種族生活所必需的東西。牠可以啓發最純潔的感情，牠可以啓發最高尙的行爲』。（註四）

既然愛國心是一種不可磨滅的感情，那麽與其爲無益的阻止，不如去提倡眞正的愛國心。眞正的愛國心不是偏見，不是瘋癲，不是橫蠻無理，更不是夜郎自大。眞正的愛國心，必須謙虛。眞正愛國的人必須虛心下氣，辛辛苦苦，獻身於國家之前。或盡力於本國物質生活的建設，或盡力於本國精神生活的提高，務使本國成爲同胞共同生活的樂土。這種眞正的愛國者，一天到晚，忙個不了，那裏有閒功夫去仇恨別人，侮辱別人，或攻擊別人？打主意去侵略別國的人，不是眞的愛國者。猶之眞正愛校的學生，不願在賽球的時候，和別個學校打架一樣。

但是我們怎樣能夠洗淨附在愛國心身上的汚穢東西，我們怎樣能夠提倡眞正的愛國心，我們最後不能不說教育是一個極重要的工具了。我們要知道，國家上面還有人類，現在學校裏面所教的社會科學，便是拿全體人類做材料。歷史告訴我們人類過去的思想

行爲。經濟研究人類謀生的方法。政治探討管理公事的原理。心理解釋人類的動作與思想。其他如宗教，美術，科學都不限於國界。教員們不但應該啓發學生愛本國的思想，並且應該使學生對於全體人類，有普遍的同情。學校教育如此，社會教育如報紙，雜誌，書籍，電影也應如此。這種愛國心不但毫無害處，而且實在是我們的福音。

瓦笛生教授(Professor John Watson) 有一段話說得好，可以引來做一個結論。他說：

『我們的忠誠應該趨於高尙，使其應一面熱烈的愛本國，一面要以公道對待別國。我們所要做的事業太多，也用不着耗費我們的情感來仇視外國的國民。同時那班專愛人類，而漠視本國目前問題的人，我們也不能希望他們的生活，有什麼生氣。愛國與愛人類相提並行，才是眞正的理想。自私自利的愛國心，固然不對，空空洞洞的人道主義，忽略了本身最切近的責任，也是不對的』。(註五)

眞正的道德是：我愛國，我也愛人類。

（註一）H. E., History and Social Intellegence, P. 186（轉引）

（註二）墨子非攻上

（註三）F. J. Scott, The Menace of Nationalism in Education, P 79（轉引）

（註四）C. T. 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P. 254

（註五）John Watson, The State in Peace and War, P. 261.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改作。

異哉外交之轉變

近來，羅文幹出巡新疆，汪精衞自兼外長，劉崇傑去職，唐有壬繼任，蔣作賓返日的謠傳，黃郛行蹤的神秘，以至於中國銀行總理張公權之遊日，外次唐有壬對日使有吉之訪問，財長宋子文過日之十分重視，及日本報紙對南京忽然表示『善意』，蛛絲馬跡，隱然可尋。

於是一般國民惴惴然以爲外交政策將大變，唐有壬鑒於此也，且鄭重加以否認。其實，所謂外交政策將大變云者，乃反映我們以前有固定的外交政策也，不過到現在要大變而已。我們以前果眞有固定的外交政策耶？聯美乎？聯英美乎？聯俄乎？聯美俄乎？事實上我們看不見，成績上我們找不出。然則，我們以前固定的外交政策，其唯有倚賴國聯乎？以『倚賴』爲政策，這是什麼政策？

且卽此『倚賴』政策，我們也不能『倚賴』到底。過去事實所昭示，只要日本一

硬，我們便磕頭不已。上海停戰協定在前，唐沽停戰協定在後，都是我們無法倚賴國聯，直接向日本磕頭求饒的鐵證。

說者謂宋子文氏之遊歐美，乃聯歐美政策的實現；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與國聯技術合作，乃此種政策所付的定價。果有其事乎？抑無其事乎？如有其事，是亦不失爲政府一方針，堅持之，以覩後效可耳。

但卽此所謂聯歐美政策，不迨宋氏之回國，經日本一反對，已破壞得掃地無餘。最近外交人員的變更與行動，隱隱然欲與我們不共戴天之仇謀親善。其轉變之利害得失且緩論，而忽彼忽此，搖擺不定，果可謂有外交政策耶？抑無外交政策耶？如此朝三，如此暮四，事秦亦可，事楚亦可，謂之外交，謂之政策，其亦不可以已乎？

故吾謂現政府從無外交方針，有之只有朝三暮四，事秦事楚，無可無不可的外交，的政策。

何以故？現政府意志之不統一，內部之矛盾，不容許有一貫政策的運用。過去如

此，將來大概也不外如此。

二

姑讓我們假定當局決定親日，日其可親乎？解答此問題，只有求之於中日兩國間的利害關係，加上歷史上事實的證明。日本地勢上接近中國，必須向大陸發展，其對中國，不但有經濟的野心，並且有土地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不同在此，即英帝國主義也沒有她如是之猛烈。日本與中國之關係，猶狼之與羊耳。羊其可與狼親善乎？如其有親善，是亦逃不出羊被狼吃的故事而已矣。豈有他哉！豈有他哉！

羊被狼吃的故事，時代稍遠的有琉球，台灣，高麗；近的有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最近有『九一八』後東四省的被佔。這些羊們難道便忘記了嗎？日本每實行一次侵略，必口講一次『親善』，一九一五年如此，一九三三還是如此。侵略愈甚，『親善』愈密，吞噬愈急。然則，狼之與羊，所謂親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羊豈不該死也乎？

且日本現在所謂『親善』云者，不外左手持契，右手持槍，逼我在出賣東四省契約上畫押而已。當局諸公，如果欣然接受這種『親善』，則諸公有何面目見我國民？有何面目向國際說話？請問諸公曾否哭訴國聯及美國？請問諸公曾否賭咒發誓，對日本武力所造成之新事實不承認到底？今國聯所決議不承認者，而諸公承認之；美國所宣言不承認者，而諸公承認之；諸公自己以前起誓不承認者，而諸公現在承認之。失信棄義，出爾反爾，諸公縱不為我國民子子孫孫計，其不為自己的人格計？即不為自己的人格計，國聯美國及全世界又將謂我何？

或謂畫押表示『親善』之後，日本不致侵略。則上海停戰協定以後，有向華北之進攻；塘沽停戰協定以後，至今日兵尚未撤盡。狼子野心，得隴望蜀，日本把既得土地消化之後，又必鯨吞蠶食矣！回想當時東三省之不抵抗，何嘗非『親善』之表示？上海協定與塘沽協定，香檳交歡，握手成禮，更何嘗不是『親善』？然而結果如是，尚不覺悟，天下可痛哭之事，孰有甚於此者？

夫一國之外交政策，根據其本身之利益，必有一定之對象；猶之國防政策，必有假定之敵人。現在政府如果向不共戴天之仇人，三跪九叩，以求親善，則普天之下，有何敵人？如果『認賊作父』而爲外交，『作揖磕頭』而爲政策，此不但中外見所未見，抑古今聞所未聞也。

三

即欲『作揖磕頭』，『認賊作父』，猶不可得，並且後必有災。羊雖願意送給狼吃，但除狼之外，歐美尚有其他野獸如虎豹之類在。彼等豈願羊給狼完全吃光，而不爲自己留餘地乎？彼等雖爲『白人』，但非『白癡』，決不坐視；勢必起而干涉，或瓜分，或共管，或扶植另一勢力相對待。結果國際的矛盾衝突，必更趨劇烈；而國內政局的變化，也愈趨不可究測。羊之爲羊，誠『注定了的苦命』矣！

『親日政策』，並非『我未之行』，也非『先君未之行也』。特『我』行之未有效耳。濟南事件，其明證也。至於先君子行之者，有段公祺瑞在。在民八九之交，參戰借

款之時，段的想法，何異於今日的當局，但曾幾何時，『安福魚』之名，人皆掩鼻而過；南北由是而分裂，吳佩孚由是而起家，最後『馬廠起義，再造共和』之段公，亦不得不倒矣。誠以中日世仇，無親善餘地。抗日者為民友，不抗日及降日者為民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今日當局，如果與日親善，其自視與安福系為何如乎？佔領東三省，威制華北，較之二十一條以後的情形，利害不知若干萬分，民衆反日之情緒，亦不知利害若干萬分。今欲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請問辦得到乎？辦不到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局諸公若一失足，則政治生命，有若朝露，其勿以為人民終是阿斗也可。諸葛亮聰明人也，諸公自命為諸葛亮者，當不作此圖。

四

吾書至是，猶有不勝其感慨者。

今年，一九三三年，二十世紀第三十三年，中華民國之第二十二年也。但今日中國之外交，與歐洲中古世紀無異。土地的割壤，人民的斷送，財源的犧牲，有如私人間私

相授受，販賣猪羊，不但不須一般國民的允許，且被賣之國民也不能聞問也。我們所見者，只有販子之來來往往，紜紜擾擾耳。開價若干，還價若干，定價若干，回扣若干，何時簽字，何日交貨，都問不能問，聞不能聞者。嗚呼，二十世紀文明之外交，應如是乎？不應如是乎？

吾聞之，歐戰當中，美總統威爾遜提倡公開外交，國民外交，反對祕密外交，買賣外交，歐戰以後，各國外交，似乎向此方面進一步矣。我國自一九一九年反對簽字凡爾賽和約之後；民間也有這種熱烈的要求，北洋軍閥因此竟不敢再有膽大賣國的行爲。今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一錯全錯，在政府自應審愼周詳，在我們人民，更應起而要求外交公開，民意外交。

強國搶人土地人民財源，有如做賊，有時非保守祕密不可。至於被搶之國，是弱者，是苦主，應該將事實伸訴於本國人民及他國之前；即有交涉，也須國內的民氣，國外的輿論做後盾；除非賣國，有何祕密之可言。譬如二十一條，在日本自然要求我們堅

守祕密，在我們若不甘心簽字，出賣主權，豈有不公開之理？故我國民，如果不願被賣，非要求外交公開不可；我當局，如果不願出賣，也非公開外交不可。

所謂外交公開者，無他，即將政府主要的外交宗旨，及交涉進行程度，及其結果，隨時向機使國民了解耳。在民主國家，有人民代表所組織之議會，政府與人民彼此間傳達較易，了解較切，而人民監督也愈密。但今日之中國，不足以語此。

今日之中國雖不足以語此，但今日中國的外交，如不以民意爲後盾，以民氣爲武器，吾將徒見主權的出賣，而不見主權的收進也。我們今日與日本講外交，或角力，靠軍隊之力量，請問可乎不可？試回顧五四時代的外交與五卅時代的外交，其所以能稍爭到一點面子者，不憑民衆運動憑什麼？卽是上海十九路軍之抗日，與喜峯口宋哲元等之抗日，若沒有民衆做後盾，安得有這樣成績？故國民外交與公開外交，乃弱小國家的工具，今日我政府與人民不可忽視者也。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實行統制經濟的先決問題

一

統制經濟的潮流，充滿了全世界，原因有二：

第一是蘇俄社會主義經濟的影響。根據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論，決不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換言之，決不讓生產，分配，及消費完全操在私人手裏，漫無計畫與組織，陷於經濟的無政府主義。蘇俄第一個五年計畫，第二個五年計畫等等，乃是蘇俄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題中應有之義，絲毫不足爲怪。却是因爲蘇俄計畫經濟近年來有相當的成功，於是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

第二是資本主義經濟劣點的暴露。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織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生產工具據爲私有，各人根據自己的利益而活動，政府不應橫加干涉，自由競爭，適者生存。但是這種制度，因爲受了歐戰的創痛，及一九二九年以來經濟恐慌的襲擊，

漸呈崩潰的現象，於是不能不施行統制，以資救濟。

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的人，固然贊成統制經濟；就是反對社會主義，擁護現在社會經濟組織的人們，也不能不實行統制經濟，以延長資本家的運命，防止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乘虛而入。

因此，統制經濟不但蘇俄在那裏雷厲風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起而效尤。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英國國家內閣的經濟政策，德國國家社會黨的主張，日本政府對經濟事業的統制計畫，以至美國羅斯福總統上臺以後的所謂新政運動，都足以證明放任政策的時期已經過去，二十世紀的經濟勢力再不能受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支配了。於是大家嚷着統制經濟：紅的嚷着，白的也嚷着，於是統制經濟之聲滿天下。

紅白不分明的中國，感受這兩方面來的刺激，也跟着叫起來了，從行政院長汪精衛氏，財政部長宋子文氏，直到一般社會，只看見贊成，不看見反對。不才的我，對於這種原則，當然是擁護；所不同的，是對於實行，我沒有當局這麼樂觀，認爲必須把先決

問題解決。

二

實行統制經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廉潔的政治。政權是最危險的：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廉潔的政府，權力愈大，愈可替人民謀幸福。貪汚的政府，權力愈大，愈有搜括人民的機會。在一個不實行統制經濟的國家，政府的範圍有限，統治階級，大權在握，如果要榨取剝削，已經可以使人民不能安生；若是又從而增加牠的權力，擴大牠的範圍，豈不是爲虎添翼，將民膏民脂，整個奉送於牠的口中？

現在中國政治的貪汚，已經打破古今中外一切的紀錄；在制度上，沒有文官制度；在道德上，簡直寡廉鮮恥。官家所担任的公共事業，無一不腐敗，退化，徒爲貪官汚吏造發財的機會。鐵路如此，水利如此，其他也莫不如此。在這樣以分贓搾取爲能事的政治裏面，若還要牠來干涉，管理全國的經濟事業，人民的血汗豈不是更要被吸吮得乾乾淨淨，點滴不留，成爲骷髏嗎？蘇俄所以能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因爲統治階級廉

潔，不廉潔須處極刑。其他國家所以能行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因爲統治階級也比較廉潔，不廉潔也須處重刑。中國現在自己照照鏡子，有這樣的乾淨面目嗎？這是我顧慮的一點。

實行統制經濟的第二個先决條件是統一的國家。所謂統制經濟者，乃是政府將全國經濟事業，全盤計畫；全盤計畫之後，根據其巨大的權威，逐步施行是也。請問今日之中國，是否統一？如果事實上沒有統一，請問中央政府能否全盤計畫？卽使能在紙上全盤計畫，又請問中央政府能否逐步施行？以軍閥盤據分裂的國家，以號令不出都門的政府，來實行統制經濟，請問從何着手？今日廣東有廣東的經濟計畫，山西有山西的經濟計畫，環顧全國，很像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德意志，現在馬上要把全國經濟打成一片，豈非畫餅充飢？這又是我們顧慮的一點。

要實行統制經濟還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完善的政府組織。以國家的力量，來計畫，來開發，來管理全國的經濟事業，這事談何容易。一個私人組織的公司，來經營極

小範圍的工商業，如果組織不周密，還要鬧得亂七八糟，不堪收拾，何況以一國土地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事業這麼複雜，利害這麼參錯，若是要一個沒有系統，不負責任，重床疊架的政府，担任這種絕大的職務，結果恐怕只有爲善不足，爲惡有餘。

三

並且在實行統制經濟以前，還有一個根本問題要解決，就是所謂『統制』是誰來『統制』？所謂『經濟』是爲誰的『經濟』？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的國家固然要實行統制經濟，資本主義的國家也在採用統制經濟。然則，今日的當局所謂統制經濟，是走向社會主義？抑是走向資本主義？如果是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那麼是資本家的統制，資本家的經濟，其立場是從資本家的利益出發，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無涉。若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很發達，資本家很有勢力，能夠担當這個統制的責任，雖在道德上與理想上非我們所能贊成，但仍不失爲一條可通的道路。可慘的是中國民族資本，因爲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蹂躪，簡直

不成東西，抬不了頭，只能在外人鼻息之下，得點唾餘。若是要拿他們做背景，來統制全國的經濟，結果只有變成爲國際資本主義的統制的經濟。所謂國際技術合作者，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如果要爲大多數民衆謀幸福，必須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換言之，生產工具，不但須由國家計畫，並且須由公共所有；不是從少數的利益着想，乃是從大衆的利益出發；不是消極的避免資本主義的崩潰，乃是積極的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

並且，在中國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還有一個顚撲不破的理由：就是如果我們想要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及解除牠所加給我們的壓迫，決不是幼稚孱弱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所能辦到，必須建築在大衆利益的基礎上面，取得大衆的擁護，才能發生力量。這是事實的問題，鐵一般的事實問題。現在我們的民族資本，大體上不出於買辦，便出於軍閥官僚，兩者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的玩具；以之維持國內秩序還不夠資格，那裏有力量去打倒他們的主人，宣告獨立。所以中國經濟的出路，固然非實

行統制經濟不可，但是不以大衆的利益爲前提，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也不能成功。

不過實行社會主義，政治的組織，還是個人獨裁呢？一黨獨裁呢？抑是民主政治？這就是誰來『統制』的問題。在蘇俄，大體可以說，經濟是爲大多數民衆的經濟，但是『統制』是由少數共產黨來『統制』；換言之，民有民享做到了，民治是沒有做到的。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在蘇俄比較在別的國家，是有相當保證；不過主人不是他們自己，而是共產黨。當然，這比資本主義的社會合理得多；却是在理想上我們還不能舉手贊成。我們固然要社會主義的經濟，我們還要民主的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固然要根據大衆利益來施行的統制經濟，我們還要我們人民自己來參加施行的統制經濟；總而言之，我們不但要求民有民享，我們還要求民治。

並且在今日之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封建軍閥的盤據，中國革命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階級問題。想要根據一個單純的階級，來担負這麼一個極艱難的革命使命，結果恐怕失掉其他被壓迫階級的援助，失敗的機會多，成功的機會少。我們認爲，中國

革命主要的對象，還是帝國主義與軍閥；那麼要推翻他們的統治，非根據民主的方式，聯合國內一切被壓迫階級，來集成一個偉大革命的力量不可。革命之後，也非根據民主的方式，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施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來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不可。中國個人獨裁固然不會成功，一黨獨裁或一階級獨裁也不免於失敗。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

恢復民族的自信力

一

一個個人，如果倒了志，失掉自信力，自己看不起自己，覺得前途絕對沒有希望，必定自暴自棄，萎靡不振。結果不是傾家蕩產，自殺了事；便是消極憂傷，糊塗偷生。反之立志向上，自尊自重，認爲前途不可限量的人，他的人生觀必定是積極的，他的精神必定是奮發的，他的目的必定是高尙的，他的計畫必定是遠大的，他的行爲必定是有意義的。遇到困難，他可以打開；遇到挫折，他可以忍受；遇到了失敗，他可以再起。結果最後他大概是一個成功的人。

一個民族也復如此。請看長久的人類歷史，那個國家不經過強弱？那個民族沒有過盛衰？但是有些國家可以轉弱爲強，有些民族可以轉衰爲盛，當然也有些國家或民族，終至於受淘汰。這其中，人家『雖曰天命，』我說『豈非人事哉！』所謂人事，即是要看

該民族是否奮發有爲，百折不撓的力求上進；換言之，也就是要看該民族有否自信力。有了自信力，亡可以復興，弱可以轉強，衰可以轉盛；否則，只有開始於萎靡，淪落於奴隸，終至於消滅。

舉近的事實來說，歐戰後的德國與土耳其，割地賠款，受盡協約各國的虐待；但德土兩國人民，並不以此自沮，反而力圖自救。果然，德國不出十年，恢復了在歐洲政治的地位（一九二六年，加入國聯爲常任理事，卽爲例證）；土耳其不久發生了革命，推翻了君士坦丁政府，趕走了希臘軍隊，嚇住了英法兩國，撕碎了塞佛爾條約，逼成了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所議定的洛桑條約。蘇俄呢，以新興奇特的政權，受協約各國數年的圍攻，終至立於穩固的地位，實行了偉大的經濟計畫。凡此種種，沒有自信力，那裏能夠做到？若要舉稍遠的例，則十九世紀裏面：在西方有德意志與意大利的統一，在東方則有日本的維新自強。

反之，現在淪於危亡的慘境，都是自信力薄弱或消滅的種族或民族。非洲的黑人，

美洲的紅人，東方的緬甸人，高麗人，及今日的中國人，擺在眼前。

二

那些地方，可以證明我們失掉了自信力？

有自信力的國族，不至於被日本左打一個耳光，右打一個耳光，兩年之中喪失了四省又半的土地（遼吉黑熱及冀之半），而長期的不抵抗。

有自信力的民族，不至於被最少數人隨便壓迫，宰割，當賣，而不起來反抗，打碎手上的銬與足上的鐐，以圖自救。

有自信力的民族，不至於遇見洋人，誠惶誠恐，若祖，若父，若閻王，若神仙，而甘心脅肩諂笑，做子，做孫，做奴才，做婢妾。

有自信力的民族，不至於在這嚴重的局面底下，產生下列各色人等：

賣國求榮的軍閥，官僚，政客；

販賣日貨，只知取利的奸商，買辦，及資本家；

三緘其口，飯碗是圖的大學教授；
歌功頌德，或專談風月的文人學士；
跳舞嫻熟，電影成迷，不思不動的青年學生；
昏昏沉沉，糊糊塗塗，隨隨便便，馬馬虎虎的大多數民衆。

在這生死關頭，我們看不見前淸末年殺身成仁的烈士，我們也看不見五四，五卅的偉大羣衆運動；我們見只見鼠竊狗偸的行爲，盡情享樂的風氣，對國事最多不過是嘆一口氣表示灰心的『正人君子』。

這樣，於是全個民族像敗家子弟，自暴自棄，把列祖列宗所遺下的產業，或當，或押，或送，或賣，而惟嫖，賭，逍遙，抽大烟之是務，絲毫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結果只有落得個家破身亡！

三

我們原來是這樣沒氣骨的民族嗎？

不，我們在中西接觸以前，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是最強烈的——強烈到頑固，愚昧，不可理喻的程度。一七九三年乾隆皇帝要馬加特尼帶與英吉利國王的那兩個勅諭，便可代表這種心理。

第一個勅諭，說『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庭，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辭意肫懇，具見國王恭順之誠，深爲嘉許』。這樣『嘉許』了英皇『傾心向化』一番之後，對於英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人，居住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因爲『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更無需爾國製辦物件』。『若云仰慕天朝，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學習，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貢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當善體朕想，益勵誠款，永久恭順，以保乂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第二個勅諭，更加好像父親教兒子一樣，一點不客氣，對於英國要求『將來或到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駐泊交易』，及減稅，傳教等事，乾隆皇帝逐條『……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未免使爾國夷商往返徒勞，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懍遵毋忽，特此再諭。』

這是多麼威風的勅諭，這表現了多麼自信，自重，自尊，甚至於自大的心理！鴉片戰爭以前，我國上下都是如此，不獨乾隆皇帝爲然。那時候，我們要外國人向我們磕頭，那裏夢想到今日我們要向外國人磕頭。但是後來從鴉片戰爭起，直到中日戰爭止，因爲屢次對外戰爭失敗的結果，這種民族自信力慢慢的搖動起來。雖有義和團一度的反射作用，然而牠的失敗，更使我們鄙棄自己，怕了洋人。從此以後，中國人對於外國人的心理，剛與乾隆皇帝時代相反。以前是我們看不起人家，現在是人家看不起我們，我

們也看不起自己。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希圖自強，表現了民族自信力的復活，但經過袁世凱的威迫利誘，北洋軍閥的摧殘蹂躪，又趨於消沉。到了五四運動，受了歐戰以後世界潮流的震盪，民族好像有了生機。接着便有五卅運動，及一九二六年的革命運動。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空氣，彌漫全國。那時候，民族精神多麼活躍，勇敢，樂觀！

可惜這個蓬蓬勃勃的現象，因爲現政治的壓迫，不久便烟消雲散了。到如今，整日夜，你只看見下列兩種人物。（下引梁任公詞）

『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頹廈，黃金慕夜，侯門路賒，青燈帖括，廉船鬢華，望天兒更打幾個糊塗卦。』

『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便找定他的飯碗根牙；官房繙譯大名家，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口啣雪茄，見鬼唱喏，對人魔牙，笑駡來則索性由他駡。』

四

『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這樣下去，我們不待人家之亡我，我已自己承認亡了。

因此，我認爲今日要打倒帝國主義，抵抗日本侵略，除了物質上的準備以外，須有精神上的振作。換言之，就是要恢復我們的民族自信力。

第一我們須認淸自己是人，須有人格，對於一切的橫暴，無論是外來的，或是內在的，須起來反抗，猛烈的反抗。

第二，我們須認淸自己的力量。現在全個民族受壓迫，受榨取，都感到最苦痛的經驗，都含着憤恨的情緒，如果大衆能夠組織起來，前途是樂觀的，光明的。

第三，我們須認淸，民族的內外敵人的壁壘裏面，包含了各種不可解决的矛盾，他們都是紙老虎，一經鑿破，不値半文。我們用不着畏縮不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推翻是不成問題的。

我們固然不應該頑固的自信，如義和團的輕舉妄動；但是我們更不應像現在這樣的

自暴自棄。我們固然應有物資上的國防，但是我們更應有精神上的國防。

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路線，只有兩條：民族的滅亡，與民族的反抗。惟有全民族的反抗。才能免於全民族的消亡。惟有民族自信力的恢復，才能鼓舞全民族的反抗。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假使遠東大戰

據報紙所載日本備戰的情形，據留日朋友通信的報告，日本現在劍拔弩張，有作戰的決心，是無疑義的了。

向誰作戰？俄國嗎？美國嗎？抑是英國？只有這三國在遠東有密切的利害關係。英日自一九〇二年以來，因爲同盟的關係，本來就是好朋友。日本因爲有英國的同盟，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打敗了俄國。英國因爲有日本的同盟，鞏固了她在遠東的地位。但是到了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四國協定代替了英日同盟，於是二十年的同盟關係，雖沒有義絕，也已恩斷。加以歐戰以來，商務競爭，日本不但在中國有壓倒英國之勢，就在英國屬地，也有喧賓奪主之虞。英國爲鞏固自己的地位，及解決自己的經濟恐慌，乃有渥托瓦經濟會議以後全個帝國抵制日貨的運動。兩方感情，自然日趨惡劣。到了『九一八』以後日本佔領中國東四省的行動，英國政府所操縱的國聯，又從

旁多少予以非議。因此，英日關係，近來極爲緊張；日本方面，竟有對英作戰的言論。

但是英國一來因爲本國經濟問題，沒有解決；與美在世界商場的競爭，又很劇烈；歐洲局面因希特勒的上台，更趨緊張。種種牽制，英國當然不會與日本作戰 。就是日本，也不會因商業上一部分的衝突，而向英國挑釁。故日英之戰，可能性比較最少。

其次說到日美。

自一八五四年美國以武力壓迫日本通商，一直到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美關係，極爲友善。因爲那時候，破壞中國領土的完整與門戶的開放者，乃是俄法德三國，而非日本。日本那時候　毛羽還未豐滿，極願與英美兩國合作，以抵抗俄法德三國。所以日美之間，沒有利害的衝突。自日俄戰後，日本接替了俄國在東三省南部的勢力，於是政策爲之一變，與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背道而馳。同時，美國西部因爲日本移民，發生排斥日僑運動。兩國感情，更趨惡化。加以美國商務發達的結果，對於遠東政治，關係愈密。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便與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作正面的衝突。而太平洋的海軍

競爭，也隨之而起。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這是亞洲門羅主義戰勝門戶開放主義的時期；一直到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以後，遠東的均勢，才恢復過來。但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在中國的掠奪，打破了以前一切的紀錄，美國當然感覺到空前的威脅。最近羅斯福預備對俄復交，即是謀對付的一個重要步驟。

不過美國，雖然與日本衝突得利害，但在目前，決不願與日本開戰。第一因為美國在中國只有經濟上與商業上的野心，若是算盤上所受的損失並不很大，美國人決不會為門戶開放主義這個空名詞，來替中國犧牲。至於正義人道等等，在國際政治上，是騙人的東西，只有白癡才會相信。第二因為美國對日作戰，軍事上沒有把握。自舊金山至馬尼拉有四千多英里的路程，自馬尼拉至日本，有兩千多英里的路程，相隔太遠，作戰不易。而且美國海軍計畫尚未完成，軍士作戰又少訓練，與英國商務上復多衝突，在這個經濟恐慌的時期，美國豈敢輕於一試。

在日本方面，如果美國不積極干涉她的行動，她也無仇視美國的必要。且日本對美

作戰，以三對五之軍力，事實上不能攻到美國本部。若是單爲着要搶菲律賓，那麼勢必引起澳大利亞等地絕大的反感，終至於英國的干涉。因此，日美之戰，在目前也很少發生的可能。

至於日俄的關係，則自始至終，沒有很好的交情。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日本割了我遼東半島，俄國便約了德法兩國出來干涉，逼日本退還，而後來自己却搶了過去。於是而有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俄戰爭的結果，不但高麗事實上落在日本手裏，就是俄國在滿洲的勢力範圍，也不能不讓出南部。此後十餘年間，俄國因有事於歐洲，對於遠東的侵略，比較和緩，故與日本的衝突，也不十分劇烈。但自一九一七年共產革命成功以後，蘇俄對遠東的赤化政策，不免與日本以莫大的恐嚇。一九二六年中國國民黨容共聯俄的革命運動，及日本本國思想界的左傾趨向，在在都使日本感覺不安。近來日本佔領東北，剝奪俄國在北滿的勢力，以至發生嚴重的中東鐵路問題。因此兩國國境毗連，直接接觸，衝突當然更加劇烈。如果蘇俄第二個五年計畫能夠成功，在

經濟上也是日本一個可怕的敵人。

日本爲保障自己國基的安全，掩護滿韓的領土，伸張勢力於蒙古，並且討好於資本主義的國家，臥榻之旁，或許先從蘇俄開刀。

所以在英美俄三國之中，就與日本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而言，以俄國爲最大，美國次之，英國又次之。但蘇俄因爲基礎未固，經濟計畫未成，在目下也不願與日本開戰。所以對於日本佔據東北，不敢反對；甚至願以中東路出賣，以求免禍。

總而言之，日本是有戰的決心，誰阻礙她的計畫，就打誰。英美俄都沒有與日戰的決心，大家看見這隻瘋狗，都希望別人去打，自己袖手旁觀，甚至想做漁人，從中得利。英美因爲與日本距離很遠，不當其衝，所以馬上衝突的可能性比較少。至於蘇俄，則兩國的政治經濟組織完不相同，國土又相毗連，在東北又有具體的利害衝突，因此就目前的情形來說，日本要找一個戰爭的對象，大概是蘇俄無疑。如果蘇俄能夠忍辱負恥，一讓再讓，日本自然可以不必用武。如果蘇俄要像最近發表菱刈搶奪中東路陰謀的

文件這樣幹法，或許日本就要不客氣動手。

日本現在像一條好漢，站在那裏，頭上紮着頭巾，手裏拿着關刀，兩脚擺好了姿勢，誰要去惹他，他便要打誰。中國被他踢了一下，倒在他的脚下，用不着說沒有作用了。在場的人們，有英大，美二，俄三，俄三最切近，美二站得遠點，英大又站得遠點。如果俄三對於他的橫暴，要表示不服，那麼他就會輪起關刀，向俄三劈來。於是遠東大戰的大戲，便開幕了。

二

假使日俄打起來了，美國怎樣？英國怎樣？中國又應該怎樣？

美國大概是幫助蘇俄的。所謂幫助，乃是道德上的幫助，外交上的幫助，軍械上的幫助，經濟上的幫助，至於同盟出兵作戰的幫助，則未見其馬上願這樣幹法。美國對於日本，如上所說，衝突很多，她自己雖然不願意馬上與日本打，但她心裏很願意俄國做她的替死鬼。在美國人看來，俄國雖然是主張共產，但利害上的衝突，沒有像與日本那

樣有切膚之痛。俄國打勝，美國將來還可聯合英日對付她。日本打勝，美國在遠東將無說話餘地。何況接濟俄國的軍械，糧食，及其他用品，可以復興美國的經濟呢。所以這着，美國是會走的。最近美俄復交的進行，除了經濟上的作用以外，也有對日的關係。

為什麼美國起初不會加入戰爭呢？因為美國人最講經濟（別國人也不見得不是如此），總是想以最少的犧牲，去交換最大的報酬。如果她開頭便加入進去，她便要當日本海軍之鋒，誰勝誰敗，不可逆料。她不如讓『日本狼』與『俄國熊』先拚個你死我活，等到『日本狼』精疲力盡的時候，她再跑進來，給狼三拳兩脚，放牠倒地完事。這樣又威風，又省事。美國對於歐戰便是這麼一套戲法。所以我說，她先不會與俄一起向日本動手，要動手總在最後的五分鐘。當然她幫助，還是幫助俄國的。

如果美國人不肯開頭加入動手，英國人是美國人的祖先，當然更要聰明。大概她是守中立的，她的軍用品會賣給雙方的，只要可以賺錢，她倒不拘於那方面。原因是她本來是個商人，在歐洲方面事情也多，忙不過來；並且若是幫蘇俄，蘇俄是赤佬，而且可

怕，在印度阿富汗等地，也有野心；若是幫日本，日本是瘋狗，說不定或許會咬她的印度或澳大利亞。結果她大概兩面都不幫，或都一樣的幫；到了末了，她還可以出來以調人的資格，召集和會，操縱一切。

最可憐的，算是中國了。日本與人家打架，爭的不是別的，乃是我們有四萬萬同胞的中國。如果日俄作戰，東北幾省當然是戰場了；並且日本必然會把我全國做他的供給地。必要時，她還會佔據沿海各要塞，以防備美英的海軍。到那時，我們應該怎麼辦？

不外三種辦法：

第一是嚴守中立；

第二是加入日本方面對俄作戰；

第三是加入蘇俄方面，對日作戰。

如果能夠嚴守中立，就是我們不乘機報復日本，未始不是一個辦法。但是這在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的。第一，戰場便會在我們的滿蒙，我們如何能夠中立。第二，日本

在軍事行動上，必定要操縱我們的交通，原料，海防，破壞我們的中立。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中國何嘗沒有宣布中立；結果東北成爲戰場，中立終遭破壞。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中國又何嘗沒有宣布中立；結果日本進攻青島，中立也遭破壞。何況這次爲全個中國問題的大戰，更何況中國更非從前的中國。所以第一個辦法，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

加入日本方面，對蘇俄作戰，便要問日本戰勝，我們怎樣；日本戰敗，我們又怎樣。日本戰勝，難道會把東北給還我們嗎？會不再壓迫我們嗎？反之，我可以斷定，日本在東北的地位必更加穩固，中國更無收復失地的希望。今日日本軍閥已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倘一戰勝俄，豈不更要横行霸道，狼吞虎噬，內外蒙古，併爲一體，黃河長江，席捲而下。到那時，更沒有人敢起來干涉；到那時，我們將更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如果日本戰敗，我們因爲加入的關係，也必同受懲罰，如在歐戰裏面土耳其之加入德國，結果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至於認賊作父，自貶人格，在國際上不能抬頭，在

人類史這一汚點，更不必說。

加入蘇俄方面對日作戰，論道理，日本是我們最大的敵人，自然應當如此；論利害，我們也合打算。最後如果日本勝利，當然我們要吃大虧。萬一如果日本打敗，那麼我們便可揚眉吐氣，不但東四省可以收回，其他一切不平等條約，也可乘機要求取消。

有人或者要說，俄勝日敗，共產勢力必更增加，中國共產勢力必更不堪收拾。但是我們要知道，如果日勝俄敗，中國終必被日本所吞併。我們與其亡於日本，永遠不得翻身；不如完全同歸赤化，還不失爲共產國家。何況全國人民，對日怨恨，無以復加；誰敢違反此種國民心理，誰便是自取覆滅。

不過，我認爲加入俄國方面，事先須與美國聯絡，如能取得一致行動，最好。以中俄兩國的陸軍，及美國的海軍，與日本周旋，日本必敗無疑。

但是無論加入那一方面，中國自己必須成爲一個國家，才夠資格。上面的推論，乃是假定中國有一個能爲人民所服從的政府。若是像現在這樣四分五裂，地醜德齊的情

形，無論如何，都不能一致。結果，只有坐失時機，待人宰割。回憶歐戰發生的時候，中國的統一還名符其實，袁世凱的政治還像個樣子，而結果猶不免於屈辱誤國。現在的情形，比那時危急不知幾千萬倍；同時政治的腐敗黑暗，分崩離析，也不知增加幾千萬倍。以這樣的局面，去應付空前的絕大危機，其無倖也必矣。

因此，我們認爲應付遠東大戰的先決條件，須有一個強有力，爲人民愛戴的政府。如現在的政府不夠資格，全國人民應該起來積極改造。

有了強有力爲人民愛戴的政府以後，我們要抱定聯俄美，抗日本的方針。如果不幸遠東大戰暴發，我們爲正義，爲利害，都須毫無顧慮的站在反日的方面。

現在烈火快要燒到眉毛上來了，全國國民爲什麼還不起來自救!?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為閩變忠告當局

當局對於閩變：起初是裝做沒有這回事；其次是『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脚』；最後，是認定為一二野心家的把戲。好像如果對於這一二野心家有辦法，別的都不成問題。歷次內亂，當局的態度都是如此，這次豈能例外？

十一月十五日申報載：『……據某方所傳，閩省將發生一種新政變，……自經林氏（主席）在閩，奔走幹旋，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等會晤後，彼此對於所有誤會，可望冰釋云。』

據此，可知林氏不是回福建去『原籍掃墓』，乃是去『奔走幹旋』．林氏去『奔走幹旋』，當然不是私人的行動，而是代表南京當局。但林氏十六日回京，對新聞記者說，『此次赴閩，全為私事，掃墓訪友，蔣光鼐陳銘樞來晤，亦係隨便談談，並未涉及政事，報載福建各種消息，在余未離閩時，並未聞及。』這不是明明知道這回事，而裝

做沒有這回事嗎？

國民政府林主席如此，其他大員，豈能例外？所以汪精衞，孫科，孔祥熙以至於曾仲鳴，褚民誼諸氏莫不認爲是謠言——『不如外傳之甚』的謠言。

到了有這麼回事，諱不能諱的時候，於是當局臨時大抱佛脚。平時視爲政敵，遠之惟恐不及的胡漢民，馮玉祥諸氏，或是邀請入京，或是委以全國水利督辦，而汪精衞氏也於此時宣言：『中央於國難發生以來，即有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企望，故對於在野要人，均有一致聯合的必要。……目前中國，决不能再一盤散沙，凡屬同人，均需一致團結，共負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但是平時並不去聯合，也不想出一個精神團結的辦法，而對於不忍國家危亡，認爲『匹夫有責』的人談國是，則認爲『言論荒謬，行爲反動』，非施以各種壓迫不可。這樣去『一致團結』，這樣去臨時抱佛脚，安得而不『一盤散沙』？

最後，福建新政權成立了，通電出來了，政綱宣布了，變得不可收拾了，當局不檢

查自己過去的行爲，宣示並實行與民更始的政策，而認爲這僅是一二野心家的陰謀，好像只要陳銘樞，李濟琛伏誅，或就範，天下便可太平了。

這是當局對閩變的態度。要是問題這麼簡章，未嘗不可以額手稱慶 。但是我們知道，古今中外的變亂，必有根本上的原因，決計不是一二『野心家』可以虛造。如果沒有根本原因，就是有一二野心家想盜竊名義，割據稱雄，也不能號召起來。反之，其所以時常發生變亂，一二『野心家』可以號召起來者，必有其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不去，而僅注意一二個人的行動，這絕對不能解決問題的。胡漢民氏可以請來入中樞，馮玉祥氏可以請來督辦水利，陳銘樞李濟琛如不就範，可以格殺勿論，但是內亂的根源沒有除去，內亂的現象必層出不已。我們可斷言的是這一點。我們要請當局反省的，也在這一點。

這次福建事變，我們認爲有三點可以注意。

第一，福建事變是一種富有政治意識的運動 ，與馮玉祥方振武諸氏在張家口的抗

日，是不同的。前者是有主張，有組織，並且是對內的。後者比較對外的作用較重。我們看福建事變發生的經過，其政權的組織，及其宣布的政綱，便知此事醞釀已久，有幾方面的參加，不僅是一二野心家的問題。

第二，福建事變不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而是以武力反對國民黨的問題。以前寧桂之爭，閻馮之戰，以至於馮方二氏之自由行動，都是在國民黨招牌，三民主義旗下之內訌。這次却不同了。陳銘樞，李濟琛，陳友仁，蔡廷楷，蔣光鼐等已宣布脫離國民黨了，黃琪翔已宣布脫離第三黨了，而另外組成了所謂生產黨。他們廢棄了青天白日旗，停掛了總理遺像，取消了讀遺囑，總而言之，把國民黨一切的儀式都推翻了。這種反國民黨的態度是明明白白的，與以前在國民黨內鬧來鬧去，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福建事變雖與以前各種內亂性質不同，而其爲中國現在全個政治病症的反應，則無二致。因爲南京政府許多設施不能令人滿意，人民不能安生，所以有層出不窮的叛亂。遠者如寧桂之爭，近者如馮方之變，東北之滿洲國，內地的蘇維埃，無一不是

由於全個政治根本發生了毛病。其方法雖不同，其領袖雖有別，其主張雖分岐，然其原因，爲不滿現狀，則毫無二致。

因此，如果政府當局不根本消滅內亂的原因，而僅注意一二個人的動機，就是能夠將陳銘樞，李濟琛，朱德，毛澤東授首；將江西蘇維埃政府，福建人民政府消滅；而第二第三陳，李，朱，毛必接踵而起。這是我們可斷言的。現在的當局，有許多都是革命起家的，當知革命運動的發生，有其根本原因，不是一二『野心家』或一二英雄好漢所得而無風起浪的。前清如何倒塌，北洋軍閥如何推翻，殷鑒不遠，可資反省。

據我個人的意見，政府當局與其遣兵調將，大張撻伐；不如乘機痛悔，與民更始；使反對黨派無所藉口，使叛變原因根本消滅；不但當局諸公可以保全名位，就是我們小百姓也可稍沾雨露之恩。

政治上各黨派如開店舖，我們小百姓好比顧客，顧客之惠臨那個舖鋪，就看那個店舖所賣的貨物，是否貨眞價實。我們小百姓不喜歡掛羊頭賣狗肉的市儈，也不喜歡壟斷

市場抬高貨價的奸商。我們小百性可以受騙一次，二次，三次，但是受騙多了以後，我們總要另找店舖。我們雖然是被稱爲阿斗，沒有高的智識，這點切身利害，我們遲早總可發現的。

所以政府當局如果要人心歸附，如果要根本上消滅叛亂，必須立卽根據人民心理，澈底改造政治；換言之，必須除去內亂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麽？人民的好惡在什麽地方？

第一是抗日問題。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政府當局的態度，始終是不抵抗，那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始終大聲疾呼抗日，並屢次指出安內先必攘外。不料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當局對日可以妥協，對內不能妥協；對日可以讓步，對內不能讓步。最近華北交涉，着着進行，通車通郵，行將實現。當局不但不準備收復失地，反有意默認滿洲僞國。這是根本違反國民的心理，這是根本斷絕自己的政治生命。須知國民對於日本的侵略，已忍至不可忍的程度。抗日者，人民莫不擁護；媚日者，人民莫不痛絕。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觀夫人民之熱烈援助東北義勇軍，擁護滬戰的十九路軍，可見一斑。而叛亂者不管是馮玉祥，方振武，陳銘樞，李濟琛，朱德，毛澤東，必以抗日爲號召者，也在於此。古今中外的政治歷史，沒有一個政府能媚外可以長存。外國的例，不必說；時代稍遠的例也可不論。民國以來，袁世凱政府之簽訂二十一條，與安福派的親日外交，都是他們自取滅亡的主要原因。若當局對於此點，不根本覺悟，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豈不悲夫！

覺悟之道：

(一)向國民認罪，罷免媚日派；

(二)中止對日祕密交涉，否認停戰協定；

(三)對日實行準備抵抗。

第二是專政問題。國難這麼嚴重，就是担任統治的國民黨內部沒有問題，也早應公開政權，與全國國民羣策羣力，共謀對付。何況國民黨內部的分崩離析，不可救藥；國

民黨的能力，已經宣告破產。『九一八』到現在已經兩年有餘，局面愈鬧愈糟。自己幹不了，又不讓人家幫忙；口裏講精誠團結，實地則壓迫異己。黨外有政治主張的人固不見容於當局；黨內不同派系的人，也是被排於圈外。這樣，那裏不逼上梁山，釀成叛亂？當局須知人民的權利已被剝奪殆盡，人民對於當局的厭惡心理與日俱深。當局如果不自絕於人民，有公忠爲國的誠心，那麼便立卽應：

(一)停止一切以武力征服壓迫異己之行動；

(二)保障言論，出版，及政治結社的各種自由，容許異己政黨的存在；

(三)明白宣布取消一黨專政，召集人民代表會議，還政國民。

第三，是人民吃飯問題。這問題比前面兩個問題更屬重要。現在政府當局，只知讓一班貪官汚吏，封建軍閥，買辦階級，少數資本家去剝削人民生計，吸取人民血汗，以致全國之中，有極少數的人可以安富尊榮，驕奢淫佚，而最大多數的人，連粗衣粗食也不可得。一切設施，不但不能提高國民經濟能力，並且隨處在打破人民的飯碗。人民的

飯碗打破之後，沒有飯吃，安得而不去作亂？共產黨的勢力在此，叛亂的根源也在此。

爲今之計，政府當局應該：

(一)立將貪官汚吏榨取所得的鉅大私產充公，並處以後犯者以極刑；

(二)廢除一切苛捐雜稅；

(三)在農村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在城市一方面實行保護關稅，扶植本國工商業，大事業收歸國營，一方面保護勞工利益。

我們在黨禁森嚴之下，非不知監牢的可怕，刀槍的危險。然而，我們所以繼續不斷，予當局以正直嚴重的忠告者，乃是看見國內危機四伏，民族前途堪虞，故敢不計個人利害，希望當局覺悟。我們的話雖『苦』，但我們的話，不失爲『藥』。時至今日，誠如天津大公報所說，『再不能鬼混下去』。因此，當局諸公，就是要『鬼混』，也混不下去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倒車開到讀經

本文是最近應教育雜誌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讀經問題專號」徵文而作的，時間雖然與前面各篇相隔得很遠，但是據該雜誌主編先生來信說，此文『本已排好……不料被當局抽出』，可見也不免有『荒謬』的嫌疑，故列在『荒謬集』的後面。——造時附識。

一

近年來，中國社會是在那裏開倒車，有事實為證：

反平等自由的獨裁思想運動；

恢復『至聖先師神位』的尊孔運動；

時輪金剛法會，祈禱世界和平會，及調劑金融祈禱大會等等的迷信運動；

反對白話的存文運動；

中日『滿』三方合唱的王道運動；

讀經運動；

及其他。

可見讀經運動不過是倒車中所載的一種貨色罷了。要討論讀經，便須知開倒車的由來。爲什麽讀經，也就是爲什麽復古，爲什麽開倒車。

二

要知道爲怎麽開倒車，最好先明白誰在那裏開倒車。分析起來，大概有下列各色人等：

(一)治人階級，中央的與地方的；

(二)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之徒；

(三)乘機報復的遺老遺少；

(四)無聊的『慈善大家』；

(五)善觀風勢的文人；

(六)中日『滿』的『親善主義者』。

治人階級爲什麼要開倒車？答覆是：

有的因爲看見外患日迫，經濟破產，政權不穩，爲鞏固他們的地位計，所以搬出這些封建思想來，實行愚民政策，使一般人忘記現實，埋頭在『詩云』『子曰』裏面，不往前進。

有的因爲前進的思想是要改變現狀的；改變現狀，恐不利於他們，所以要抬出些『古董』來，鎮壓人心。

有的發現自己現在的行動，與原來所奉行的思想有矛盾，急於想找另外一套思想來爲自己辯護。

有的原來就深中了傳統思想的毒，雖然在不當局的時候，因爲實逼處此，曾站在前

進思想的方面，但是現在是當局了，年紀也大了，傳統思想由下意識裏面又鑽了出來作怪。

有的看見國事鬧得太沒辦法，既不敢向前進，只好向後退。

三

何況開倒車，國際上有榜樣，有成績。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運動，德意志希特勒的國社主義運動，在某方面都是擁護『國粹』的。他們做得是如何的轟轟烈烈，我們安可不學。所可歎者，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有『國粹』可擁護；我們要擁護，恐怕只有『國糟』。

四

可是在遺老遺少的眼光中看來，自己的『國糟』也就是『國粹』，因為沒有看見——並且不願看見——人家眞正的『國粹』。他們的身體雖然生活在廿世紀，但他們的精神尙沉迷於唐堯虞舜之世。這個飛機與無線電的世界是他們所不認識的。自五四新文

化運動以來，他們被壓在底下已十有餘年了，後生小子之忘乎其形，與『引車賣漿』的白話文學，早已氣得他們發昏。現在忽然看見權貴有意提倡『聖學』，那裏不眉飛色舞呢？

五

吃飽了飯沒有事做，或沒有吃飽飯要找事做的『聞人』，當此天災人禍相乘之際，正是做『慈善事業』的機會，或可出名，或可得利，或可名利雙收。『慈善事業』在物質方面自然是辦賑，在精神方面自然是辦時輪金剛法會與祈禱世界和平會等等的工作了。何況黨要如院長『阿彌陀佛』於上，『慈善大家』安得而不『唸唸有辭』於下。

六

也有看風勢爲轉移的文人，風從南來，便向北走；風從西來，便往東跑。譬如近來所謂『存文運動』罷，不出之於國學泰斗如章太炎先生等，而出之於提倡所謂『新社會民主主義』者；並且不在五四前後出來『存文』，而偏在現在出來湊熱鬧，豈不是叫人

家齒冷！

七

眞是，『怪事年年有，沒有近年多』。在拿着機關槍掃殺人家的時候，我們的東洋朋友，還大倡其王道主義。像鄭孝胥之流跟着在東洋朋友的機關槍後面，不住的響應王道主義，並且在東北大實行其王道政治。我們這四萬萬的一羣人雖然受盡了東洋掛在機關槍頭上的王道主義之賜，說來奇怪，却也有起來附和的。不說別個，我想單提前司法院長在日本的唱和便夠了。王道是什麽？自然是霸道進一步的道理。以前齊桓公之『一匡天下』，只做到霸道，還沒有做到王道。現在日本在東亞已實行其霸道，還想進一步實行其王道，使我們『欣然同意』做他們大日本的大臣民。王道原來是東方的傳統思想，也是感化被壓迫民族或麻醉被壓迫人們的好帽子，無怪廣田土肥原之流一唱起來，『支』『滿』的要人們，也樂意附和。同時王道是『親善』的招牌，在這招牌底下，可以成就空前的買賣。如是王道主義的空氣便佈滿了東亞，復古尊孔的聲浪便洋溢乎

『支』『滿』了。

八

我這樣分析近年來的復古開倒車運動，誠然不免開罪一部分人士，實在抱歉得很，但是一想到四萬萬這羣人的前途，又不能顧這麼多了。你難道能否認今年是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嗎？你難道沒有看見飛機嗎？你又難道沒有聽見無線電嗎？然則，你要把時代之輪轉囘來，開倒車囘去見數千年前的周公，豈不是白費心力，徒然暫時阻礙這羣人的迅速前進？

具體一點說讀經，你要大學裏的青年，中學裏的少年，小學裏的童年，一律去接受這些『古董』，擱在腦筋裏面，而同時要他們去懂什麼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以及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試問除把這些可憐的孩子鬧得莫名其妙以外，有什麼結果？

固然，你以雷霆萬鈞之力，暫時可以桎梏一般青年的腦筋，但是他們不是沒有眼睛看不見飛機，沒有耳朵聽不見無線電，他們怎樣能不與現在環境上的事實相接觸，而閉

着眼，塞着耳，回到數千年前的古代生活去呢？何況你又要教他們這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並教他們的英文去看外國書。

小心點罷！時代之輪是不留情的，尤其是在這瞬息萬變的今日的世界。你若硬要去阻止牠，你自己被壓死在底下不足惜，全個社會的暫時被阻前進，那才可造孽呢。中國自漢以後有兩千多年沒有多大進步，就坐在此。爲這個緣故，難道還沒覺悟嗎？

九

最後還得要聲明：我並不是要做秦始皇，把十三經燒掉，或是當做禁書，不許人家看。其實古董還是不能不有人去研究的。國學家們如果高興去研究，儘管去研究。我所反對的是強迫一般青年大家去讀這些撈什子。主張復古讀經人們聽着：你們已經或快要變成古董了，我對你們並沒有存什麼希望。你們儘可開倒車自己坐。但爲民族前途計，請千萬留下這些腦筋沒有腐化的青年，不要害他們才好。

一九三五，三月，三十日。

附錄——我們的根本主張

> 本文是我們一部分友人所辦的主張與批評的創刊宣言，是我們共同的產物。因爲牠比較能代表我的思想的大概，故附錄於此，以作全集的參考。——造時附誌。

一、我們主張實現獨立統一的國家

（一）國家的需要　我們深信國家爲現代人類生活必需的政治組織，對內能謀國民的福利，對外能抗外來的侵略。我們認爲現今中國尙缺乏現代國家的意識與組織，以致淪於殖民地的地位。大多數國民，一面爲傳統的天下觀念所蒙蔽，以致不能團結自衛；一面爲宗法的家族主義所盤據，以致有家無國。因此，國家觀念難於產生。同時破壞中國的帝國主義不斷的進攻，目無國家的封建軍閥繼續的割據，使眞正的國家組織，無由實

現。在此國家危急、人心搖動的時候，我們深信欲救中國，必先承認國家存在的需要。我們對於國家存在的擁護及國家觀念的提倡，不是以國家爲信仰的目的，乃是認國家爲中國民族目前生存必要的工具；同時也不是反對世界的大同和人類的統一，乃是認定健全的國家組織，不但無礙於世界最後的大同，而且爲必經的步驟。

(一)國家的獨立　因爲我們要擁護中國的生存，所以我們深信中國的獨立，爲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我們不能容許侵犯中國獨立的外國在華統治勢力。我們對於各國根據不平等條約或其他手段所取得的各種統治勢力，認爲必須完全消滅，並禁絕其發生。

(二)國家的統一　我們深信欲求中國的完整，必須將全國人民、領土、及主權，置於同一國家組織之下，絕不容許有各種分裂國家的勢力或現象。因此，我們對於割據一方，釀成內亂的封建軍閥勢力，認爲必須消滅；對於妨礙國家意識發展的宗法觀念及地方思想，認爲必須打破；對於根據國內人民種族的分別，足以分裂中國的政策及企圖，認爲必須反對。

二、我們主張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

（一）國有產業　我們爲謀全體國民的福利，打破貧富懸殊的不平，及避免階級鬥爭的慘劇起見，主張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制度。我們認爲全國土地、富源、及生產的工具，乃爲全國國民物質的供給所必需，如爲一小部份人所佔有壟斷，則其餘大部份人民的生活必致被其斷絕或妨害。資本主義在歐美日本已不能防止可怖的經濟恐慌，更不能解決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其弊害已爲世人所公認，其崩壞也不過時間的遲早問題。何況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封建軍閥的蹂躪，經濟落後，民不聊生，資本主義不但無採取的理由，并且無成功的希望。我們深信只有將一切的生產工具、土地、富源、最後歸國家所有，由國家全權支配，通盤計劃，建設全民共享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我們主張依照社會的公共利益，及生產的穩固與增加兩項原則，依下列分類，去分

別處理全國所有一切的生產工具：

(甲)國家所有，國家經營；

(乙)國家所有，私人經營，國家監督；

(丙)私人所有，私人經營，國家監督。

務使全國生產機關，隨着國家權力的發展，與政府組織的完善，由私人所有，私人經營，推進至國家所有，國家經營。當然許多含有獨佔性質，或不適於私人經營的重要企業，立卽可以由國家所有，國家經營。

(二)生存權利與工作義務　我們旣認定國家的目的，在爲國民謀幸福，則國家於人民的生活，應予以切實的保障。凡嬰兒的撫養，兒童的教育，老年的贍養，疾病的調護，失業的保險，災難的救濟，皆應由國家負其責任，使人民皆能得到生活的安定與人生的快樂。同時全國國民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下，皆有勞動的義務，每個國民應依照其智能、體力、及國家的需要，担任某種有益的職務，以增進國家的生產。凡不勞動或

從事於無益有害的職務者，國家得取消其應得之權利，幷與以懲罰。

(三)以貢獻定報酬　我們認定個人對社會有利的貢獻，無論其爲體力的或智力的勞作，企業責任的担負，成儲蓄的借用，皆爲社會共同生活及生產增進的重要元素。各個人所能担任的貢獻及貢獻的種類，旣有差異，如果所給與各個人的報酬，不以貢獻爲標準，則貢獻的原動力必被打消或減輕，生產效率必然減少，而社會公共的福利亦必隨之而受損害。因此，我們認定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之下，個人所取得的報酬，須以對社會的貢獻爲標準。

(四)廢除遺產制度　我們旣認定報酬的取得，應根據於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則對於社會無貢獻的個人，卽無取得報酬的權利。遺產制度，不但違反此項原則，並且足以在社會上養成一種不勞而獲的寄生階級，形成各種機會不平等的關係，妨害社會生產的良好發展。其不合理，有如從前官爵職位的世襲。因此，我們主張廢除財產的承繼權利。至於遺產者直接親屬合理的需要，根據生存權利，自有國家爲之供給；在此種政策尙未

實現以前，國家得令遺產承繼人，保留遺產之一部或全部，至能以教養親屬爲止。

三、我們主張建設民主法治的政府

(一)民主政治　我們認定國家乃爲全體國民而存在，國家主權應屬於全體國民，不應爲一個人、一黨派、或一階級所壟斷。因此，我們反對階級專政、一黨專政、及任何形式之個人獨裁。同時，我們認爲凡是國民，不分性別，皆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與義務；對於不問政治的消極的、與畏縮的心理，認爲必須剷除。

(二)以法治國　我們認定所有國家的組織、職能、及事業，國家與個人或團體的關係，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個人與團體或團體與團體的關係，皆須建築在法律規定之上。國家必須有憲法及其他法律，而爲全國國民及政府人員所共同遵守。人民在法律上，應一律平等，不應有超法律的個人、團體、或階級。凡個人或團體有違背國家法律的行動，不論其居何地位，有何權勢，皆應受同等的制裁。我們又認定法律須爲國民公共意

志的表現，其制定應由國民直接的或間接的參加；否則，便沒有統治全民的權威。因此，我們反對個人立法、黨派立法、階級立法、及一切欽定的憲法、約法、及法律；更反對數千年來輕視法律的人治主義。

(三)民權保障　我們深信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及信仰的自由，爲發展個人本能，增進社會福利，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因此對於以黨治或軍治的名義，剝奪上列民權的高壓手段，我們認爲應該反對。我們主張無論何人，不經司法的法定手續，不受逮捕、檢查、或收押；不經正當的法庭判決，不受任何懲罰。

四、我們主張提倡科學的文化

我們認爲中國的傳統文化，到現在已不能適應現代的社會生活。同時，我們不贊成盲目的採取西方文化。我們主張根據科學的研究，去檢查、去比較中國與西方的各種社會制度、風俗、習慣、道德、及思想，重新估定其價值；幷根據現代已有的科學智識，

跳出成見的範圍，提出各種革新的方案，以創立科學文化的基礎。